



从新冠疫情评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爱神学 ----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 20

长江康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 2020年2月19日,上海“观察者”网转发《长江日报》发表的《她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绝不瞻前顾后,只管大胆直言》一文,和20日转载的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我们读后两相对比,觉得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猛烈抨击弦理论,显然他是弦理论科学研究的落伍者。

[长江康.从新冠疫情评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爱神学 ----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 20. *Academ Arena* 2020;12(5):57-113].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5. doi:[10.7537/marsaaj120520.05](https://doi.org/10.7537/marsaaj120520.05).

Keywords: 关键词: 新冠肺炎 宗教信仰 弦理论 量子序 拓扑序

一、从张笑春到克里斯·瑟奇

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不断巩固成果、扩大战果,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20年2月19日,上海“观察者”网转发《长江日报》发表的《她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绝不瞻前顾后,只管大胆直言》一文,以及同时转载的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我们读后两相对比,觉得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猛烈抨击弦理论,显然他是弦理论科学研究的落伍者。

1) 中国医生张晓春教授说实话

A、绝不瞻前顾后只管大胆直言

a、据《长江日报》记者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射影像科教授、副主任张笑春医生,石破天惊早在2020年2月3日公开质疑用核酸检测确诊新冠肺炎可靠性,她发朋友圈微信是:“别再迷信核酸检测了,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诊断新冠肺炎的主要依据。强烈建议政府征用酒店、宾馆或学生宿舍,收纳疑似以及大部分医学观察者,强制隔离治疗!”

“敢言”最宝贵,认知需修正,张笑春教授说:“敢说真话才是最宝贵的品质” ----张笑春教授因爱看央视财经频道一档节目《是真的吗》,喜欢主持人黄西的一句话:“绝不小心求证,只管大胆胡说”。对这句话,她加工后变为:“绝不瞻前顾后,只管大胆直言”。事情到2月14日,中南医院放射科讨论制订详细的CT诊断新冠肺炎方案,张笑春教授在同事中坚持自己“CT影像作为诊断主要依据”的

观点,她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每犹豫一分钟,可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这件事她也只获得部分同事们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说:“你是我的教授,我相信你的判断,万一错了责任我背”。影像科主任徐海波教授也安慰她:“不要背心理包袱”。

b、为啥核酸阳性是新冠肺炎确诊的金标准?据2020年2月4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张思玮发表的文章《用CT诊断新型肺炎?专家回应:不可行!》报道说:针对有武汉专家推荐应该将CT影像作为目前新冠肺炎(诊断)的主要依据,但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主任沈瀚、徐州医科大学教授顾兵、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检验师里进、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韩东升、南京诺唯赞创始人唐波等,并不赞成。他们说:不能绝对将核酸检测“一棒子打死”;CT不能区分哪种病毒感染。到2月5日国家卫健委印发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规定将CT影像作为临床诊断标准,仅限于湖北省。

c、张笑春教授对新冠肺炎的严重性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来自哪里?她是从1月14日就睡在中南医院放射科办公室的医生,到2月13日湖北省首次以临床诊断病例作为报告数据,显示此前一天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包含以CT为标准的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张笑春教授如释重负,她对《长江日报》采访的记者说:“重大危机跟前,不能只抛出问题,一定要提建设性意见。现在的方向是对的,相信不需要太久,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了,防控就会看到成效” ----当然事情的起因也涉及张笑

春教授自己的父母亲：2019年年底，中南医院陆续收治不少发热病人，张笑春的工作内容是看片子写报告。她发现每十个发热病人当中，就有七八个存在肺部感染，患者CT表现多种多样，有毛玻璃影，也有实变影。

一开始，湖北省仅少数几家机构可以开展核酸检测，张笑春教授本来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料。直到中南医院组织专家撰写诊疗规范，张笑春教授执笔影像学部分，这才接触到部分患者的核酸检测数据。她惊讶地发现，很多患者的核酸检测结果和CT对不上。1月中旬，核酸检测权下放到医院，有了更多可追踪的样本。张笑春教授详细统计患者做CT的情况，再逐一对照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佐证了自己此前的判断——核酸检测存在大量“假阴性”。

张笑春教授是知道挑战权威可能带来的后果，她说：“但是父母亲，还有成百上千像他们一样的患者，激发了我的勇气”——大年初二晚上，母亲在通话中支支吾吾地说，“我有点不舒服，你问问医生我是不是神经出了问题”。张笑春教授说，母亲描述全身一阵阵发紧，像是寒战的表现。她急忙给医院急救中心夏剑主任打电话，夏主任听完，告诉她很可能是新冠肺炎。第二天，张笑春安排母亲做了CT，发现双肺各有一条窄窄的实变影。父亲没有任何症状，在她的强烈建议下也查了CT，双肺感染情况更严重。

然而，两位老人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得不到确诊，他们只能居家隔离。“我父亲是怎么隔离的？他不停地从卧室走进走出，口罩一眼没看见就扯到下巴去了。我当时就不行，咱还是得住院。”张笑春教授说，医生家属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怎么隔离，怎么防护？可想而知。直到陪父母看病的时候，张笑春教授才知道床位有多紧张。所有定点医院人满为患，即便核酸阳性的确诊患者，也很难及时入院，核酸阴性的患者更是求医无门。这天晚上张笑春教授一夜无眠。排队就诊时，病友手中的CT片和脸上的绝望刺痛了她——她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病毒肺改变，患者能否确诊却未可知。“人命关天，我决定振臂一呼”。2月初，武汉已连续征用五批发热定点医院，“两山”也在加紧建设中，但仍无法满足急速增长的住院需求。一旦采取CT作为诊断标准，病人就会进一步暴增，严重超出现有医疗资源的负荷。

她马上想到了征用酒店、学校等，改建成临时隔离点，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开辟出尽可能多的床位。这是“非典”时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可以立即复制到新冠肺炎防治。怎样把建议传递上去？张笑春教授说，她没有时间做太多考虑，直接选择了微信朋友圈这个“笨办法”。她认为，面对一种全新的、未知的疾病，医护人员一定要保持独立的

思考，不要被教科书或诊疗规范僵化头脑。“当我们发现工作中存在某些问题，要敢于说出来，使之有机会被修正。”张笑春教授坦言，在与病魔战斗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可能有些唐突，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会逐步修正前面的认识。希望大家多宽容，少苛责，医务人员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2) 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与新冠病毒

A、《科学美国人》是本啥杂志？

a、关于《科学美国人》杂志与中国的故事，《环球科学》杂志社社长陈宗周教授曾说：1845年8月28日一张名为《科学美国人》的科普小报在美国纽约诞生了。创刊之时，创办者鲁弗斯·波特就曾豪迈地放言：当其他时政报和大众报被人遗忘时，我们的刊物仍将保持它的优点与价值。他说对了，快满170岁的《科学美国人》却青春常驻、风采迷人。从创刊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美国人》一直是世界前沿科学的记录者，是一个个科学奇迹的见证者。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当他带着那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器怪物在纽约宣传时，他的第一站便选择了《科学美国人》编辑部。爱迪生径直走进编辑部，把机器放在一张办公桌上，然后留声机开始说话：“编辑先生们，你们伏案工作很辛苦，爱迪生先生托我向你们问好！”正在工作的编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手中的笔停在空中，久久不能落下。这一幕，被《科学美国人》记录下来。1877年12月，《科学美国人》刊文，详细介绍了爱迪生的这一伟大发明，留声机从此载入史册。留声机，不过是《科学美国人》见证的无数科学奇迹和科学发现中的一个例子。如今，《科学美国人》早已由最初的科普小报变成了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的月刊，成为全球科普杂志的标杆。到目前为止，它的作者，包括了爱因斯坦、玻尔等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成为《科学美国人》的作者之后，再摘取了那顶桂冠。读者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无数人在《科学美国人》获得知识与灵感。

b、《科学美国人》是一本高端科普杂志，它的定位是为具有大学理工科四年级以上的有科学素养的读者，介绍本专业以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的最新进展和前瞻。《科学美国人》这本科普杂志与中国结缘，是杨振宁教授牵线，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心支持——1972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宴请中，杨先生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议：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科学美国人》这样的优秀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杨先生的建议得不到落实。1975年杨振宁教授再次回国，周总理接见他，问他怎么样才能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杨振宁就向周总理大力推荐了一个杂志：《科学美国人》。

杨振宁为什么要推荐这个杂志呢？因为这个杂志是世界顶级的科普杂志，是《自然》杂志的科普版，为它写稿的都是当今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从创刊起一共有约 200 个诺贝尔获得者给他写过稿子。可以说，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普杂志。这个建议说实话挺大胆的，因为中美当时还没有建交，这个杂志还有一个美国人的字眼。后来，这个杂志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引进，但杨振宁一直记得，一直推荐。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才开始正式试刊。1979 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正式出版。《科学美国人》引入中国，还得到了时任副总理的小平以及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支持。一本科普刊物在中国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体现了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刊物本身的科学魅力。

c、1970 年我们大学毕业，从武汉分配到重庆重钢大渡口区所在 18 冶金建筑公司工作，那时重钢图书馆是唯一开放职工可看书的地方。我们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到重钢图书馆看科技杂志，因为我们对基础科学国内的“层子模型”与西方的“夸克模型”的争论很关注。所以当我们在重钢图书馆能首先看到《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之前的试刊杂志，非常高兴。那时盖尔曼的“夸克模型”已经发展到“量子色动力学”阶段，国内能看高级科普的文章很少，《美国科学人》的引进是雪中送炭，使我们在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写作的《基本粒子的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向现代理论物理学中的类点论挑战》论文，在 1975 年 9 月终于实现第一阶段的初步完稿。

1981 年 4 月我们调回家乡四川盐亭县科协工作，不能看到重钢图书馆里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的《科学》杂志。但当时县科协和县科委合署办公，有订阅《科学》杂志的条件，所以能看到 1992 年 10 月我们调离盐亭县科协。到《绵阳日报》工作后，我们开始自费订阅《科学》杂志，到 2005 年退休。正是通过《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的《科学》等杂志，30 年间不间断地了解了前沿最新的科技，特别是超弦理论、现代宇宙学、量子计算机、量子生物学……等拥有硬核的科学知识。

B、抗新冠肺炎疫情与《科学美国人》

a、你知道科学吗？科学是世界性的，犹如“天外来客”一般突然出现的新冠肺炎病毒，攻击点落在了中国武汉，但所威胁的群体却是全人类。因为病毒并不区分人类的国别，而疫情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所以科学也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胜，世界胜；中国败，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抗疫大战的胜利，早已经被赋予了世界性的意义；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回溯历史，从殷商到民国有过明确记载的瘟疫灾难

就多达 261 次之多，而其中大多数都会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但经历再大的灾难，中国从未丧失过必胜信心。中国的抗疫军团是全球抗疫大战的第一道阻击防线，可以说，夺取最后胜利的嘹亮号角已经吹响，全世界都可以听到看到：中国所调动的精锐之师、所投入的巨大资源、所组织的战略支援毫无疑问都是世界级的。这一道防线如果被全线突破，后面还能不能组织起比中国军团更强大、更有战斗力的第二道或第三道防线？

b、但此时为啥《科学美国人》杂志要发表《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前沿科学研究中也有落伍者。北京大学饶毅教授说：“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有数据支持，只能说，我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这些工作中，包括如何解决前沿科学研究中也有落伍者问题？

例如，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危机大考前，有人不及格，更多人挺起了民族脊梁》文章说：“从现在回溯来看，12 月 30 日湖北卫健委发布了疫情通知，随即国家卫健委就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专家，这是相当强的力度，但回头看专家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太忽视了临床大夫的意见，是不是关于疾病定性的标准太本本主义？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总之大家有疑惑。国家监察委正在武汉进行相关调查，相信最终会水落石出。等这场战役胜利后，我们要认真总结教训，把存在的短板一个个补上”——这里的“一批又一批”不是指临床大夫像张笑春、李文亮这种“绝不瞻前顾后，只管大胆直言”的医生，也不是支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像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这样的院士。

这里“一批批”中有一人多个院士头衔的，有在《柳叶刀》等国际著名杂志多年发表多篇基因研究论文的专家——难道这种前沿科学研究专家会落伍？难道这种事业、官职双到位的专家不敢“大胆直言”？是他们“瞻前顾后”——科学是世界性的，也有意识形态的——专业科学家与专业政治家不同，在解放以来的党内斗争，路线分清后，政治家的“不实之辞”一般都会纠正；而专业科学家不涉及深度的意识形态争论，工作一般都照样下去，有职有权影响仍大。这样等风头过去，即使主流科学发展了，不认“输”的科学落伍者自然如“新冠疫情”。

c、“四人邦”粉粹前，我们在重庆工作，曾看到有一本重庆大学 1976 年 2 月出版的“内部交流”大型刊物《新物理探讨》第 4 集，第 161-162 页上刊登有一篇《一种荒谬的推论——评霍金小黑洞》的文章，是武汉市 31 中李育德先生写的。他说美国的

三位实验室科学家，基于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根据大爆炸宇宙论推测的太阳系内存在不具有临界质量的小型黑洞，提出一项利用小型黑洞超强引力场引起的热核反应，将热核能转换成电能，经过空间站以微波形式再将能量输回地球的新能源方案，反映的是遍及西方各国的新能源危机中，美国科学界的画饼充饥，和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帝日益没落的历史总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爆炸宇宙论的荒谬性。

当时我们拜访过《新物理探讨》主编、重庆大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家杨学恒教授，他是主张有类似实数超光速的“快子”——实际这是“以苏解马”哲学意识形态；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承认的虚数的时空存在。我们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利用下午等课余时间，在大学图书馆读完《列宁全集》第1—33卷和《资本论》1—3卷等马列原著，看到马列等导师是反对一切归“无产阶级文化派”化的。但杨学恒教授说我们是学工科的，理论物理争论的问题不要管——正是他激励，我们对《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中文版《科学》试刊和后来正式出刊，期期的基本粒子、宇宙学、量子生物学等前沿科学高级科普必读。但我们后来发现《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中文版《科学》，因原文前沿科学高级科普全部照翻译，在我国喜欢的人不多，以致1979年创刊由于发行量等原因，于2005年底停办，中途已经几次更改原文前沿科学高级科普全部照翻译的方针；从减少原文前沿科学高级科普照翻译数量或删除原文难度，增加国内作者的科普文章等办法，想法保持最低发行量。所以到后来我们并不想订阅《科学》和《环球科学》，而是看到有喜欢文章的那期杂志才买——《环球科学》创刊，是《电脑报》杂志社获得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社新的授权，在2006年1月与《科学美国人》版权合作出刊的简体中文月刊。

3) 量子物理学家瑟奇是科学落伍者

A、《科学美国人》杂志反弦理论等主流科学吗？

a、“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克里斯·瑟奇的文章，用意是啥？2020年2月20日上海“观察者”网转载《科学美国人》的文章《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的文章，用意又是啥？“观察者”网的《导读》说：“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科学写作中心主任约翰·霍根，对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的专访，在这次专访中，克里斯·瑟奇猛烈抨击了对多元宇宙、弦理论和量子计算机的夸张宣传……他希望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

那么《科学美国人》杂志支持抨击“弦理论、大爆炸宇宙学、量子信息及量子计算机、基因工程”等前沿科学的主流研究吗？事情是否定的？道理是，

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在重庆看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内部发行的不定期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试刊本《科学》的第一期起，到1979年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月月发行的《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正式出版的《科学》杂志，一直到1990年初，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不再把《科学美国人》杂志的原文前沿科学高级科普全部照翻译出版发行，可以说《科学美国人》都是在传播国际科学主流发表的“弦理论、大爆炸宇宙学、量子信息及量子计算机、基因工程”等高级科普知识——而且这些介绍的成果，与专业杂志发表的专业论文不同——它们不是原创，不只是经过杂志编辑部请同行评议就可发行；例如，《科学美国人》发表的“弦理论、大爆炸宇宙学、量子信息及量子计算机、基因工程”等高级科普知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国际同行争论，已经获得大多数认可的东西。

所以我们正是从当时发行的《科学美国人》中文本《科学》杂志，以及上海办的《世界科学》、《自然杂志》等书刊，才了解和部分掌握的“弦理论、大爆炸宇宙学、量子信息及量子计算机、基因工程”等主流研究的前沿科学的。但为啥《科学美国人》今天要发表瑟奇抨击“多元宇宙、弦理论和量子计算机等宣传”？我们还是回到国内。

b、2020年2月24日我们的老朋友北京航天科工的高级工程师都世民教授给我们来信说：“对于我不熟悉的人，我不能发表看法。我从参考消息网看到一篇文章转发给你——《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你会知道我的意思”。

也许我们能知道都世民教授的意思，他是支持瑟奇抨击“多元宇宙、弦理论和量子计算机宣传”的中国人之一。道理是，2020年1月18日都世民教授给我们来信说：“对于政治问题讨论要谨慎，特别是敏感问题。关于引力波、引力场、引力子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黄志洵教授，有系统的研究，最近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引力波的存在提出不同看法，希望能否将这些不同年龄的，不同视觉的看法，归纳到一起，表明中国人的看法，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B、黄志洵教授研究

a、据互联网上黄志洵教授的简介：黄志洵，1936年5月生于北京，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院士的三儿子。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在原电子工业部第10研究所为技术员，工作地点在成都市。“文革”前回到北京，在北京朝阳电子仪器厂工作，任技术组组长。“文革”后在中国计量科学院做研究工作，为助理研究员。1985年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历任微波工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94 年成为“国务院颁证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传说他在 2003 年的同轴光子晶体实验中观察到 $V_g=(1.5\sim 2.4)c$ 的群速超光速。虽然他没说这是类似实数还是虚数？但从 2004 年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上，黄志洵教授作的“宇航科学前沿与超光速问题”核心报告看，他是主张实干“超光速”宇航设想的。1999 年、2003 年黄志洵教授两次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1999~2017 年间他发表过多种书刊讨论超光速问题，如《超光速研究---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子学与信息理论的交汇点》(科学出版社, 1999); 《超光速研究新进展》(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2); 《超光速研究的理论与实验》(科学出版社, 2004); 《超光速物理问题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7) 等。在《超光速物理问题研究》一书第 5 部分“基础科学研究评论”有 4 篇文章，其中突出地论述了黄志洵教授对大爆炸宇宙学等的批评和重建基础科学的理念。

B、由于国情和历史原因，“文革”开始，“反相反量”成为科学上层的主流。“文革”结束后，主要追究“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政治人物的“反相反量”，并没有涉及“反相反量”一般的追随群众。2015 年 6 月 19 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清华大学文克玲教授发表的《反对相对论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文章中：“在纪念广义相对论诞生 100 周年之际，科学网上发表了几篇极好的文章……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批判相对论的声音一浪高过浪。批判者的队伍，不但后继有人，而且是不断壮大。下面是一段网络资料的摘录，出自一位反相者笔下：在国内，科技日报社和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前沿科学》杂志，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 and 卢鹤绂格物研究所主办的《格物》杂志，以及一些高校学报和科技刊物，都在刊发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西陆网挑战相对论栏目、新华网科技探索栏目等网络媒体，人们能看到更多的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在国外，批评相对论的杂志也有很多”。

文克玲教授的批注说：“非常受中国反相者欢迎的一个杂志；他们的‘国际论文’很多就是发表在这个‘国际杂志科学’上的”。文克玲教授的文章继续报道：“极端的相对论批评者认为，相对论充满荒谬离奇的错误，所谓的相对论的实验支持都是牵强附会，相对论巧取豪夺了有关实践的光荣，因此，相对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相对论维护者为相对论所做的辩护，全都是强词夺理。对相对论持‘三七开’观点的批评者认为，相对论作为反映物质、时间、空间、运动和作用等事物的理论模型，它并不是物质、时间、空间、运动和作用等事物的全面写真照片，而不过是把局部写真与大量虚构拼凑起来的模拟图画。因此，相对论中既有符合客观

实际的内容，也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内容，同时，模拟图画内部也不乏自相矛盾的内容。在所谓的支持相对论的大量实验中，既有支持证据，也有否定证据。相对论与有关实践的关系是既有正确指导，也有错误误导” ----文克玲教授对后者批注注说：“这种战术要巧妙一点”。

文克玲教授在《反对相对论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最后提及的具体人物名单作者简介，“附录一”有：“齐新，1986 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系。2006 年 6 月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科普书《智胜爱因斯坦---方法与实践》。2009 年 6 月在《前沿科学》发表论文《狭义相对论被争论 100 多年的主要原因》”等。“附录二”提及 30 人：“1、董晋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光速不变不成立。2、付昱华，中国海洋石油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牛顿力学取代相对论。3、耿天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超光速可能性。4、顾梦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所研究员；相对论迷宫。5、郝建宇，大同化纤纺织厂高工；相对论创新。6、黄志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超光速实验。7、黄德民，海军西安代表处研究员；挑战相对论。8、季灏，上海东方电磁波研究所所长；能量超相对论实验。9、姜让荣，国家环保总局研究员；光速不变性有误。10、焦克芳，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超光速实验。11、林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教授；光速不变是假设。12、李文秀，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长度相对论逻辑问题。13、李映华，广州天河南华应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相对论重大吗。14、李子丰，燕山大学教授；狭义相对论有错。15、梅晓春，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所长；爱因斯坦时空存在严重缺陷。16、齐绩，大庆石油学院教授；新物理看相对论。17、曲元春，宁夏高工；相对论有逻辑矛盾。18、师教民；武夷学院教授；剖析相对论。19、宋文淼，中科院电子学所研究员；相对论辟新路。20、沈卫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相对论哲学有问题。21、谭暑生，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狭义相对论要找标准。22、仵凤鸣，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高工；奇点新论。23、许少知，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工；相对论数学有错。24、杨本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相对论数学反思。25、杨新铁，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超光速粒子加速。26、章钧豪，汕头大学教授；狭义相对论有错。27、朱永强，复旦大学教授；带电超光速观察。28、朱纪东，上海电力学院教授；狭义相对论有错。29、郑铨，科学出版社编辑；相对论质疑。30、庄一龙，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电子超光速新探”。

C、《科学美国人》和观察者网是“吹哨人”

a、科学类似抗击新冠病毒被赋予世界性的意义 ----中国胜，世界胜；中国败，后果不堪设想 ----即“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因为今

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也好，国家利益冲突也好，文明的冲突也好，都让位于一个词---“全球化”。这是复旦大学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曾常驻巴黎 20 余年的郑若麟教授，2019 年 11 月 26 日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网发表的《专访 | 郑若麟：划分今天世界两大阵营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全球化》一文所说的话。

科学--全球化--不再意识形态化，是如何做到的？就是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展现的，《科学美国人》和观察者网是“吹哨人”。

为啥？马列主义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中国“文革”结束，大胆直言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探索 40 多年中，出现以“华为”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短短近十年就迎头赶上世界电子信息企业巨头，并在 5G 基站领域实现世界超越，“华为”公司任正非总裁总结的是“进攻性马”的胜利，道出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科学全球化。

科学的全球化，不但具有建设的一面，也具有内外翻转颠覆性的革命一面---这在病毒--瘟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来。例如，2020 年 2 月 24 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介绍了考察组现场调研的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布鲁斯·艾尔沃德说：“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现在没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们只能拍拍手表示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既然没有药，没有疫苗，那么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人传人”病毒突然爆发，“没有药，没有疫苗”时，曾经抗击瘟疫使用过的办法中，即使考验证明是部分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可以暂时应用---这就类似基础前沿科学西方的相对论、量子论和传统的中医药一样。这里还有包括“封城”、“隔离”等不是直接属于医药和医疗的社会性的办法。

b、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总结人类发展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苏联虽然推行“以苏解马”---如主张自然科学也来东西方对立。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斯大林仍同美、英和中国等反法西斯大国，共同成立了“联合国”。

《科学美国人》是由发明家和出版家茹夫

斯·波特于 1845 年创立，至今已办了 175 年久负盛名的国际公认的著名高级科普刊物，全世界有 25 种版本 15 种语言在签约翻译出版发行《科学美国人》杂志，可见它的“去意识形态化”程度高，而重视科学知识的内容正确。20 世纪的科学标志性的量子论和相对论，实际它们的起源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1900 年普朗克提出量子论，是 1871 年刚刚打造成形的国家---德国为追赶照明工业争取到一个竞争优势，德国科学家奋斗了 10 多年的结果。爱因斯坦 1905 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 1916 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涉及的光速不变论实际与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 1846--1864 年间，研究电力和磁力彼此之间神秘的电磁场互动和应用有关。再到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 1945 年迫害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的希特勒垮台，漫长的 100 多年都是《科学美国人》杂志亲自经历的阶段，这中间的反相反量和推进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国际的科学斗争，《科学美国人》杂志不能没有分辨是非的认识和能力。

c、反相反量反中医到何时为止才有答案？正是到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有效途径开始唤醒的。由此可说《科学美国人》和观察者网是“吹哨人”。2020 年 2 月 24 日晚我们看央视 13 频道，主持人白岩松连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谈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如 364 名中医医护人员整建制接管江夏方舱医院，中医为主导的治疗中近 400 名患者中无一例转重症，治愈 50 人；在中医药早介入全程深度参与的广东省，重型和危重型病例大部分转轻症，有的则治愈出院---从中医角度评判分析新冠病毒、中医在轻症不转为重症是否有拿手的方法、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中医药在疫情应对中发挥的作用等，都说明中医药的疗效。

全国在新冠肺炎防疫作战当中，中医药系统抽调近 3200 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组建了四批 588 人的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和接管部分医院，像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特别接管的方舱医院，整个医务人员全是来自天津、江苏、湖南、河南、陕西，由五所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组成的医务人员。方舱医院里的每个病人都要吃汤药；对有个别需要调整的药，还有配方颗粒。此外还组织患者练习太极拳、八段锦，帮助他们康复，也活跃他们的精神、增强他们的信心；融入中医的理疗，包括针灸、按摩这些方法。

总的来说，病人情绪非常安定，医患关系非常好，总的效果不错。目前方舱医院已全部收关，有两个核心指标值得关注。一是病人痊愈的时间缩短了。因为新冠肺炎一部分是自限性的疾病，通过中

药的干预可以加速痊愈；二是避免轻症转为重症，这是关键。张伯礼院士说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观察，重症的转化率约 2%，而江夏方舱医院的病例还没有一例转化为重症。

c、2003 年的 SARS 病毒，也是对中医的一次挑战。17 年过去了，中医有了哪些积累？17 年间的区别是什么？张伯礼院士说：“17 年前中医治疗 SARS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激素用量相对较低，治疗效果相对好，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为我们这次治疗新冠肺炎增加了底气。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诊疗中，中医诊疗在短时间内提出了诊疗方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那么“中西医结合”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合？张伯礼院士说：“经过实践以后，对新冠肺炎轻症的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把它拿下来。对于重症，还是以西医为主，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生命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支持才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而中医在这时候是配合的，虽然是配角，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可或缺。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有些病人的氧和水平比较低，血氧饱和度经常波动，这时候我们给他生脉注射液和独参汤，一两天后血氧饱和度平稳了，再过两三天基本达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说中医在急症方面有时也可以力挽狂澜”。对未来的“中西医结合”走向什么方向？张伯礼院士说：“争‘中医西医孰强’没有什么意义。治好病是真的，各自医学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短处，西医对一些急性的重病抢救的时候，那些手段谁也替代不了。对一些慢性病，改善功能性疾病，中医的优势又很突出。中国人感到幸福，有两套医学保证，有什么不好的呢？”可见从说“中西医结合”有什么不好，说明张伯礼院士类似华为任正非总裁，是赞成“东西方交流”属于“进攻性马”的新时代人物，与“东西方对立”主张存在的“以苏解马”是分道扬镳的。

d、其实，西方搞“冷战”，实质也类似搞“以苏解马”。当然中西医的差异，并不类似、也不等于“进攻性马”与“以苏解马”的差异。为啥？张伯礼院士解读中西医的差异说：“中医不管你病毒怎么变，重视的是改变病人的内在环境，注重的是求因治病。西医重视的是那个结果，也就是病毒。见病毒就要杀，必须去研究‘特效药’，研究‘疫苗’才能行。在没有研究出来之前，只能是支持性治疗，靠自身免疫系统自己工作。而病毒可能会变异，于是陷入到不断的研究中。中医是标本兼治，而西医则只是治标”。

张伯礼院士的解读是对的，但也还未站到全球化前沿科学的“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的高度，来对应“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于淼博士，2018 年 11 月 12 日在科学网的博

文《暴露组学的黎明》中说：“暴露组学从名词提出，到现在大概 10 年有余。2018 年 11 月在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召开的第二届暴露组学会议，就相当于 20 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也许接下来的 10 年内，它的研究经费与成果可能出现‘井喷’……暴露组学研究什么呢？它的基本问题跟基因组学差不多----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伴随测序技术的进步，针对个人的测序，已经是可负担的了。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健康是目标，这里预测变量却非常多，很明显不是一个单因素模型。所有暴露组学属于面向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学科，基础包括不限于统计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公共卫生、医学、遥感、传感、自动化、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并不知道哪个学科更重要”。

这里如果把“暴露组学”对应“中医药学”，是说：“中医不管你病毒怎么变，重视的是改变病人的内在环境，注重的是求因治病”----这是对“暴露组学认为的：“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健康是目标，这里预测变量却非常多，很明显不是一个单因素模型。所有暴露组学属于面向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学科，基础包括不限于统计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公共卫生、医学、遥感、传感、自动化、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并不知道哪个学科更重要”。相反，“基因组学”对应“西医药学”，是说：“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伴随测序技术的进步，针对个人的测序，已经是可负担的了”。

所以我不赞成饶毅教授在 2016 中信书院线上年会中，发表《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的演讲里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于是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激励自己。这种说法后来经由外国人特别是英国的李约瑟‘出口转内销’以后，对我们在心理上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传统？有，但不多，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只是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这里饶毅教授把中医说成“简单”的代表，认为“我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而古希腊才算科学的起源”。

二、反相反量反中医被“吹哨”底线

1) 中西医结合的统一性是一致的

A、饶毅是不知暴露组学的前沿科学家

a、饶毅教授虽然是新时代归国的著名现代生物

学家，但似乎并不知晓“暴露组学”，只懂得“基因组学”。中医类比“暴露组学”，确有宏观、接地气的特色，而被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论坛”召集人宋正海教授等，称之属于“整体科学”；相反把西医说成单纯、微观，是属于“还原科学”，而主张“东西方对立”到底的“以苏解马”。

宋正海教授和黄志洵都是我们尊重的人品很不错的老科学家，我们赞成任正非总裁的“进攻性马”——任正非总裁讲高科技的突破，并不讲“整体性”、“还原性”，而是强调对数学研究的重视。跨百年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和生理或医学奖被大多数国家公认，而文学、和平和经济学奖，争议较多，是因为与前三项相比，后三项参与意识形态较多，而世界各国本身是意识形态化的。“进攻性马”与“以苏解马”对决的胜出，是1992年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暴露”了它有缺陷。由此也证明，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完整的长序列过程链，单纯把古希腊的几何、逻辑的“抽象、系统、深刻”作为标准，是只看到西方的小“伊甸园”，没有看到中华的“大同世界”一直在线。

中西医结合的统一性是一致的，不是人为，是自然发生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两大标志性科学：量子论和相对论，100多年中也在追求统一。而竞争、比较的结果壮大的“弦理论”，也被归纳为“量子引力学”——而“弦理论”照亮中医科学的“弦论”，如2015年12月13-14日我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2届全国自然国学创新论坛大会，著名中医药专家俞梦孙院士作《动脉血压共振研究》报告，我们听得就像讲“管线弦”、“套管弦”、“试管弦”等拓扑弦理论的路径积分一样。因为类似摸脉——俞梦孙院士一连讲了：动脉血压血供收缩压和舒张压所构成的脏腑血供共振系统，联系血液本身物理性能和血管状态影响的共振效果；动脉血压及其搏动波形起的类似“气”的作用；血液搏动在血管内壁内皮系统表面产生剪切力促进NO酶产生；动脉血压及其搏动波形的中医气血理论等，就类似物理学弦理论中讲的“拓扑序”和“量子序”一样。

弦理论是“开弦”和“闭弦”两分，加之“弦”振动，但这不是全部弦论——如果抽象网络、电路，血管、神经、河流、道路为“开弦”，这样开弦不仅可振动，内在开弦也可流动。这里开弦和闭弦结合统一在一起，开弦可以像大江、大河有大坝、闸门——弦理论的一个更重要联系是庞加莱猜想：即三维空间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的一点，就等价于是圆球——可称“正定理”。那么逆定理，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类似一点，其中只要有一点是曲点，那么这个空间就不一定是一个三维的圆球，而可能是一个三维

的环面。所以有人说：量子色动弦学瓜熟自落，也得力于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千禧年大奖“难题”庞加莱猜想被解决。

2012年第7期《环球科学》杂志发表陈超教授整理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一文中说：“2006年，借助于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熵流，人们把时间和热力学、量子论、相对论、超弦论等联系起来……1904年，法国科学家庞加莱提出庞加莱猜想，奠定了当代前沿科学的数学基础。即正猜想的收缩或扩散，涉及点、线、平面和球面；逆猜想的收缩或扩散，涉及圈线、管子和环面；外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及翻转，涉及正、反膜面，和点内、外时空。这标志着传统科学的结束，革命科学的开始”——这里谈的“庞加莱外猜想”，就是1953-1963年间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提出来的，称为“柯召-魏时珍猜想”：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断破能翻转，也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它综合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庞加莱猜想逆定理，并超越它们的证明而成为第三次超弦革命的先声。

柯召-魏时珍猜想的“内外翻转”，类似空心圆球膜面加奇点式的翻转反包围，与一般循环周期不同，且含有类似新陈代谢、阳泄阴收的内外翻转非线性和熵流等性质——这特别与中医针灸的内外翻转，这里的量子流体可以象征宽窄人工智能：“人”和“机器”智能的“翻转”，及量子数据信息流的扩散、反馈。而且这也与有线、无线电话、电视、互联网等用于远程类似封闭空间内外信息隐形传输的联系——也许可以说庞加莱猜想正、逆、外三定理的封顶证明，也是基础自然科学理论发展封顶走到尽头——就像哥伦布的环球旅行证实地球是圆的，地理大发现要转向一样——这个标志就是2019年7月16日“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发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格林讲席教授文小刚的《物理学的新革命——凝聚态物理中的近代数学 | 众妙之门》的科普报告，以及2019年7月24日“科学网”报道：2019年7月23日文小刚教授做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作题为《物理的新革命——量子信息：物质和相互作用的起源》的科普报告。

文小刚教授正是师从国际弦理论大师威滕教授学习超弦理论，然后转向凝聚态物理才取得中科院重视的科学成绩的。文小刚，1961年生，西安人。197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81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1989年首次提出“拓扑序”概念，他引入对称保护拓扑相等概念，建立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拓扑序理论和边缘态理论，预言双层量子霍尔体系中的超流/超导现象；揭示拓扑序和量子序的弦网凝聚的本质，并用弦网凝聚提出了统一光和电子等理论。1991年文小刚到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任教,1995年被提升为教授。2002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17年获国际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巴克利奖。2018年文小刚获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狄拉克奖。

文小刚教授的《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这本用于研究生和有关教师、研究人员的教科书,恐怕在数千所大学中能真正学懂的人也不多---因为全书都充满近代高等数学微积分冗长推证。但该书2004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到2017年已经印行了4次。原因是文小刚教授1989年首次提出“拓扑序”概念,揭示拓扑序和量子纠缠的深层联系,虽然此后十多年因新的量子自旋液体和非阿贝尔物质态,一直没有被实验实现,“拓扑序”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直到1999年之后,才成为现在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主流。所以中国的有关研究生、教师、研究人员不得了解。

b、也许“反相反量”倾向性,与意识形态全球化有关,而“识相识量”是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反相反量”倾向性只停留在“列维-齐维塔”水平,使探索精神找不到方向?而“识相识量”在“二战”后,能推进一次超弦革命,二次超弦革命,三次超弦革命,直到文小刚教授开辟“量子凝聚多体”、“拓扑序”、“自旋液体”等创新,出版《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作为新时代科学全球化--不再意识形态化的竞争、比较中的代表作,让前沿量子物理学家中不少人落伍,转为猛烈抨击弦理论。例如,2020年1月9日“反相反量”推手马海飞教授推荐新浪网“志杰海明博客”专栏,转载发表的文章《Science首次发表负面论文:消失的“天使粒子”》,就涉及国外个别实验室质疑一维、二维相有关量子霍尔效应、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研究---这项研究国内外“识相识量”的中国人参与的很多,如从崔琦、张首晟、薛其坤、修发贤到曹原、文小刚等科学家。但2019年1月8日国家2018年度科技奖揭晓,薛其坤院士带领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组成的实验团队,因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马海飞教授推荐的文章发表之后,2020年2月22日“清华大学”官网发表《薛其坤院士荣获2020年度菲列兹·伦敦奖》的新闻,又报道菲列兹·伦敦奖评奖委员会宣布,2020年度菲列兹·伦敦奖将授予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薛其坤,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 Vinokur 博士和德国马普学会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的 Steglich 教授---评奖委员会的说明是:薛其坤是因为在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而斩获这一崇高荣誉的。薛其坤是自1957年该奖设立以来,

首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科学家,第二个来自亚洲地区的科学家。菲列兹·伦敦奖是国际公认的低温物理领域最高奖。2020年度菲列兹·伦敦奖将在2020年8月15-22日,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召开的第29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上颁发。

2) 暴露组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A、暴露组学“矛盾论”新传

“暴露组学”虽然2018年才传入我国,作为新的前沿科学,在2019年底到2020年初突然袭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后,确成为“吹哨科学”,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封城”和“隔离”并不是“基因组学”的任务,却成为“基因组学”抗击疫情的必要补充---基因组学原以为只要更多地依赖基因;伴随测序技术的进步,针对个体的测序,就已经够了---这类似以前宣传的“矛盾论”,只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虽然也讲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但社会是处在意识形态化中,似乎逻辑合理的抓住“主要矛盾”的说法也就意识形态化。

“暴露组学”是“进攻性马”自然的丰富和发展。例如,它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健康是目标,这里预测变量非常多,很明显不是一个单因素模型---它的基础“包括不限于统计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公共卫生、医学、遥感、传感、自动化、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并不知道哪个学科更重要”---这样看,它把传统的中医药也自然带进到前沿科学思维。

而饶毅教授说的古希腊几何、逻辑的“抽象、系统、深刻”科学,也类似“基因组学”,并不完整、完善---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科学从来就是全球化的,中西医结合从来都是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医药和瘟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爆发过几百次大大小小的瘟疫,不然怎会都挺过来了;当时中西医只不过是地理分开,暴露组学的逻辑类似“进攻性马”一直是存在的。

B、中国是一个弦理论古国、大国

a、“识相识量识中医”,与“反相反量反中医”不同,为啥中医药能与前沿科学的量子论和相对论并列,因为从量子论和相对论统一发展推进认识的“弦理论”看,中国从历史以来就是一个“弦理论”古国、大国---“弦理论”的最高理论基础是“卡拉比-丘成桐空间”。但“卡-丘流形”的翻转“炸开”办法,与中国本土弦理论的“庞加莱外猜想”---即1953-1963年间,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

魏时珍教授提出来的称为“柯召-魏时珍猜想”---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这里的“不撕破”与“炸开”是不同的，造成的结果也不相同。

b、拓扑及轨形拓扑与两次超弦革命紧密相联，也与丘成桐教授开创的卡拉比-丘流形的紧致空间相联---超弦理论以紧致空间为特色，但不限于卡拉比-丘流形，还包括轨形、对偶性、镜对称性、引入D膜等方案。例如，互为镜像的两个卡-丘空间，在卷缩维几何形式时，将生成相同的物相同的物理；这种在弦论背景下的一种对称性，称为镜像对称。在物理上等价而几何形式不同的卡-丘流形称为镜像流形---镜像对称的意义，是有些极为困难的计算。

虽然在镜像空间中，有的变得相当简单：同一类型的不同形式，可以不经它们结构破坏而相互变换。卡-丘流形发生结构破坏的空间变化，称为拓扑改变。翻转变换和锥形变换是弦论中出现的两种拓扑改变。但这些都是几何拓扑的高级内容。例如“炸开”有类似撕裂、断裂的意思；撕裂必然要有粘贴、聚合，这是属于类似轨形拓扑的内容，而已不属于一般拓扑。卡拉比-丘流形包含了大量撕裂与粘贴的内容，造成大量卷缩维形式的复杂的高维几何图象。

由于“卡-丘流形”的翻转的撕裂，比“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的条件宽，所以超弦理论在四维时空中的具体物理预言，卡拉比-丘成桐空间虽然能够预言紧致空间的具体结构，但它联系超弦理论预言的卡-丘流形，还有三大问题：(a)弦理论解决了物质族分3代与卡-丘流形3孔族的对应，但仍有如何排除多孔选择的难题；(b)弦理论解决了多基本粒子与多卡-丘流形形状变换的对应，但仍有如何排除多种形状选择的难题；(c)弦理论解决具体的基本粒子的卡-丘流形图形虽有多种数学物理手段，但也遇到选择何种数学物理原理为佳的难题。

c、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控、全球合作，“暴露组学”+“弦理论”阐释“进攻性马”东西方交流的全球化不舍不弃，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和“科商”---创新不是抄袭和简单的模仿；争先不一定是抢先发表。即使在西方，1974年丁肇中教授首先发现“J”粒子的粲夸克，也并没有抢先发表。而是等到B·里希特教授也发现了这种粒子，取名 ψ 粒子才发表；所以粲夸克也叫J/ ψ 粒子。而早在伽利略时代，发现新东西也不是解密发表，而是密文发表，等到有别人也发现后，才公布密码密钥说明自己早有此事。

说中国是“弦理论”的古国、大国，也许很多人只认为中国古代最早提出“弦学”是“玄学”，起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哲学，而成为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在

近代也泛指一切研究不可知本体的学说。其实到明代的儒学大师、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也集“弦学”之大成---“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已具有由此及彼的自然联系到思维联系的自然全息印记。其次解放后众所周知的“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些话，以为中国的弦论是政治、是哲学。其实中国的自然科学弦理论，早也有系统研究。

d、西方的“弦理论”基础涉及的“庞加莱猜想”和“卡-丘空间”，更有全息原理、全息宇宙的三维投射二维膜面的描述---西方的激光全息图像技术--全息投影的发明，纯属偶然，它是1947年英国物理学家丹尼斯·盖伯在研究增强电子显微镜性能时的意外所得，在1948年提出了新的两步无透镜成像法---波前重现原理。

但该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在电子显微镜中有用武之地，被称为“电子全息术”，直到1960年激光的出现才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全息投影概念。1981年张颖清教授提出生物全息律，也只是抓住与激光摄影全息效应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联系，并没有从弦理论上作想。而我们是1962年在盐亭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冬天一次回家帮母亲煮饭，帮母亲放牛时，牛突然伸头想吃竹林边生长发育的竹笋。这一惊使我们一是想到与竹笋生长类似的弦线，可以增长；二是竹笋的竹壳端的竹叶，虽然很小，但可以联想到它与竹桠枝端上生长的大片竹叶有相似的形态。即早期竹笋竹壳端上的发育，与后期竹桠枝端上生长的大片竹叶有全息的相似。也类似海克尔的“生物重演现象”，由此可再发挥，与激光全息投影图像技术中需要两束相干光线联系，称为“自然全息”。

我们对这种“两者相干”的注意，产生的由此及彼的自然联系到思维联系的自然全息印记，当时只简单地叫“类比原理”或“枝干原理”。但正是从这里的弦论思维发育开始，到1981年看到《百科知识》杂志发表中国科技大学方教授的文章，谈“不平等宇宙起源”（即“暴涨宇宙论”）与“大爆炸宇宙论”，是一对矛盾，还无法解决---

这使我们想到：数学上的“三点共圆”和“分形分维”的推证方法，能把“暴涨宇宙论”与“大爆炸宇宙论”统一起来。如计算出的圈态耦分形维数值1.26179，与国内外天文学家研究宇宙的分形结构，测得的星系分布的分形维数约为1.2相近似。道理是按“三点共圆”和“分形分维”方法作图，如此变形下去，随着变形的进行，会发现小圆圈不但向外扩展，而且还向中心位置堆积，以及在其周围形成等级式的成团分布等重要特征。但方教授不喜欢中国本土的弦理论创新，认为“弦理论”、“旋

理论”西方早在196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了。

e、西方的弦理论发展到1993年，由荷兰物理学家赫拉尔杜斯·特霍夫特提出全息原理，和1994年美国物理学家伦纳德·萨斯坎德（李奥纳特·苏士侃），进一步阐述有引力的量子系统都按全息不需要整个三维空间，二维描述就够了。即我们从自然全息，之前也想过全息还包含一种“降维”原理---类似抓住激光摄影，把3维物体变为2维胶片，而可以用激光随时复现该3维图景来联系。

但此时的西方全息原理，比彼时我们想的更深更宽---萨斯坎德认为，世界上每一比特的信息，都存储在我们宇宙的边界上；边界就像全息图一样记载了全空间的所有信息，包括所有的物质组成，所有的相互作用，所有过程都是既不违反量子力学、也不违反引力理论---全息原理成为物理学近60年中最具革命性、最重要的物理思想，其地位相当于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相对论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或等效原理，是物理学的公理性原理。萨斯坎德和其他超弦学家合作，构造出一些具体黑洞的熵，弦理论如何结合全息原理获得巨大发展等。而特霍夫特1999年和他的老师韦尔特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18年特霍夫特还聘为四川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3) 本土暴露组学抽象、系统、深刻的自信

A、超弦全息原理本土创新的两大推进

后来居上的西方弦理论获得巨大发展的全息原理，抓住激光摄影3维物体变为2维胶片的“降维”，以及结合全息膜面、边界面阐述发挥的M理论，确实比1981年张颖清教授提出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生物全息律，以及我们在1982年《潜科学》杂志提出的“自然全息”，发挥激光摄影“两者相干”阐述由此及彼的自然联系到思维联系的自然全息印记，更“抽象、系统、深刻”---但这不是说，类似本土暴露组学的“中西方交流”的全息弦理论，就缺乏自信，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以致丢掉“进攻性马”---其实，真缺乏自信的是那些极右或极左的“以苏解马”的人。

早在特霍夫特和萨斯坎德阐述量子系统“按全息不需要整个三维空间，二维描述就够了”之前，中国古代“易经”的太极图形，就具有膜面、边界面的翻转性质。但直到几千年后的1953-1963年间，才有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科学家推进“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学家的“灵魂猜想”，提出称为“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等本土创新的超弦全息原理，已开始再夯实了中国是弦理论古国、大国的地位，塑造了东西方科学的抽象、系统、深刻，必然是去意识形态全球化的交流合作互补。

B、阴差阳错有关文志英--刘奎林教授的往事

a、关于我国古代太极图形是类似膜面、边界面翻转的墨比乌斯圈研究的公开，是1986年11月6-10日在南昌召开的“全国思维科学与智力开发专题学术讨论会”期间，我们向五位与会代表：上饶师范学院的吴长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罗以迪教授、南京军事外国语学院的李宏军教授、中国矿业学院的王新泉教授，以及北京工业学院的林学谛教授等作了交流---今天，在我们看来无头无脑的太极图徽，实际上是积淀了三旋运动的内在秩序---太极曲线采用的形式语言，实际上是概括地或近似地表达出来的一种墨比乌斯圈数学结构；太极图徽所含蕴的三旋运动，正是它抓的主要的数学关系。

即作为太极思维，它首先要抓住的数学关系是类圈体。因为只有类圈体的自旋，才能反映太极的原始返终，也才能区分出三种自旋。而理解三旋的关键是吃透线旋：六千多年前，伏羲氏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水面上的旋涡；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的翻滚，就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伏羲氏动了不少脑筋，例如要把摆卜爻文字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蓍茅草叶，圈起来扭转比划，终于发现和揭示太极图徽所包含的隐秩序---我们不妨先做个小实验：取一张狭长的白纸带，将另一面涂黑，且在正反面中央画一根直线，这样，粘合两端做纸圈，外面是白色，里面是黑色。假设有一只蚂蚁在白色一面沿中线爬行，不许超越边线，那么，这只蚂蚁爬来爬去，总是在白色的一面。

相反，如果这只蚂蚁在黑色的一面爬行，那么，它也就只能老是在黑色的一面爬行了。当然这种纸圈是不能暗示线旋的。但如果我们改变纸带的粘合方法，使其中一端翻一个面，让黑的一面反转过来与另一端白色的一面粘合起来，奇迹会出现：蚂蚁如果在这种纸圈上自由爬行，它不跨过边线，就能到达黑白两面所有的地方，于是纸圈变得只有一个面。这就是1858年才由德国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墨比乌斯首先再发现的数学现象，后来这纸圈命名为墨比乌斯圈。

墨比乌斯圈所暗示的就是线旋，说得更明白一点，即不平凡的线旋。太极图徽所积淀的也就是这种不平凡的线旋运动的重要意义。这可以类比魔方表面上的转座子---每一小块都可以移动---如果把八卦太极盘，拟设换成魔环器，即沿着魔环表面的转座子位，并列写几行太极八卦数列，再设想它们作面旋、体旋、线旋运动，由于运动总有干扰，因此我们在瞬间看到的数目太极转座子，三旋是把对称、有序、混沌在做统一起来。南昌聚会经过大家的深入讨论，林学谛教授建议：北京工业学院办有内部刊物《思维科学通讯》，她可以推荐我们和罗以迪、吴长庚、李宏军、王新泉等合作写论文发表。

林学谛教授说话算数，1987年第一期《思维科学通讯》增刊发表了我们的《太极思维的三旋数学模型》。1988年公开发行的《上饶师专学报》第1期也发表了我们的继续完善的论文《论太极思维的三旋数学模型》。

b、如果把超弦的“三点共圆”和“分形分维”的方法，解答“暴涨宇宙论”与“大爆炸宇宙论”的统一，计算出的圈态耦结分形维数值1.26179，称为“宇宙量子分形分维学”。此论1986年我们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二期发表的论文，是先将三旋理论称为“超旋”。但中科大教授方院士，在1987年给我们的来信中，矢口否认说“超旋”就是“超弦”，而说超弦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产物等。但我们查证1960年代初的靴祥理论，没说是超弦理论，最早是1968年才产生的弦论。所以我们总想找机会，发表“宇宙量子分形分维学”。

1989年的春天川大李后强教授，当时他读博士研究生快毕业，他给我们来信说：1989年川大要主办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建议我们参加研讨会，争取把“三点共圆”和“分形分维”方法的计算，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正式公开发表。但参会论文寄出不久，1989年方教授涉足的“风波”在天安门爆发，分形理论研讨会的事没消息了。6月10日我们到省科协开会去成都，晚饭后顺便去看望李后强博士。巧的是在川大遇到他正去招待所请研讨会学术委员，专程赶来的文志英教授吃饭，就叫我们作陪。

原来天安门风波后，国家仍允许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召开。文志英教授后来任过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是武汉大学教授。1986年获南巴黎大学数学博士，是法国数学大师、“分形几何学之父”伯努瓦·曼德尔布罗的关门弟子。吃饭间，听文志英与李后强摆谈提到一点“89风波”，我们顺便插嘴，但他们不想听方院士不喜欢“三点共圆”和“分形分维”的方法的“土著弦理论”。这时李后强把我们及其提交的论文介绍给文志英教授，文志英教授一下穷追不舍要我们讲：怎么把有分形分维特征的墨比乌斯圈和太极图徽联系上的。

文志英教授听我们讲到三旋的非平凡线旋研究，使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太极图就是著名的墨比乌斯带时，他兴奋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太好了！三旋联系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我这次来成都回武汉后，就要到法国去访问。你们回去马上把这个研究写篇文章寄给我，我好带出去发表”。

正是由于这次与文志英教授的偶遇，原本川大研讨会学术委员对我们提交的“宇宙量子分形分维学”会议论文有疑虑的人，在成都终审参加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论文时，文志英教授和李后强博士一

起说服川大主管老师，同意我们用环量子自相似分形研究宇宙星体分布的论文入选论文集。1989年7月13-16日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讨论会召开，会上发行了川大出版社已出版的论文集《分形理论及其应用》，我们的论文《三旋理论与分形分维》发表在该书105页。

c、真是阴差阳错---我们回盐亭县科协后，写给文志英教授的文章，装到给黑龙江省党校刘奎林教授的信封里；而把参加黑龙江省党校等主办的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应给刘奎林教授的论文，装到给文志英教授的信封。三个月后，刘奎林教授给我们回函，说寄给他的论文和信，是该给别人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当时慌忙中装错了信。

C、不得不说的衣俊卿教授现象

其实，古代太极图形是类似膜面、边界面翻转的墨比乌斯圈，我们在成都第一届分形理论讨论会后，也向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以渝教授说过。当时他是德阳机械学校的年青讲师。那是在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成都开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摆谈到文志英教授说“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的事情，引起李以渝讲师的兴趣，我们并把作图方法也告诉了他。

李以渝，四川人，1956年出生。四川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西南财经大学MBA研究生进修班毕业。德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喜欢写自然辩证法论文。当时我们是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事。事情过后的1990年代初，李后强教授从成都打电话到我们工作的盐亭县科协，告诉我们他在《新华文摘》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有抄袭我们的太极图形联系墨比乌斯圈及其作图之嫌。我们找到李后强教授告诉的那期《新华文摘》，看到文章是李以渝教授在黑龙江大学主办的《求实学刊》杂志上发表后，《新华文摘》才转载的。这时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以渝教授没有说明太极图形联系墨比乌斯圈及其作图，是我们告诉他的。而文章模糊似乎是他的发现。

李后强教授知道我们说给他和文志英教授的太极图形与墨比乌斯圈有关的事，如果不是我们抄袭李以渝教授的发现，应该请《求实》杂志发表一个说明。我们查到黑龙江大学的《求实学刊》杂志的主编是衣俊卿教授，就给他写信说明太极图形与墨比乌斯圈有关，是我们告诉李以渝先生的；而早在1987年第一期《思维科学通讯》增刊、1988年《上饶师专学报》第1期，和1990年5月公开出版的《中国气功思维学》一书中，发表的有关内容可以作证；但李以渝先生的文章《参考文献》和注释中，都没有标出。因此要求他作一个更正。

衣俊卿，1958年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76-1978年虎林县下乡知青。1978-1982年北京大

学学习。1982-1984 年黑龙江大学助教。1984-1987 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读研究生,获哲学博士。1978-1993 年黑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求实学刊》主编。后来该刊改为《求是学刊》。当时衣俊卿教授给我们回了信,大意是:“得知李以渝先生的失误后,我们很抱歉。但我们不能登更正,因为《求实学刊》是权威杂志,在国内很有影响。解决办法是,寄一篇文章交我们采用,作为补偿;其次我们给李以渝先生写信,叫他给你们道歉”---看了衣俊卿教授的回信,感到他的诚信是建立在重权威面子上的自信;加之李以渝教授也来信说他今后改正,就没计较。

2013 年衣俊卿教授在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的位置上,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的新闻传来,证实自信不诚信终有因果报应。

4) 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求真之辩

A、不能说宗教信仰和老祖宗的本草什么都对

a、从自信要敬畏诚信,谈中国是弦理论古国、大国的超弦全息原理本土创新---一是古太极八卦数列转座子图的三旋面旋,体旋、线旋运动,把对称、有序、混沌在做统一;二是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接近而不雷同“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学家的“灵魂猜想”的“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即公开称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等两大推进,我们想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求真之辩”和“创新全球化科学隔离宗教信仰”---即使承认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等于没有法律和场所的区别,来评美国克里斯·瑟奇。

b、因为在全球发生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要准确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并不容易。但此波发自韩国、伊朗等疫情的扩大,却带有当地独特的宗教印记---韩国中央政府已经下令禁止进行聚众宗教活动---“新天地”教派公开叫嚣“战胜新冠病毒只能依靠上帝”等---1978 年郑明析创办的新天地教会邪教,还从韩国扩散到中国东北等地。2007 年郑明析在北京被捕,遣返首尔判刑入狱。我国打击国内邪教组织。因为邪教信仰没有自己宣传的那么纯粹。在韩国教会组织,紧密攀附财阀和权贵,邪教头子“南无慈悲造化佛”头目的崔太敏,是前总统朴槿惠的“精神导师”,女儿崔顺实长期作为朴槿惠闺蜜干政---以基督教为幌子制造五花八门的新教义,一但跑偏就成了邪教。

c、“暴露组学”解读全球化时代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说明中西医结合交流中的自信,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求真之辩的诚信中进步的。如上海中医药大学玉森新药创始人玄振玉教授,谈在传统中医的疗法中,常有蝙蝠、果子狸、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入药的实践,怎么看的问题?玄振玉教授的回答是:“中药主要分为植物药、矿物药、动物药。自

古以来野生动物入药并非中医主流,所以我们吃的中药又被称为‘草药’,历史上也有些中医大家如孙思邈,一直反对用动物药。现代社会必须严格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比如绝不能因为通乳需求,就去残害野生穿山甲。‘随机双盲大样本’是现代药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中医药也应该遵守。只是目前中药在盲法方面,比化学药生物药有更大难度。这些虽然有一定难度,相信不久的将来,一批设计科学、数据可信的中药新药会逐渐上市。中医也要不断吸收先进的现代科技,才能与时俱进长远发展。现代科学证明的无效或有害动物药,比如携带大量病毒的蝙蝠,要坚决禁止入药,古代的本草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的糟粕,不能说老祖宗的什么都对。《本草纲目》在当时年代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但几百年过去了又会发现李时珍由于时代局限而记载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这些都要实事求是地辩证对待。中医之所以能够被重视,主要是其疗效和经济性。几千年来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医一直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一场新的瘟疫到来,中医可以不用知晓致病的微生物种类,而通过辨证论治,即可拿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这一点是目前现代医学所做不到的”。

B、创新全球化科学隔离宗教信仰关键在建模

a、科学隔离宗教神学,关键在“建模”上。我国是世界唯一没有创建统一宗教的古国大国,即使所谓的“儒学”被有人称为“儒教”,其实“建模”也只是落实在“顶层有顶层的设计,底层有底层的守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礼教。但言怪力乱神被司马迁说成“其文不雅驯”---敬鬼神而远之,名师导航,早在孔子就主张不谈怪力乱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从不谈怪异、武力、叛乱、鬼神的事情。有人说:孔子对鬼神这种虚无缥缈的事物,采取了一种务实态度,或者说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有人说这是“误解”---说孔子要求的“远之”,是针对敬事鬼神的人来讲的:他是强调必须在行为上保持距离;与心中存在有距离感,才能体现出与保持住人对鬼神的敬畏,也对。因为研究远古原始社会的联合国时代,讲神话类似今天讲“政治”---原始的贫瘠、落后、险恶的生活、斗争,对部落、游团,酋邦的人来说,没有多少兴趣。为了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斗志、团结人心,把经历的事情及意义编得传奇,更有益长久记忆、流传。即讲神话类似“突出政治”---《山海经》、《圣经》等神话、神学古籍,其实类似远古原始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b、从远古联合国把讲神话类似“突出政治”,到后来“世俗社会”产生“宗教”、保留“宗教”,到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

政体----1979 参与革命的主体是伊朗贫苦的百姓,与国王军队作战的是由共产主义支持者组建的游击队,这些群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重新缩回黑色的长袍中,只是想真正地改变平民百姓的处境。40 多年来显示如今世界走政教合一政体的迹象,成为像继 1917 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又一大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世界社会变动潮流----一是即使 2012 年穆尔西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民主”选举中上台,颁布的新宪法离政教合一只一步之遥----宣布伊斯兰教在埃及法律体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张宗教领袖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在 2014 年被军方总统候选人塞西以 96.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推翻。另像 2007 年土耳其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揭晓,执政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获得 46.7%得票率的压倒性胜利,远远高出该党 2002 年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 33.4%得票率,显示出土耳其民众并不认为一个倾向伊斯兰教的政党会对土耳其的民主构成威胁。二是印度人民党竭力鼓吹将印度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印度教国家,这一意识形态明显地违背了世俗的印度宪法;但 2014 年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在“民主”选举中上台,印度人民党加大马力招募新党员;2015 年总理莫迪称,党员已经破亿成为世界最大政党。三是 1991 年“颜色革命”解体苏联后,俄罗斯东正教在复兴导向。

c、也许远古人类文明把神话类似“突出政治”讲得最“抽象、系统、深刻的”的国家,也是最先实现自然科学最“抽象、系统、深刻的”的国家。证据就是古希腊----“荷马史诗”等古希腊神话,是世界上最“抽象、系统、深刻的”的神话故事。虽然我国也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一个个著名远古神话故事,但系统、连续时间长度、细节还比不过“荷马史诗”。加之孔子不主张谈怪力乱神,减弱了宗教信仰神学对世俗社会抗击类似“人传人”新冠病毒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制约的力度----所以能出现如《黄帝内经》和“神农尝百草”传说等中医药的科学探索。

相反古希腊文明,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祸中消亡了。也许在之前的个别古希腊先贤,已认识到只有建立“抽象、系统、深刻的”世俗可重复验证的知识模型,隔离宗教信仰神学的负面效应,远古时代神话类似“突出政治”的正面意义,才能转化为人类世俗社会当时自救的真实“政治”----2020 年全球抗新冠病毒疫情就是再次证明。

d、原始社会群体把神话作类似讲“政治”、“突出政治”时代的结束,也许与类似“人传人”的新冠病毒疫情,曾多次发生也有关。陈胜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的博士生导师,2011 年前后参与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为瘟疫而废弃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他说:“通过欧亚大陆(主要是中亚与西欧)数个遗址出土人类骨骼牙齿中提取 DNA 分析,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鼠疫直接证据,距今 5000 年左右,比有史记载的鼠疫灾难至少要早 3000 年”。而哈民忙哈遗址和另一处同样可能因为瘟疫而废弃的遗址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让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够一睹史前时代瘟疫的影响,也由此可以了解瘟疫产生的条件” ----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

陈胜前教授说:“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性是瘟疫的温床。独居的动物即使感染了致命传染病,也不会殃及整个物种。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依赖社会性的动物,人类通过社会,有了语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时,因为存在社会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体才可能传播扩散”。由此看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一有足够集中的人口;二是买入城邦外的农村带致命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城镇之间的商贸流动大,吃了类似带“人传人”的新冠病毒野生动物,疫情发生是死一大片。相反,封闭的农村即使发生致命传染病瘟疫,死光也是一个封闭的小区----疫情产生的“隔离”,也使“基因组学”类似的西方自然科学建模,和“暴露组学”类似的中医药学建模等应运而生。由此对类似古希腊城邦把神话作类似讲“政治”、“突出政治”的元老来说,也在考虑把神话变成更仁慈信仰的宗教包装才行。

C、抽象、系统、深刻科学建模的初显

a、饶毅教授说中国古代的科学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建模,中医药学的建模似乎“比较简单、实用”,认为自然科学古希腊才算起源----这确实也有部分明显的事实。如解放前的初高中教的数理化生课程,讲的抽象、系统、深刻的基础知识,都源于古希腊几何公理化建模,到伽利略、牛顿力学的实验观测计算重现建模为标准;即使我国有许多大工程、大建设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总结的抽象、系统、深刻的基础科学建模能公开传播的,不然诺贝尔科学奖不会少。不然,也不会有龚天任教授在美国讲:“反相反量反中医”只是老中青科学主流中的“非主流”。2020 年 2 月 9 日龚天任给北京的北方工业大学的李小坚教授发“龚学预测病毒效力定律”的信说:

“李博士,这次中国冠状病毒大流行,有龚学的病毒效力定律,保证这场大流行很快就会结束,

定律 1: 病毒效力 $VP=F(1/R0)$; $R0$ 病毒初始传播速率,病毒传播速率越快,病毒效力越小。**定律 2:** 病毒效力 $VP(N)=VP(N-1)-K*(1/R(N))^2$; N 传播次数, $R(N)$ 病毒 N 次传播速率;控制

和减小 $R(N)$ 可加速降低疫情范围。因此,病毒

传播速 N 次后, 不超过 10 周, 疫情将很快结束”——这不是科学隔离宗教信仰的建模。科学建模, 要使别人能懂、能计算、能观测。

b、“反相反量反中医”有“以苏解马”对立在东西方景观的统一。这不奇怪, 基础科学研究建模的突破,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而是人类智力的全球性、时间性的分布概率式的“点喷”。量子论研究的“点喷”虽有“庞加莱猜想”证明的支撑, 但只知道正猜想, 没有注意逆猜想和外猜想。相对论引力研究的“点喷”, 多数人只知道直线运动的量子引力韦尔张量效应, 不知道圆周运动收缩的量子引力里奇张量效应。再如类似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预测、预报, 也不容易。

例如, 钟南山院士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我们要共同反对“信息病毒”、“政治病毒”——让中国背上制造疫情灾害的黑锅, 完全是别有用心。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国际社会同心协力、携手应对才是人间正道。

D、难忘 1953 年-1963 年

a、尊重科学, 敬畏自然。今天我们在应对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科研生产保卫战中, 中国科技实力的长期积累, 撑起了打赢的底气。1949 年中国的解放, 也类似疫情之后站立起来有想要大干的感觉——特别是如果预想到疫情也有全球化, 那么人间正道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合作——如“老药新用”的思路, 让药物研发团队捕捉到提高治愈率的亮光; 中西医交流, 是用科学战胜愚昧, 用合作抵制偏见。由于抗日救亡战争, 留在巴蜀大地上教书育人的一批学贯中西曾留学归国的年青的知识分子, 看到新中国解放战争刚胜利, 成渝铁路等大建设工程就在开始动工都想大干一场。

这里我们单表 1953-1963 年间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师生, 为解决饶毅教授所说“中国古代的科学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感觉, 所做的基础科学建模的工作——类似中医和西医的差别, 不在于本质, 而在于“基因组学”和“暴露组学”类似有前沿与暴露的“翻转”——过去的成绩就让它过去, 中国和世界更在于未来, 所以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师生, 想到抢占前沿科学研究制高点, 首先是要梳理我国基础研究建模缺少的从“ $0 \rightarrow 1$ ” (从 0 到 1) 的原创性成果, 以及与国际发展衔接, 应持续支持的有哪些前沿研究的重点领域? 例如, 量子论和相对论推进统一, 那时还没有公认的超弦理论概念, 但它要统一的所有基础研究建模, 必然涉及关键的“拓扑”翻转结果的数学, 这会延伸到应用数学和物质交叉的引力时空、量子起伏、微观制造、催化振荡、地质物态生态调控, 以及人类疾病生理等模型的研究。可那是在“紧绷

阶级斗争这根弦”、“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 1953-1963 年间, 要在不能公开大量宣传的情况下归纳出多人同意的建模, 谈何容易? 在集体环境中, 人们白天做事、想事, 同时遇到相同的人很多; 但晚上各人做梦, 同晚遇到相同的就难。当然时间拉长, 概率会高——对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师生来说, “翻转”成首选。大道至简的原因如下:

解放工农翻身是政治“翻转”; 修成渝铁路发现“资阳人”化石, 是历史时空“翻转”; “老药新用”, 中医针灸、艾灸、拔火罐, 是内外生理“翻转”; 化肥施在地里, 通过粮食增产来“翻转”; 热力学是两个封闭容器之间的平衡, 是量子统计“翻转”; 头脑智能人机合一, 是智能“翻转”; 生命新陈代谢, 是基因、细胞发育编程“翻转”, 等等——也许“翻转”这个脑洞词汇, 能联系数、理、化、天、地、生、人等基础原理, 但要像几何的公理推论、代数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牛顿力学第二定律公式的作用力表达计量等那样, 概括起来谈何容易? 因为“翻转”这个词, 还不是几何、代数、牛顿力学等公式、定理等的科学建模, 是高度抽象、系统、深刻的表达。

b、“川大学派”的形成是偶然, 也是必然——与波兰 1940 年代革命解放前后的华沙学派相似, 也涉及有两部分——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 但以四川大学为主。原因是 1952 年国家在大学进行院系调整, 柯召(1910-2002)教授和张圣英(1903-1992)教授从重庆大学先后调到成都, 柯召教授和川大创办人之一的魏时珍(1895-1992)教授在四川大学一起教书。柯召、张圣英和魏时珍都有留学深造过应用数学的基础。“川大学派”的核心人物柯召教授, 他思想进步, 也无魏时珍和张圣英在解放前经历有看似政治的“污点”。

然而张圣英及魏时珍, 很早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相交相识。魏时珍教授四川蓬安县人, 1920 年前往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 1922 年考入哥廷根大学师从希尔伯特、柯朗等国际知名的数学、物理教授。1923 年初朱德来到德国, 寄居在魏时珍宿舍附近。魏时珍帮助朱德补习德文, 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 年魏时珍被授予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外魏时珍关注国际最新物理学动态, 当他听说爱因斯坦正在柏林大学讲学, 便给爱因斯坦写信希望得到指导, 不久魏时珍就收到爱因斯坦热情洋溢的亲笔复信。魏时珍在欧洲留学时, 直接向爱因斯坦请教过相对论; 对庞加莱的有限而无界宇宙双曲空间二维模型, 离圆心越远, 该空间中点的距离收缩得就越多有研究。

张圣英生于湖南新化, 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22 年张圣英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 在巴

黎参加社会活动与周恩来重逢，经周恩来介绍与小平结为朋友。更鲜为人知的是，张圣英 1918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7 名发起人之一，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且交往密切。1920 年 3 月 12 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有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英、张太雷等相约组织的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毛泽东组织的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的一些成员的支持和参与。王佑木撰稿的“重庆组织”给列宁共产国际写的《重庆报告》中文稿，帮助作俄文翻译稿的就是张圣英。1921 年张圣英北大毕业，1922 年到牛津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 年张圣英回国。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四川总督刘湘邀请张圣英入川创办重庆大学，张圣英接受邀请第一次到四川。

在周恩来、朱德和小平同志等的关注下，柯召、魏时珍、张圣英等三人解放后都先后集中在成都工作。1953 年毛主席宣传自然国学的物质无限可分说，要使新中国的科技日新月异，日日新，又日新。因为 1953 年开始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的命题，是希望交给全党内外的干部、学者、科学家和群众去实干研究的。但科学与哲学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这类似 1953 年基因双螺旋结构 DAN 的公布，以及大量微观粒子、基本粒子等发现，是基于高精尖的科学实验和大型科学设备等条件为基础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人搞基础科学，从“0→1”建模原创性研究的信心。因为从“0→1”即使联系初等数学的四则运算，和开平方加进虚数计算，所有实数、虚数和复数的正负对相加，都等于“0”。即“0”既是“无”、空白，又是大量实数、虚数和复数的正负对的总和、包容、集中---类似“进攻性马”，东西方交流，虚实实实，隔离中有合作，也有斗争。

反之，“1”是分散的，是所有的“单个”的集体---既是“实体”的单个，也有“空白”的单个---类似“以苏解马”，东西方对立，在表面上都是“实”的；把隔离中的“虚”的，也当做“实”的---自然国学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使“川大学派”知道，如果有物质对应-1 开平方，就包含着暗物质的标度无关性---虽这是到 1967 年才知道的事情；但毛主席讲物质无限可分实际也指向可分的间隙---这中间包含有暗物质和暗信息。如 1955 年毛主席讲“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到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毛主席号召解放思想，略高一筹的川大数学家们，决定解答新中国解放后毛主席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这个集中古今中外争议的哲学大智慧，作科学建模探索。

c、早在 1953 年柯召教授就提出建议：参考 1904 年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提出的拓扑学猜想：“任何一个单连通的、闭的三维流形流一定同胚于一个三维的球面”；以及参考苏联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学派提出的灵魂猜想---解放后中苏革命结盟，传播了类似亚历山德罗夫《拓扑学》集合论方法与组合拓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等苏联数学的经典思想---佩雷尔曼就是这条轨迹的缩影---苏联数学家们推广亚历山德罗夫的空间研究，数学定义“灵魂”为：“针对某类特定的数学对象，可从这类数学对象的一些小区域，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之为数学对象的灵魂”；以后苏俄又发展为灵魂定理证明。

我们知道这件事，是 1963 年赵正旭（赵本旭）老师从川大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四川盐亭中学初中部教书。当时我们在高中读书，开学不久一次到盐中图书馆去借一本 30 年代出版的有爱因斯坦传记的《世界科学家名人传》，赵正旭老师正在图书馆替暂时出外办事的老管理员照看，而与他偶然认识，才得知此道科学建模难题---以后曾把这“柯召-魏时珍猜想”，暂称“赵正旭（赵本旭）难题”好说话。

赵正旭（赵本旭）老师出生射洪县，1958 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培养大学数学教师的师资班。1960 年因自然灾害该班停办，赵正旭（赵本旭）从重庆转入川大，也许与柯召经历类似，加入研究。赵正旭老师告诉的“川大学派”产生的主要成果，即“柯召-魏时珍猜想”或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可简单地表述为：“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

三、创新科学也有泸州老窖式的存而待发

1) 柯召-魏时珍猜想建模的吸收与扬弃

A、为啥中国要搞第三极基础科学建模

a、科学服从政治，但政治与科学也有隔离---“进攻性马”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2020 年这次全球新冠病毒“人传人”感染疫情的爆发，检验和暴露的不仅是社会管理，也有科学治愈的效果---“命悬一线”；“线”断了，不能逼迫家人说还是好人---这里并不是要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而是要依靠真科学。所以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弦学”、“超弦科学”。西方有法国的类似从“1→1”科学建模的“庞加莱猜想”；苏俄“以苏解马”有类似从“0→1”科学科学建模的“灵魂猜想”，为啥新中国，还要搞类似青藏高原泛第三极综合的“1→1”和“0→1”科学科学建模的“柯召-魏时珍猜想”？

先说庞加莱猜想：“任何一个单连通的、闭的三维流形流一定同胚于一个三维的球面”---这是仅联系圆球表面的循环问题。例如，2006 年霍金在北

京的国际弦理论会议上讲的《宇宙的起源》，时间的类似物，可用地球表面从北极向南极的运动描述---但这种球表面循环，虽可前后有序，但也可反向循环；而众所周知，时间不可逆。即因无反锁控制，霍金宇宙开端之前无时间的证明就不完备。但“柯召-魏时珍猜想”的“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这里由于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相等，内表面小于外表面，这种翻转就既有前后有序，又有类似暗含的反锁控制。即双重控制保证了时间的不可逆。再说灵魂猜想，苏俄数学家虽把“灵魂”作到数学化建模，定义为“针对某类特定的数学对象，可从这类数学对象的一些小区域，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之为数学对象的灵魂”。但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灵魂”概念带有的迷信、宗教和神学信仰因素，仍然有纠缠；宣传上会给坏人做坏事钻空子、帮倒忙。

b、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在与这类新冠病毒无形敌人的战斗中该怎么做？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说：“病毒是地球上最后一种敌人”、“流行病是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严格按法律法规在办事。但西方在宗教、信仰领域找我国的茬子，渲染所谓“中国灵魂争夺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宗教智库和宗教团体的常态和偏好---公开攻击我国宗教政策和歪曲我国宗教状况，试图通过运作所谓宗教信仰议题，把我国拖入冷战式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而美国宗教团体内部纷争即所谓“窝里斗”传统，搞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由宗教团体推动的涉及宗教的立法倡议，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与所谓“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启动和加强了宗教尤其是右翼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立法化（或国会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之中。所以科学建模要提防。

c、为啥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是“吹哨”；上海“观察者”网转发《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也是“吹哨”？是因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虽然他抨击弦理论是他的自由，但他宣传物理学要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有降低科学硬度的成分要提醒。

我国人民当然领会苏俄数学家的灵魂猜想这里的“灵魂”，自然不是迷信；作为封闭空间内外翻转，也有“灵魂出窍”的说法---佩雷尔曼是著名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最后的关门弟子；1896年出生的亚历山德罗夫，为前苏联培养了好几代大数学家，1982年卒于莫斯科。引导和培训佩雷尔曼等的灵魂

猜想和灵魂定理，就来自亚历山德罗夫空间的研究。我国不宣传灵魂猜想和灵魂定理，也知道它的证明硬度对延伸给佩雷尔曼 2006 年被证实解决庞加莱猜想，有帮助。

2018 年初随总统访华的法国数学家维拉尼，2010 年获得过菲尔茨奖；领奖前，菲尔茨奖评委会曾怕他像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会拒绝领奖。但他说：自己的“境界不高”，会痛快接受。其实佩雷尔曼的“境界”之高，也是他深知“与弦共舞”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才是完成“庞加莱猜想”三定理证明的终结。“量子物理学家”如果没有科学硬度，量子名目的假产品、商品，就会招摇过市。

比如量子水、量子茶、量子肥、量子袜、量子项链、量子手环、量子眼镜、量子水杯、量子挂坠、量子能量仪、量子能量棒、车载量子空气清新器、量子环保动力提升器、量子虫草、量子口服液、量子面膜、量子鞋垫、量子喷雾仪……贴上了“量子”标签，产品功能大到甚至宣称可以防癌；即共同点是“功能强大”、价格不菲。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郭光灿院士说：“所谓的量子水、量子药、量子肥料等，都是忽悠大众的名词，将本应纯洁的学术领域炒作得乌烟瘴气”。另有专家指出：目前所谓“量子+生活”的产品，几乎都是骗人的。

d、发生在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先成“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后国际社会又对中国治愈疫情经验关注度达到顶峰，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治疗经验依赖性都有增加。但被传为有疗效医药的“假冒伪劣”也会出现，因为著名科研机构宣传的被寄予厚望的阿比多尔、氯喹、羟氯喹、瑞德西韦等药物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一个新药从研发到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上符合统计样本量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才能最后决定其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世卫组织和诸多一线专家，也不止一次申明应对新冠肺炎并没有特效药。《新京报》评论：如今防控形势向好，曙光已经显现。越是在这时候，越要保持耐心和定力，不能走旁门左道的邪路。积极发挥中西医在抗疫中的作用，不是迷信“江湖游医”和“民间土方”；而否定“神医”、“土方”，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一切都要回归临床。

但 2020 年 3 月 3 日“草根网”的“蔡定创”专栏，发表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后的反思》一文，这位在“原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毕业，17 年军旅后转至省单位工作”的蔡定创先生，似乎有不同说法：“从武汉市李跃华医生在本次抗击武汉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写请战书（虽然武汉医务人员十分紧缺）而被置之不理的事情上，我相信他的结果。因为其研究的方法对头，以论文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学术体制，很容易造成从概念出发、从固有的思路出发

的研究方法。因为你必须要按照刊物编辑的思路来写作，在权威体制下，权威越大，也越会从权威已有的概念出发，而这些必然都会成为科学创新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我们必须要从体制上来正化学术空气才可能建立真正的创新国家”。

从网上搜索可知：李跃华，湖北人，1964年生，1987年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被分配任医生，1989年回武汉陆续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工作。2007年起开办个体诊所至2012年开办爱因思门诊部。他承认“医师执业证书”造假说：原因是大学毕业太久，功课忘了；参加国家“医师执业证”考试，又工作忙。有文章说：“武汉‘神医’李跃华趁疫作乱，罪名如下：伪造学历、行医执照，非法用药”。

“暴露组学”类似说的是“基因组学”的学科不全，难以应对各种疫情。然“暴露组学”的“暴露”，不但暴露社会、管理问题，也在暴露科学和从事科技人员自身的问题。不说李跃华先生文凭造假，但“医师执业证书”造假也不对。社会上一些医生，文凭造假、“医师执业证书”造假，说是为了从业。但李跃华先生既然不怕花时间，想搞重大科技成果去出名，为何不愿意先花一点时间，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资格？既然2011就取得了“注册专利”，为何不看专利局公布后，别人采用的社会效应？但蔡定创先生说：“李跃华医生的治疗方案、治疗成功的案例以及专利证书都已经在网上被晒出，用不着怀疑它的真假，只是因为没经过临床试验，还不纳入治疗方案。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纳入国家级科研、病毒研究所，以及众多病毒研究院士们的法眼，而米国的瑞得西韦同样没有经过三级临床试验，却被立即纳入院士组织的临床试验，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已经就说明我国的科研体制、学术体制问题严重”。

蔡定创先生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来自民间》文章还说：“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是一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的典型的‘三无’科学家。从反面教材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科班研究机构在早期防控失误与病毒研究SCI论文的问题，说明研究方法问题其实是由研究机构学术体制所决定的”。但《封面新闻》的报道显示，李跃华所谓“治愈”，有多名人员至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李跃华所谓的疗效“全凭一张嘴”。更重要的是来自湖北省卫健委的《关于对李跃华、张胜兵治疗新冠肺炎等相关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结论是“李跃华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医师执业证书）”，且“其本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非法行医并进行虚假宣传，严重影响了正常医疗服务秩序和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这暴露了李跃华所谓苯酚穴位注射疗法

有不可信的地方。但用绑架道德类等说辞，一定程度也获得蔡定创等的同情。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多位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说：李跃华的所做所为，与“一把芒硝治百病”的“神医”胡万林一样，十分荒唐，不值一驳。“把只能用作消毒防腐的有毒、致癌化学品苯酚，注射进入人体穴位，这究竟是治病，还是致病？”“这是在糟蹋中医，糟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糟蹋西医。鼓吹这种理论，就是骗子，地地道道的骗子！”。郑州大学陈小兵教授认为，颇具迷惑性的伪科学，与之前的“酸性体质致病、酸性食物致癌”等伪科学类似。陈小兵教授介绍，健康素养，有人称其为“健商”，主要包括健康理念、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与习惯，以及围绕健康应当维护的公共卫生和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素质与智慧，“它就像一艘船，载着拥有智商和情商的人，抵达科学的彼岸”。“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看到现在信奉伪科学、迷信治愈谣言的人还是很多，健康素养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科普任重道远！”

B、西医和中医的科学及几学之辨

a、李中道先生原名李旭东，武汉人。1972年生。1991年毕业于原湖北省外贸学校，曾任国企干部。2020年3月5日“草根网”的“李中道”专栏，发表的《西方有科学，东方有更古老更好的幾学！》一文，他说：天人合一的幾学，“《盘古王表》里，有提到诞生于公元前5770年至公元前4070年人类初开烟火饮食期的幾遽氏。遽氏开创了古老中国的幾学，同时研究质象无相玄，与物相有相玄两大领域中的性慧哲学思想与运用，因此而被命名为幾遽氏，至今繁衍兴旺（摘自《中华传统五德修身文化。信》一书）”。

b、这里我们首先要纠正一点，《盘古王表》里没有“几遽氏”，只有“儿遽氏”——《盘古王表》里写的是：“（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4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魑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几”和“儿”不管是在简体字与繁体字中都有很大区别。我们不管这一点，就认定是“几遽氏”——因为也有其他的文章和书籍说：“姒姓，出自远古时期盘古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帝号为氏。冉相氏，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继承了黄帝以道为教，无为而治的精髓，后来他接替几遽氏成为华夏族的帝王”。“中国早在几遽氏时代就诞生了双玄认知论的幾学哲学观”。

李中道先生的文章说的是：“西方有西医，我们有中医。西方有科学，我们东方有超科学。古老

悠久的幾（機）学！幾，字面上的解释，上面两个‘玄’，下面是一个守卫的戍，保卫这门学问；现代西方称科学，中国古代称幾学。即同时研究太极弦线两边阴鱼和阳鱼的学问……阴鱼即精神世界：非物理化学可见的生命的精、炁、音、光、神的世界，其中包括中医学的中医中药、经络臟象、三魂七魄、五运六气等等，以及现代科技还把握不了的很多领域，暂时称之为暗物质暗能量——阴鱼阳鱼两个世界同时把握、同时研究，也就是幾学，彻底避免了西方一条腿走路的弊病。真正回归老子‘玄之有玄，众眇之门’的本意。现代科学已经接近的超弦、夸克、高能物理、超微观世界及天文学超宏观世界。古代丹道，近代精炁音光神的微观世界，研究老子玄（弦）之有玄（弦）的真正本义，就是幾学”。

李中道先生还说：“中华古老的幾学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包括易经、中医中药学、古代道家的丹道学、墨家的機巧学、中华古老的教育学、治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风水学等很多古老而广泛的领域。木+幾为機，木即草木、东土、仁德、紫气东来；木+幾，機會機遇，就是中医药最早的解释。人人喝上一剂中草药（千金芦苇汤加减）就可以预防病毒感染，治好身病。如果再加上经典诵读以‘音能量’除除邪气，治好心病，物美价廉、标本兼治、立杆见影——武汉号称知音故里，我给市长信箱写信建议开发知音能量用于防疫，依然是研究研究。可见知音难觅”。

这里我们想说，李中道先生的“几学”观，与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的“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有一些相同之处。如说“几学”，包括“丹道学”、“风水学”、“紫气东来”、“超科学”、“三魂七魄”、“丹道”、“精炁”等。如果这些就是几学“研究老子玄（弦）之有玄（弦）的真正本义”，那么李中道先生的“几学”和老子的“玄论”，是有更多接近类似宗教的信仰之嫌的——即在远离科学的“以实践、实验作检验的唯一标准”。因为古代老子的“玄论”，后来被宗教的“道教”利用，称老子为“道教”的老祖宗，可见它存在漏洞；而自然科学却不为宗教信仰所容。即使李中道先生也说：“幾学，也同时超越了古代玄学只研究精神世界，与现代科学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限”——但这也只是“玄谈”而已。

c、当然我们说，李中道先生和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教授也有本质的不同。李中道先生是爱中国的，是赞成“进攻性马”取代“以苏解马”，主张科学“东西方交流”的。例如，李中道先生说：“2020人类大疫，科学发力，幾学有解，中西结合，前途光明——真正的东西方文明、医药、科学的结合，就

是機會、機遇、時機，機不可失、时不我待啊！当前疫情，又称危機，危中有機，治危靠機！中医中药为什么能够防治时疫？从幾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中医药能够防治疫情？中医经络系统是超弦空间，超过现代科学认知领域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空间。天然中草药的药性，如升降浮沉，寒热温凉能够轻易进入其中从而达到调整人体平衡防疫治病的目的。而西医很多药物都是人为的化学大分子，穿不过大脑硬屏膜，更不用说人体内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

再看瑟奇教授，他是专职的“量子物理学家”，学过“现代科学已经接近的超弦、夸克、高能物理、超微观世界”等学科需要的极高深的数学、物理知识，但他仍猛烈抨击弦理论等现代科学，“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可见是有意为之。李中道先生虽然1972年出生，受教育的条件，比我们那时“文革”十年动乱的情况好。但即使作为我国一般大学生、研究生，要像瑟奇教授能学到“接近超弦、夸克、高能物理、超微观世界”等学科需要的极高深的数学、物理知识，恐怕长时期还难以实现——如果不长时间坚持自学的話。

所以李中道先生用中国古代的“几学”，与西方古代的科学并立，类似能驳斥饶毅教授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但李中道先生又说什么：几学能“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西方科学以及西医，都已经步入瓶颈，创新乏力”。这没必要，只能适得其反——是和饶毅教授“中国古代无科学论”殊途同归；也会和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教授“不爱科学爱神学”殊途同归——与其这样，不如称中国古代的“科学”，就叫“中医”，拒绝所谓“几学”的玄谈。因为从“神农尝百草”，中国的科学“中医”就是以“以实践、实验作检验的唯一标准”；西医类似“基因组学”，“中医”类似“暴露组学”而已。

2) 柯召-魏时珍猜想数学证明奥秘重点

A、柯召-魏时珍猜想建模有无意义看什么

a、科技发明，惯例是申请专利保护。但也有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镭元素，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没有申请专利，反是广而公开，让更多的同行专家来实践检验，因此反得到大发展，造福了亿万世界人民。有人说科学创新，要抢先发表，才会对国家有贡献。但“柯召-魏时珍猜想”在川大探索十年，也没有公开。对于柯召-魏时珍猜想等科学建模，有人说有意义；也有网友来信说无意义。这里标准是什么？地球作为人类的一个整体社会，与国际科学与时俱进作比较，自然不失为一种办法。科学不宽容，其中也有类似2020年的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只有尽快认识病毒、揭示传播途径，才能为疾病诊治、药物筛选提供决策参考，所以只有科技，

才是打赢的底气。

而数学建模是科学传承的基础----德国开量子论、相对论建模之先，即使一战、二战失败，经济战后仍然恢复很快。英国最早有牛顿力学建模、达尔文的进化论建模，而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领头羊。美国 20 世纪下半叶收编夸克建模、超弦理论建模，而不畏惧反相反量的“以苏解马”。新疆医科大学刘月生教授生前讲的“科学不宽容定理”，揭示过一些所限因素的表现----“科学智慧”同“体育智力”一样，要选拔苗子，给予培养训练。“体育智力”和“考试天才”一样，选拔苗子可以通过各地区、各层次不断的比赛，从冠军中筛选出。他们的成功，也不会对掌门人的地位、权威够成颠覆性的威胁。但“科学智慧”不同，他的成功，可能对掌门人的学术地位、权威够成颠覆，成为新一代的掌门人。而很多国家的掌管科学发展的掌门人的学术地位，是和政权机关同步的，颠覆性的威胁是绝对不能容忍。

b、所以刘月生教授曾提出的“科学不宽容性定理”，首先是说对“科学智慧”的不宽容性。因此即使是有真“科学智慧”，也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同行高层掌门人的评议。例如，解开田丘之争，丘成桐和田刚两代人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而仅仅是在选拔破解庞加莱猜想的苗子和在组织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搭当策略上，两代人的经历、性格发生了分歧。对于即使有大师指控其院士在美国曾抄袭等话，那也只不过是一些声东击西转移真实视线的托辞。众所周知，无产阶级在选拔国家接班人上，是大是大非问题，丘成桐不能没有类似想法。世界数学难题轮流到中国破解，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破解庞加莱猜想的“科学智慧”，在全世界虽然不是很多，但在中国人中选出苗子的可能性是有的，且不说早有柯召-魏时珍猜想追来。

其次，丘成桐也许还觉得，由中国人破解庞加莱猜想，对推动祖国科学的发展，有重大作用。例如，可以让 13 亿中国人在 21 世纪里，站在同一条科学起跑线上，作“科学智慧”的竞争。因为正如丘成桐院士所说：向世界上最优秀的拓扑学家发出挑战的庞加莱猜想，不难理解“单连通的三维闭流形同胚于三维球面”----不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这个庞加莱猜想可以这么证明：如果我们用可伸缩围绕一个苹果表面的橡皮带，就可以既不扯断它，也不让它离开表面，能使它慢慢移动收缩为一个点；反证法是，如果我们想象同样的橡皮带，以适当的方向被伸缩在一个轮胎面上，那么不扯断橡皮带或者轮胎面，是没有办法把它收缩到一点的。这就是说，苹果类似的三维球面表面才是“单连通的”，而轮胎面类似的三维环面不是相同的拓扑类型，从而得证任何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只要它里面所有的封

闭曲线都可以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就一定是一个三维圆球。

显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但多年前我们有位年青的科学博士朋友，是在几所著名大学培养教育出来的高级科学人才；21 世纪初他跟导师等人出版了一本科学专著，有类似“不同大小的球，是不同的拓扑类型”的科学观点。他说包括院士在内的一些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大学教授，都很支持这本科学专著。可见，在庞加莱猜想面前，13 亿中国人在 21 世纪里，还站在同一条科学起跑线上不虚。如果不信，还可像全国人口普查一样，将“不同大小的球，是不同的拓扑类型，对吗？”放在 10 年时间内的考题出中，只答：是或否，作 1 分的高考题，让所有考生每人独立回答，也可见证；但无人敢做。

“科学智慧”类似生物进化，含有时间箭头。例如，自然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草啊、树啊，鸟啊、虫啊，从植物学、动物学的分类学上说，它们都有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之分，这是时间箭头。自然环境破坏了高等生物的生长，低等生物再繁茂，它的花啊，鸣啊，再夺目，也仍然属低等生物的分类。同理，“科学智慧”也如此。当科学智慧进化出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当它们经过挑战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的危险期，它们就作为科学分类的进化树列入智慧的大自然。这个大自然的上帝或叫真理，有人说是：这个上帝等于瘟疫加剑桥加牛顿。即剑桥大学培养了牛顿，瘟疫让牛顿回家乡躲避，研究出牛顿力学和牛顿微积分。实际牛顿力学和牛顿微积分的核心还只是一个球量子。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上帝等于瘟疫加剑桥加球量子。以此公式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实际也是个时空球量子。看玻尔学派的量子论，量子论实际还是个质能球量子。看玻尔兹曼的统计力学熵，统计力学熵实际仍是个热力学球量子。看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基因学说实际又是生物学球量子。看霍金的黑洞力学，黑洞力学实际是再用虚实可分的球量子。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有成百上千的官科、民科卷入挑战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牛顿力学、基因学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许与文革前的哲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阶级斗争作为政权争夺，是一个阶级推翻、打倒另一个阶级；这是一种人文现象。在科学智慧进化树上，这种一个推翻、打倒另一个的现象似乎也存在。虽然以上挑战的武器类似仍受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所限，但并没有限制 50 多年前在川大，科学家自主研究创新出“柯召-魏时珍猜想”：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也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它综合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庞加莱猜想逆定理，并超越它们的证明而成为第三极超弦革命的先声。它之所以不为人所

知，并不全因“阶级斗争为纲”——在都属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之间，这种“表现”，并不属于“阶级斗争”。

当然也有朋友说：类似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牛顿力学、基因学说存在缺陷，难道不能挑战？文革前的哲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天挑战的论文和书籍中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是的，这些挑战的论文和书籍中没有阶级斗争的字样，但是它们却以彻底推翻、打倒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牛顿力学、基因学说为底线；有的还用很不文明的话发泄。这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权争夺，是一个阶级推翻、打倒另一个阶级，有类似之处。阶级斗争能成功，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建立的，但这是一种人文现象。科学智慧进化树上，这种一个推翻、打倒另一个的现象似乎也存在，但需要不同质的创新。而挑战的武器类似受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所限，并没有破解这些高等进化的球量子，反而是用它们还停滞在低等进化的球量子去取代，这能一个推翻、打倒另一个吗？但我们仍主张挑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他们正表现着，一个大国公民对科学智慧贡献的责任和追求。而这种科学智慧成熟的原因是，如果西方以前的“上帝”等于瘟疫加剑桥加球量子，那么今天的“上帝”等于新冠肺炎疫情加“柯召-魏时珍猜想”环量子。这正是揭示 21 世纪还要科学建模的意义。

B、柯召-魏时珍猜想数学证明的难点在哪里？

a、“柯召-魏时珍猜想”科学建模的重大意义，是中国科学家们早于韦内齐亚诺独立研讨现代超弦理论的先声——中国当然应该要争回自己的部分优先权——且不说“柯召-魏时珍猜想”能精准一网打尽庞加莱猜想、灵魂猜想、圆锥曲线、中国格物，直到今天的超弦理论、圈量子引力理论、多维时空、虫洞、黑洞、白洞、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反宇宙、宇宙轮回等模型空间。

但对比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数学证明“柯召-魏时珍猜想”的“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难点也不少。首先“不撕破”，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就只能做一根一维弦线或虫洞连通。这时与庞加莱猜想实心球体仍是等价的，亏格=0。但如果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有两根一维弦线或虫洞连通，就能作环圈类似通孔线旋，亏格=1。但亏格=0 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有一根一维弦线或虫洞连通的翻转，又是等价于类似墨比乌斯带陈数=1 的不平凡图像内外圈面的翻转。墨比乌斯带是在内外圈面中心圈线上，有一个扭转的“交点”。这类似一个圆锥体的表面与另一个圆锥体的表面翻转，必须经过顶对顶的交点。把它看成“量子点”，它可以是球量子，也可以环量子，但要内外表面翻转通过，必须是体旋。

正是这一选择，才吸引了我们使用三旋理论去思考的。但因三旋中，面旋和线旋被排除在外，体旋有球量子性，或大或小，可以把宏观和微观，或大宇宙与小宇宙，天然地联系结合上了量子论和弦论——道理是，量子论不可分，留有“四舍五入”的余地——由于量子论的最小单位是普朗克尺度，级数是 10 进制制，可分只有四舍五入的有限可分。所以又联系上了“千禧难题”之四的黎曼假设，和美国克雷数学所 2000 年公布的其余千禧六难题的全解。

b、弦理论的开弦和闭弦，只与庞加莱猜想正定理的圆球，和庞加莱猜想逆定理的圆环对应。“不撕破的空心圆球”属于庞加莱猜想第三极公设——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能做一根一维弦线或虫洞的连通，加上量子论的“四舍五入”，类似把皮球不破，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必然涉及数学的“点”问题。

例如，美国科学家萨斯坎德在《黑洞战争》一书中，曾谈到“持球跑进”的保卫信息守恒的求解办法，就可以联系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翻转，试着假设或拟合不用其他维度，去想象线和珠子。这里的“线”，不再是圆柱面的线材，而是圆柱面的管子。珠子也不是在圆柱面外移动类似的算盘珠子，而是在圆柱管内移动的，类似球面或环面的珠子。

但如果珠子的自旋，只有面旋和线旋，要持球跑进相互穿越交流发送信息也不行。在三旋理论中，类圈体（如环圈）内禀自旋有三种：面旋、体旋和线旋。类圈体的面旋、体旋和线旋还可两两组合，或三三组合，合计的避错编码标度值个数就是 62。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把管道及珠子推理到普朗克尺度，只给一条一维的沿着管线内壁移动，内外各自持球跑进的珠子相遇，在转点的普朗克尺度上，由于还可以各占一半合成一个球体，作体旋翻转后，各自再分开，恢复原来各自的形态。此前“转点”的“庞加莱猜想球”自旋，如果是作纯面旋，那么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的交流就会被阻塞；不堵塞只能作纯体旋和与其组合旋。只不过纯体旋的转轴方向，与管柱壁的管长方向的中心线垂直。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在庞加莱猜想球式的“转点”自旋这里，有存在量子论类似的“间断”性。

原因是：其一，即使球体的纯体旋不阻塞，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的交流，由于是“转点”式的内外的交流——是在同一段管线内运动，根据广义泡利不相容原理，它们必须“间断”交换才能进行。其二，与体旋的组合旋，只在遇到体旋时才有一次被选择，这本身也产生“间断”，这是旋到纯面旋位置的时候。这种阻塞即使时间是短暂的，因双方运动的速度或频率差，要用普朗克尺度来截止，这也涉及小数点后面的无理数或有理数的位数计算。由

此，联系把普朗克常数的数量级比作针尖，一个数量级中从1至9可容纳9个连续自然数，即在针尖上可站9个天使，只有一半对一半普朗克常数的嵌合被选择。

C、柯召-魏时珍猜想建模物理应用风流数今朝

a、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联系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涉及庞加猜想外定理，而与玻色子变费米子有关。二是联系约瑟夫森效应和量子霍尔效应等量子隧穿现象，涉及“贝里洞”和贝里张量，而与超导体和拓扑绝缘体有关。例如，在两块超导体中间夹一层薄薄的绝缘层构成约瑟夫森结，即使不加上电压，也能观察电子对飞越间隙的隧穿电流。这时绝缘层两端的电压是 $hf/2e$ 的整数倍，其中 h 为普朗克常数， f 为微波辐射的频率， e 为基本电荷。三是联系霍金与彭罗斯的奇性定理引力强到足以捕获一个区域，涉及正常的闭合二维面和引力子闭合捕获面，而与费米子的自旋和转轴的偏振量子数有关。这又进一步联系到霍尔效应材料。

这里有张天蓉教授的《拓扑相变：解读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奖》文章分析。因为用电子和磁通量子表示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图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图，也能用来说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联系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开一个孔连通，拓扑上是与实心球体等价，还可以证明线旋和面旋不是万能的，但体旋却可以与质量、热量、间断量子化，以及黑洞熵等于黑洞视界的面积等有关---这里的“藏象”，就类似量子霍尔效应的“拓扑象”；这里的“藏数”，就类似“量子数”。宽窄拓扑学上，“有限、无边界、有方向”的二维闭合面，也是用“亏格”来描述和分类的---对实闭曲面，亏格是曲面上洞眼的个数---球面无穿孔亏格为0。面包圈有一个穿孔亏格为1。两个穿孔亏格为2.....不同的亏格对应不同拓扑。

从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可知：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有一个孔连通的，与实心球体等价，也是亏格=0。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有两孔连通，则能类似环圈作通孔线旋，才亏格=1。张天蓉教授说：“量子霍尔效应研究的是二维系统中电子在均匀磁场中的运动，霍尔效应有经典与量子之分，量子霍尔效应中又包括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因此量子霍尔效应中涉及到不同的、离散的量子态，构成不同的‘相’，互相转变则为‘相位’。在表征量子化霍尔效应的参数中，有一个填充因子 n ，由 n 出发引入拓扑数，并由此而对电子波函数的拓扑性质进行分类。这是将数学上的拓扑概念应用于与‘相’有关的凝聚态理论。如果将电子运动和磁场都进行量子化，得到的填充因子 n ，可以被理解为电子数 N 与磁通量子数 N 的比值”。

b、宽窄科学用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有孔连通的

图像，来比喻量子霍尔效应中电子与磁通量子数目的分配关系---将一个电子表示成一个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有一个孔连通，穿过电子的磁通量子类似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用一根带箭头的竹签表示，在整数量子霍尔效应中，每个磁通量子所穿过的电子数便等于填充因子 n ---当 $n=1$ 对应于一个磁通量子穿过一个电子。当 $n=2$ 时，是一个磁通量子穿过两个电子，以此类推。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情况，是一个空心圆球，内外表面至少有两孔连通，能作环圈类似的通孔线旋，因此磁通量子数对应一个电子数目，出现两个磁通量子共同穿过一个电子， n 便成为了分数： $n=1/2$ 。如果三个磁通量子穿过一个电子，则 $n=1/3$ 。如果是五个磁通量子穿过两个电子，则是 $n=2/5$ 。这里填充因子 n ，被用作物态（相）的分类标签，每一个不同的 n ，都代表一种不同的量子态： n 为整数时，对应整数量子霍尔态； n 为分数时，对应量子流体分数霍尔态。不同的 n 值代表的不同量子态，无论是分数还是整数，都需要由系统波函数内在的宽窄拓朴性质来描述。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之间的不同，可直观地用这些基态简并电子集体运动模式的不同来描述。每一种分数量子霍尔态对应的每种模式，也可以联系宽窄拓扑的亏格表征。这里自然要联系到如何来定义物理中的“相”？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可以有不同定义的宽窄“相”---了解凝聚态到引力波入门，最关键的是宽窄“贝里相位”。这是 1984 年英国数学物理学家迈克尔·贝里，从量子的观点引进“贝里相位”，能解释一个量子体系回到原来状态时，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额外的因为空间的几何性质而产生的相位因子，这称之为几何（贝里）相位。

c、张天蓉教授说：“贝里相位虽被量子力学和光学实验的观察所证实，但贝里相位实际是电磁现象具体应用中的产物，它提供了具有拓扑结构的最简单物理系统的例子。而物理学中通常用的‘相位’一词，描述的是某种波动性质，如说交流电的相位、振动弦的相位、量子力学中波函数的相位等。在经典电磁学中，相位也只有相对意义：如两个波的相位差，会形成干涉条纹。但一束电磁波的绝对相位值，并不产生任何观测效应。但在电磁的量子理论中，相位具有可观测物理效应，这便是贝里相位”。例如，考虑空间有一个通电螺线圈，线圈中有所示方向的电流，与在螺线圈的内部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合。

通电线圈引起的相位因子 ϕ ，就是贝里相位。但 2016 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索利斯、霍尔丹和科斯特利兹等三人中，有早于贝里，在 1982 年为解释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就已经在把拓扑概念与电子波函数的“相位”联系，提出了类似的“贝里相位”。这实质是重新解释了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

和“测不准”两大原理，向哥本哈根学派的玻恩几率波，和费曼的路径积分及部分分子的正确解释靠拢。

因为“可分”，可以不是把量子分割开，而是“可数”，类似整数、自然数、偶数、奇数、素数等，是无限多。那么把整数、自然数、偶数、奇数、素数等的无限多，分散在类似空心圆球内外的球面上。甚至像“8”字一头的“0”，凹陷装入另一个“0”内面，类似口袋内再装口袋的球面上，也是符合逻辑，能想象思维的。圆周运动必然带孔；由里奇张量引力效应推想带孔超导薄膜的非超导金属态内形成的库珀对——电子对量子环作圆周运动，被电子绕着的虽然不再是正物质的物体，而是类似“0”物质的真空，但带孔超导薄膜的库珀对作圆周运动产生的量子引力里奇张量效应，对类似“0”物质的真空产生的“虚引力子”激发，也许更强烈、更集中。

d、联系费米子为啥是1/2自旋？道理是，如果把虚拟的空心圆球不撕破与不跳跃粘贴的内外表面翻转，看成像“8”字一个“0”凹陷装入另一个“0”内面，像口袋内再装口袋，或者像一个空心圆锥体放到另一个空心圆锥体内部顶对顶的示意图像。这里“8”形的球串自旋，上面“0”的整体自旋完后是下面“0”的整体自旋，所以合计自旋是720度，但按自旋分类只是1/2的费米子。而像口袋内再装口袋的自旋只要360度，是类似玻色子。“翻转”的区别大如天。

再说“8”形球串这种顶对顶的交点变成壳层类似的翻转，这里“零锥”的点移动，可以是一维的弦或虫洞。而且这种空心圆内外表面只有一“点”在连接；这个“点”即使拉长变为一维的线段，从拓扑结构和庞加莱猜想来说，仍是与球面同伦的。现在把空心圆球内表面比喻的“0”或空心圆锥体，收缩到一“点”；因为一个圆锥体的表面与另一个圆锥体的表面翻转，必须经过顶对顶的交点；把它看成量子点，实际类似普朗克尺度级数是10进制制的“里奇流球”，只可四舍五入有限可分成的一半对一半。由于三旋包括体旋，量子点“里奇球”体旋翻转，内表面变的那个“半点”，翻转为外表面的那个“半点”。再虚拟这个翻出的“半点”，经过两个“半点”组合放大成球面，这也仍是与球面同伦的。

这里的奥秘还有量子色动三旋力学的体旋——这类似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说的“持球跑进”——按萨斯坎德的“持球跑进”的本意，类似代表持球运动员的微观的“引力子人”，和代表费米子和玻色子“信息”的球，是同一层次，或平等的整体。费米子和玻色子互相转化不但类似实体变化，也是一种信息的变化。萨斯坎德把此拟设为类似持球跑进的翻转，

如果推理到普朗克尺度的视界，只给在一维的沿着线地移动的类型“点”微观的“引力子人”——萨斯坎德是用一个高倍显微镜来观测类似费米子和玻色子可以互相转化生活的世界，但萨斯坎德是把微观的“引力子人”看成算珠的一些小珠子，试着不用其他维度去想象线和珠子，那么它们能持球跑进相互穿越交流发送信息吗？不能。

凤凰涅槃的科学在哪里？解救的办法只有三旋理论。

3) 为啥用泸州老窖比喻柯召-魏时珍猜想

A、科学问题讨论要谨慎——特别是敏感问题

都世民教授说：“对于政治问题讨论要谨慎，特别是敏感问题”。其实科学问题讨论也要谨慎，因为物理的科技，虽然有的不涉及政治；但科技作为物理工具是人在使用，就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特别涉及到敏感的问题。例如，美国的“谷歌搜索”面向全球，内容比较丰富和完整。虽然它的机体安卓系统不涉及敏感的问题，但安卓系统机体类似智能照相机，超越了原先的底片照相机：公开的物体表面反射光投影的智能照相机，它不但迅速显影，而且还可将这类图片无线传播到远方。这就涉及敏感的舆情问题。因为“谷歌搜索”在我国不遵守法律——“没有审查过滤的搜索是违法的”。即人们不用看到公开的出版物，使用“谷歌搜索”，常出现境外负面“舆论倒灌”；国内不同的、不好的声音也被搜索。所以“谷歌搜索”在2010年被清出国门。“百度搜索”就只限于中国，有些内容搜索不到，但守法适合国情。

其实美国打击华为却是错的——华为的“搜索”是关闭的，它的基站5G网络系统只是智能手机信息传播类似发射台的工具。由于它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基站芯片发射台的功能，如体积小，轻便，易于安装，省电，信息发射清晰度高，发送即时，容量大，价廉物美，有大量的国家使用。因为它不涉及华为自己掌握类似信息搜索功能，而是使用方自己掌握，与敏感信息问题无关。但美国仍打击华为，不准它的同盟国家与华为做生意，因为怕华为的5G网络生意做大做强，超过美国，在通讯网络方面美国会失去主导地位。其次如果华为接受了全世界大量的订单，美国在情报获取上就会少了很多。但打击毫无道理，且华为是“进攻性马”立场，表现出的是大度、宽容和备用方案的机智，让有识之士拍手叫好；这也导致国内外人越来越多喜欢华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振锋教授也用实例解说中国做法的好处——“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上千条宝贵生命的消失，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幸福祥和的新春佳节，14亿人民的隔离和自我隔离，多少年来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损失之大，30年来所罕见。客观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同的声音

是正常的，有舆情也是正常的。对新媒体时代疫情防控中舆情规律的科学把握，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疫情遏制措施。坚持疫情防控中的自信、开放与透明，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实现正能量信息的充分供应，让信息跑过病毒，更能够增信释疑、凝魂聚气，形成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B、泸州老窖简介

著名于世的泸州老窖特曲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有近400年历史---据传明末清初泸州舒姓武举，在陕西略阳担任军职，1657年他解甲还乡时，把当地的万年酒母、曲药、泥样等材料用竹篓装上，聘请当地技师，一起回到泸州。在城南选择一泥质适合做酒窖的地方，附近的“龙泉井”水清冽而甘甜，与窖泥相得益彰，这就是泸州的第一个酿酒作坊，也是现在泸州曲酒厂的前身。到1757年所产曲酒已闻名遐迩。1915年泸州老窖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后，由泸州老窖传统酿制技艺第18代传人温筱泉兴建，拥有90年窖龄的窖泥呈五彩斑斓之色，酒体醇正丰厚，深邃绵长。

泸州老窖为可见之糟、水、糠、窖泥微生物种等有形之物，一般来说，酒水的品牌不同，材料不同，存放的时间也会所有差异，比如五粮液的存放时间大概在七年左右，剑南春的存放时间大概在5年左右，泸州老窖一般也在六七年左右。浓香型白酒能放多久，要看是高度原酒还是市场成品酒，前者可达到数十年，而后者一般在五到八年，不过还需要依据酒水的情况具体分析。

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分别甄选30年、60年、90年以上的窖池精心酿制而成。泥窖酿酒，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泸州老窖，拥有规模庞大的原生态老窖池群，其数量达至10086余口，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被誉为浓香鼻祖，称为中国第一窖。“千年老窖万年糟”，历代酿酒大师，就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养护着窖池。窖池持续酿酒时间越长，窖泥中繁衍的有益微生物越多，产生的香味物质就越丰富，酒体风格越明显。

C、科学创新有泸州老窖式存而待发

“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研究，是在中苏交恶、“四清运动”开始，“文革”前夜意识形态加紧的1963年停止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在国内、国际解决它的条件和时机就不成熟。在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为寻找“赵正旭”老师，曾问当过盐亭中学校长的雍圣契等老师，他们说“赵正旭”老师后来调回家乡去了，具体情况问不上信。近些年我们也问过在四川大学数学系上世纪60年代曾读书和留校教书的高隆昌教授等老师，知不知道川大数学系师生中有人研究过类似“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的数学课题？高隆昌教授说他不知道；他还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数学

上“就是个反演变换问题。比如先将球映射成单位球，然后作反演变换即是。

我们也不明白1953年柯召教授调回四川大学任教起，历任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80-1984年）、名誉校长、博士生导师---有职有权，为何不把“柯召-魏时珍猜想”变相写成论文在川大自己的自然科学学报上发表---即使他们不投全国性更高层刊物？1963年我们在盐中图书馆和赵正旭老师偶然相遇，只与他交谈了10多分钟，过后我们没有再主动找过他---盐亭中学的高中部和初中部相隔很远，盐中图书馆在初中部那边，只有一次我们再次到图书馆借书，远远看见他在初中部一间教室门口，像在组织初中部学生课外去劳动，我们向他招手打招呼，算是最后见到他的一面。以后我们读大学和在外地工作，就再也不清楚他的情况。

他是否是我们招手打招呼后，不久他就从盐中再分配调到盐亭更偏远的农村初中教书，还是后来文革中或文革后，调回家乡射洪县的？都是一个迷。因为如果1963年他就调走，1996年出版的《盐亭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纪念册》里没有他的名字，也有可能。我们之所以要寻找“川大学派”传人赵正旭老师，是因44年后的2007年我们出版了《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已经能够向他说明可解答他告诉的难题，向他表达感恩---因为我们连他的名字是“赵正旭”还是“赵本旭”也搞不清---我们心里记得是“赵本旭”，但《盐亭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的《建国后在盐中工作的教职工名录（1950-1995）》里，28位姓赵的教职工中，只有“赵正旭”的名字，没有“赵本旭”的名字---因此我们只能纠正自己原先的记忆。

我们也曾问过姐姐和姐夫哥，他们也拿不准。姐夫哥在西南师范学院与他是同学但不同专业，而且来自两个县，仅认识而已。姐姐只与他爱人相识，也是因得到过他爱人在涨洪水时，冒险划船帮助渡江，非常感激；但书面上写名字也只能记得这回事。由此我们感到非常内疚---1963年那还是个“紧锣密鼓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时候。我们到盐中图书馆借书，他看到我们的名字，突然问我们姐姐名字这个人认不认识？我们说是自己的姐姐，他就主动说了他爱人在涨洪水时，冒险划船帮助渡江的事。他也说了我们姐夫在西南师范学院读的是中文系，1962年按时毕业分到了遂宁中学这个好中学。他1958年在西南师范学院读的是特招的30名“大学数学教师培养师资班”，因自然灾害“师资班”停办，1960年合并到川大数学系而多读一年；1963年毕业到盐亭，县文教局还要叫他到大山里的柏梓初中去教书。他不愿意，文教局就叫他暂到盐中初中部去看看。

我们当然明白不服从分配不好就安慰他。他回

应说：“其实到柏梓初中教书也没有什么，只是在川大的三年中，柯照教授等老师指导学习的很多极高深的如拓扑学、微分流形、抽象代数、多复变函数、泛函分析等知识没用了，一时想不通”。我们觉得学了就学了嘛，就问：“川大学的这些高深数学有什么用？”。他一下变得严肃地反问我：“能证明‘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这道数学难题吗？”44年后当我们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出版了再回忆，才觉得像喝了泸州老窖存放90年以上窖池精心酿制而成的原汁酒一口一样——科学具有统一思想作用，但又不同于宗教、神学和政治等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指挥是更多靠信仰在要求。而成功的纯科学建模，靠的是智慧、“科商”。这种科学建模，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

具有重大价值内涵的科学建模，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和时间的打磨在选择。即使有不可抗拒的因素，个人把它放弃了，也会流到外面在某一天某一时刻，重新被唤醒发光发亮——我们称此为类似百年泸州老窖存放甄选30年、60年、90年以上的窖龄原汁酒，更清冽甘甜现象一样。有很多例子都能说明科学创新有泸州老窖式存而待发。例如，孟德尔的“遗传因子”性状传递机理类似的基因建模，湮没了30多年至50多年后，到1908年才由摩尔根观察到基因的存在。玻尔兹曼不同于汤姆逊、卢瑟福、玻尔单个原子结构的大量统计规律的“原子论”建模——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开山鼻祖玻尔兹曼，当年沉浸在他的“原子论”建模，与奥斯特瓦尔德等持唯物革命的科学家的“唯能论”不同，后者的围攻使他心力交瘁倍感孤独，导致1906年抑郁而自缢身亡。但他的原子论建模基于完美解释和预测物质的物理统计分布性质的许多现象，死后为他在物理学的巨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普朗克、玻色、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等人建立量子统计涉及到的黑体量子论的辐射定律、布朗运动、全同粒子、自旋波函数、费米子、玻色子等概念，都与玻尔兹曼的原子论建模有关。

柯召-魏时珍猜想的建模开创也如此。而说明此“川大学派”不虚，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些教授和教师开创的？起因和瓦解具体情况如何？当然只有赵正旭老师才能进一步提供更详细具体的材料。但赵正旭老师现在应该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了，他还在不在世上？能不能在他家乡射洪县找到他？我们也不清楚。只能深深的怀念和记忆。

4) 柯召-魏时珍猜想存而待发类似泸州老窖

A、柯召-魏时珍猜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1953-1963年间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科学家推进“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

学家的“灵魂猜想”，提出称为“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等重大超弦全息原理本土创新，实际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很多没有公开的对真空和虚数对应物的研究认识。

苏珊·鲍尔的《极简科学史》一书——其中第一部分第5章“真空”，苏珊·鲍尔开篇就说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论：“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其次，伊壁鸠鲁也像德谟克利特一样，解释我们周遭的物质实体，“并非是由神灵的介入而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原子在真空中不停地旋转，不时意外跳跃，它向旁边随意一跃，撞上另一个原子，然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实体”的。而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学毕业，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就是关于对伊壁鸠鲁的研究——马克思为啥研究伊壁鸠鲁等古希腊的原子与真空，这不是无的放矢。

苏珊·鲍尔说伊壁鸠鲁也像德谟克利特信奉“神灵”——真空，即不只是“原子论”。古希腊先哲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类似今天科学主流说的“量子论”，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含有“不变量和极小模型”的双有理几何关系，而有“量子极小模型猜测”——双有理等价极小模型具有同构的量子上同调环。说白了，类似实数原子的量子数和量子真空是类似“双曲”线、面的。这延伸到“量子层猜想”——这是一种带边的完备非紧流形。有趣的是，在总曲率为正的情况下，它的拓扑很简单——它的微分同胚于平面，但这个情形也最有困难——需要在无穷远处的渐进性质，而这也是所知甚少的。马克思主义能证明苏联必然解体也在这里——“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以苏解马”，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称“神灵”类似的科学上虚数、真空，也当作“唯心主义”——这与具体对象“真空”说的“神灵”混淆，因为年青的马克思也赞成像伊壁鸠鲁坚持德谟克利特的“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

这种马列主义的量子论，包括类似0、自然数、实数、虚数存在的数论量子论。这种特色唯物论的彻底解释，也可见马列主义全球化的初心——这还可以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承认虚数是真实存在的，推知和马克思的一致。再到19世纪末，列宁支持玻尔兹曼提出的类似乌托子球的原子论——这类似统计热力学的量子论——即可见马列主义的初心。“乌托邦”是“空想共产主义”，但成千上亿上了“以苏解马”船的人，认为“空想”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对有的不“识相识量”的人——不认识相对论存在虚数一类的超光速；量子论有真空量子起伏等，赶不下船——“反相反量反中医”。

川大校长李言荣院士的《科学“从0→1→无穷大”》文章联系马列主义妙不可言：“0→1”——

类似自然国学的“有生于无”和量子力学实验的“量子起伏”原理：即在于 $1+(-1)=0$ 的运算，在无穷多的自然数、实数、虚数和复数等的数对中，都存在。其次，“0”可映射在“点内空间”和“空外空间”---即负实数和虚数也可看作“0”，而负实数开平方是正和负的虚数，但负虚数的平方又是正实数；由此宽窄科学“霍金辐射”原理、“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的翻转、量子卡西米尔平板效应、彭罗斯的宇宙轮回“奇点”等理论，就更能解读“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科学大义了。即它的科学建模是正开启中国史上最宏伟的强盛之路，使我国基础科学前沿研究，如 60 年、90 年以上的泸州窖龄原汁酒，已跻身世界科学之林。

B、重庆建党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赵正旭老师 1963 年透露的信息从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的证明，在校内的川大数学家们最终是偃旗息鼓了，但没有说为啥？今年是重庆成立共产党 100 周年---此公开解密的是：2011 年 3 月 12 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 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和 2011 年 3 月 13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到 2017 年 11 月 13 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 8 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 年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也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 年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颂”。

C、重庆建党联系列宁反对“乌奸文化”

“乌奸文化”是今天国际上由前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争论，造出的专用名词。马列主义不是阶级斗争通赢通吃。唯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策略，在 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苏联主持制定苏联第一部宪法规定时，因反“乌奸文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存，中国是证明---联系中国解释“乌奸文化”，类似著名作家刘慈欣先生在获 2015 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开头第 8 章“寂静的春天”中借写程丽华的话，解释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谁没有这

种幼稚”---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0 年前重庆建党已奠雏形---极左作法的苏联排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100 年后纪念重庆成立共产党，纪念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

1917 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成为不可阻挡的一场世界革命的洪流。而列宁反对“乌奸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保证---1917 年十月革命炮响后，列宁提出建立欧亚联合国的设想：依法治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进出由人民自决。列宁的设计非常英明，不愧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一百年已过去，还有大人说这是列宁埋在俄罗斯大厦下的“定时核弹”---反之可见列宁英明。

由此来看有中国学者说：1689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归属称谓使用的“中国”与“中国人”称呼，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但这仅是一个事实，并不代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承认中国疆域就如此开始。也不是真正列宁和马克思要立的“心中的共产主义”---因为在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维京人”帝国仍肆无忌惮占领别国疆域。列宁反对“乌奸文化”，主张共产党国家之间平等互利，依法治国，如列宁 1917 年 6 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首次表明要采用“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政策讲话。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掌管俄罗斯，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列宁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

这且不说 1922 年在原俄“维京人”帝国领土境内，形成的数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在国家面临解体的现实危险下，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但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本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到格鲁吉亚去调研的时候，却自作主张把表达不同建议的格鲁吉亚党中央负责人抓起来，这是列宁反对的。列宁指责斯大林主张沿袭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是缺少耐心，提出要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可见把实践中的失误归结于马克思和列宁搞阶级斗争，是“乌奸文化”无正义可言。

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信仰的列宁，也是第一个反对侵占中国疆域领土的俄国人，他最后完成登上列宁主义的高峰。

D、重庆建党与巴蜀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之谜

a、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等思想。但这仅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具体跟中国的历史、国情有关的，我们来说1649年出生的盐亭历史名人张鹏翻所为。张鹏翻中康熙时的探花，1689年他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口传他外斗帝俄，内斗“内鬼”，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是与他在家乡当难民、灾民、饥民、移民时的感受，以及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这个“口传”变为公开出书的，例如，四川盐亭原五龙龙潭中学教师任周浩先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及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的初中老师，2016年出版的《黄昏练》书中讲了此事。

b、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久远，在盐亭也有回响。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巴蜀人在重庆建立共产党。为啥？

c、盐亭文通镇石牛庙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家私塾和盐亭县内及成都等地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E、重庆建党前的国际时事背景

1917年9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开始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俄。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红军在1918年和1919年，忙于与俄罗斯西部和南部的白俄作战，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在1918年6月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到1918年11月各种忠于“白俄运动”的派系，在最高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的统治下，在西伯利亚合并并组建了临时全俄政府。

苏俄到1920年底，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只有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1920年4月6日的“贝加尔沿岸工人制宪大会”上，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上乌金斯克，但它仅仅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承认。苏俄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在5月14日，给予远东共和国最初的财政，外交，人力，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接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这使得莫斯科得以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并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其组建“人民革命军”。远东共和国的成立避免了苏俄与日本间的直接冲突，促使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军队撤离，同时其武装力量协助苏俄剿灭远东的数个白俄政权。

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和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在马林1921年6月来华之前，早在1920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同联系建党，为啥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建党工作的，然而最早他们正式派出的代表却是一个以“马林”之名活动的荷兰人？目前俄国公开的资料披露，“魏金斯基”实际是远东共和国俄共（布）中央远东局领导的情报局成员。远东情报局的任务是避免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落入日本干涉军、白俄卫军和拥护中国的军队占领，但高层有人也在推动延伸及中国“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幻想的“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任务。这是列宁一贯反对的，所以列宁选派“马林”之名来华，是早在1920年争到共产第三国际的赞成，只不过马林返回祖国荷兰安排再到中国，路上耽误很多时间——列宁与“乌奸文化”的斗争，暗中是激烈的。

马林1921年6月由上海到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了解到重庆已建党和魏金斯基的一些真实情况。马林当然知道列宁给他正大光明的任务，和魏金斯基的远东共和国情报局人员身份与秘密目的——马林之所以被列宁重视，正是看重马林求平衡的能力——马林自己的建党实践和所见所闻，知道党外对敌斗争的残酷，也明白党内路

线斗争的尖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无法相融，之间的你死我活就是眼前的例子。马林的道理与李大同沟通后，提议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李大钊的赞同。

F、重庆建党的来龙去脉

a、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就是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报告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b、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到1910年学成归国在盐亭和成都、重庆、南充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其中我们知道的一例。在巴蜀类似情况很多，在1911年初开始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革命群众洪流，就是一个证明；同时也成为“重庆建党”的先声----**自然国学中有“天”变了还是“天”，“地”震还是“地”的观念**----这里“天”代表“天下”型国家观念的自信，即“政权”的变换并不是“天下”型国家观念的消亡----只要她活在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心中；**“地”震还需在“地”上的勤劳，才能丰衣足食**----中国共产党就有这种自信----马克思主义从巴黎公社起义，随敏感时政要闻“口传”深入中国，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准备打造成立“天下”型国家的“共产党”，直到1911年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才第一次在中国实践和尝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也为10年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20年3月12日准备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拉开序幕。

但现在一些媒体和书刊发表文章，炒作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清朝的改革“红利”被“保路运动贪污犯窃取”；清朝政府的官是好官。这类似当年对付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苏俄远东局派到上海的杨明斋在不明真相下，听令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去作干扰的说法一样。这是违背列宁意志的苏俄部分高层及远东书

记处和情报局，自1920年起，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

c、“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得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莫斯科会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远东共和国组建“人民革命军”，赞成中国“应并入远东共和国更强大”的“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幻想计划----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理所当然要先下一着“棋子”----支持已准备10年之久的张澜等返回重庆，立即成立“共产党”----即使再成立“上海组织”，历史也要清白中国有过自主权。

今天已证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即使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到两年----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这种自信，来自“进攻性马”类似**王阳明的心学与中国传统自然国学中的观念：“天”变了还是“天”，“地”震还是“地”分不开**----解散之前的1921年8月14日，在北京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双方达成的解散条件也很简单----不得像布尔什维克消灭孟什维克一样，追杀无违法的参加过“重庆组织”的成员；反之，前者不违反该条件下，“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暴露成立过的事实。

d、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王右木方案”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及预先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有关----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美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其次，特别是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科技园”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时，

就主张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E、“柯召-魏时珍猜想”有知道重庆建党的人吗

a、不说支持“柯召-魏时珍猜想”中的张圣英知道“重庆建党”，就说中俄国家层面“重庆组织”成立过的事实，为啥到1956年时，前苏联还对《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敏感？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时，才觉得是一道政治难题——莫斯科方面，为啥硬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才安心理得交还中共？是因为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是沿续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话的话，那么看“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

b、再加之那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旅顺港，和说到做到，更加强了苏共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因素。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

张澜去世前也许向杨尚昆主任谈“重庆组织”的事情。为啥？，也许关系杨闇公、王右木、袁诗尧等参加“保路运动”不忘初心的原“重庆组织”老同志牺牲之谜。杨闇公是杨尚昆主任的亲四哥，有些事情杨闇公曾向杨尚昆谈过。也许像盐亭1934年的“西山坪事件”，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背后与在四川张国焘--王克明等追杀参加过“重庆组织”成员有暗中联系。

“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被打成所谓的“叛徒”、“投降、反水”。我们曾找过原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了解过——1980年代我们在盐亭县科协工作，是两届盐亭县人大代表和一届盐亭县人大常务委员，一届绵阳市人大代表；因要反映群众对“西山坪事件”之谜的不同看法。刘泰焰主任说：何登甲、申秋成“叛徒案”，指1934年10月汪克明被捕，被国民党县保安队和田颂尧29军包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革命根据地300多人的游击队与敌人谈判，条件解围放群众，愿接受本县保安队收编。结果被派到安县去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被令回盐亭整顿。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这支龙潭根据地的游击队回盐亭后，很快“反水”，借机逃进龙潭附近石

狗场（今日的九龙镇）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29军在1935年的围剿中，捉住何登甲、申秋成等300多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高灯镇等地。

但也有说“接受保安队收编”，是因被包围的共产党游击队成立临时的党组织决议——300多游击队员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的名义解围，是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书记王克明，被党内袁诗尧曾建立的“暗线”，告知过汪在1934年4月间在盐亭县城被捕就叛变。临时党组认为，汪克明即使不是“假释”，但他的决策让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也有错。为了避免上千人的同时牺牲，被收编解围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也许是何拔儒1955年逝世前，又通过辗转关系向张澜求解“口传”的消息，或者张澜在1935年盐亭300多共产党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后，就知道次事件情况。杨尚昆主任当然知道，“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的复杂性。难解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交给后人去解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击鼓传花”，法治有正反两种说法——也许这是“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法律”，必然涉及探讨的案例意义，能不能解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再留遗憾。

c、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末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

张秀熟主席是王右木的比袁诗尧更早从高小到大学、更亲密的学生，但袁诗尧是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1920年3月经王右木、张澜介绍参加“重庆组织”。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又经王右木介绍最早参加“上海组织”，并隐蔽下来。1925年春天，袁诗尧应“重庆组织”解散后而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的盐亭在教育战线的成员推荐邀请，离开南充返回盐亭任县教育局长。1927年3月初袁诗尧被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及组织决定，以他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派他到田颂尧的29军作

政治部主任。不久田颂尧又任命他兼任潼川联中(三台中学)校长。1927年7月13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公开叛变,中共四川省委决定调袁诗尧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是成都师范大学附中教务主任。

1928年2月14日军阀们疯狂举起屠刀镇压革命志士时,中共川西特委决定要袁诗尧等人疏散,但他仍坚持斗争,忙于动员、掩护其他同志退却、隐蔽。2月16日黎明被国民党军警搜捕中不幸被捕,与14位同志被敌人秘密残杀于成都下莲池。现今中央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当年党组织褒扬袁诗尧同志的历史文献说:“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真是川党中少有的宣传鼓动家”。袁诗尧也是张秀熟主席的战友,张秀熟因没有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的经历,王右木没有介绍他参加“重庆组织”;1926年经刘愿庵、童庸生介绍,张才入党。

d、何盛明主任与张秀熟主席的关系,何盛明主任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根据何盛明主任自己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末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张秀熟主席的话“属实可信”吗?

据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网说:“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这之后张秀熟主席参加过重庆“适社”无政府主义组织了吗?何盛明主任是如何完成张秀熟主席交给她写“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的呢?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含有把矛头指向王右木烈士和袁诗尧烈士。例如,在何盛明主任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诡谲中一点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尧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把“适社”说成“重庆组织”也是贡献----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是“不伦不类”:那“适社”不就是杨明斋在“上海组织”外支持的吗?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

5) 新冠疫情初报失灵与建党开端史缺失

A、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

a、两批顶层专家首察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失灵,与成百上千专家学者发文著书写建党开端遗失重庆建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在“基因组学”和“暴露组学”两门学科上联系起来----一是“暴露组学”这门学科姗姗来迟,国内90%以上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注意,何况是忙于发文著书研究党史的专家。二是类似都世民教授告诫的:“对于政治问题讨论要谨慎,特别是敏感问题”。有职,或更有权的专家学者只能对“基因组学”情有独钟,心无旁骛了。所以不能责备有职有权的专家学者有什么失误----如果类似“暴露组学”这门学科不能落地生根,到任何时候、到任何人手里都难以抉择,因为没有基础科学理论标准的指导。

这事我们有感受,也来得很迟很偶然----2017年6月间,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我们大感高兴。就问:“王老师,我们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禅溪河畔地区,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我们这时才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我们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b、2020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武汉警方第一次通报了“八名造谣者”的消息很快上了央视----2020年1月2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通报“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其实武汉公安局处理就处理了,知道的人有限。但央视向全国或世界广播,负责的不懂得科学?没有“责任”?但从武汉警方到央视的工作人员和领导,是忠于职守类

似只能对“基因组学”情有独钟，心无旁骛——因为他们不是医生、生物学家，无责任。但看到央视通报“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的两批顶层有职有权的生物学/医学院士，在汉会出错吗？

第一批是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抵达武汉。这一天，中国CDC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与同事们也赶到武汉，分三组对武汉金银潭医院的89例收治病人全部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工作包括病例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据CDC官网信息，“随着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相关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报告陆续提供到决策部门手中”。

第二批是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抵汉，在当地调查指导防疫工作直到1月15日。1月16日回到北京。《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等媒体文章报道说：“1月8日晚，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要求他尽快去一趟武汉。次日早上7点，他就坐上了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时，当地提供给专家组的资料有限，很难判断出病毒有没有人传人的能力。1月11日专家组的一致意见是，如实公布疑似病例。但在12日并未公布疑似病例情况。对此，专家组感到很意外”——但这里专家组是不到位的。按“暴露组学”的知识和实践，应该直接去考察被查处的“八名散播谣言者”的真伪，帮助武汉警方和央视树威信，或有纠错——因为专家组是顶层有职有权的生物学/医学院士，真懂新冠病毒危害，但他们不管。

c、为啥？有专家组的成员类似说：“暴露组学”不仅是考察、了解那么简单，而是要有亲身接触的事实——钟南山之所以行？是有亲身接触——2020年1月19日曾光与钟南山院士等人一起，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再赴武汉。1月20日晚，钟南山在与央视的直播连线中，肯定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并称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由此迎来转折点——《财经》记者俞琴和黎诗韵，专访匿名接受采访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说：当时他们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材料有限，无法得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结论。即使专家组特别注意医务人员有没有感染，“每到一个地方就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可见顶层专家也不懂不管“暴露组学”的。

但发现“人传人”对公众防护、医疗救治，都需要懂和管“暴露组学”——1月20日成为2020年新冠防控重要时间点——从2019年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市卫健委公开披露后，2020年

1月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山，从广州奔赴武汉，两天后公开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在钟南山之前，先后有两批专家组分别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赴武汉调查，因不懂不管“暴露组学”，也均未提病毒会“人传人”——2020年1月4日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公开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10日又有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对媒体表示：病人病情及疫情扩散，“可防可控”。

《财经》记者专访的第二批专家组的这位专家说：医务人员和病人不可能有共同暴露，只要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因为医务人员一般和病人没有特别密切的接触。也许他的意思是钟南山也不懂不管“暴露组学”的，因为他说的类似“暴露组学”的内涵是：钟南山院士“第一，他在广东就已经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冠肺炎。第二，正因为钟院士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所以他到了武汉，马上有人跟他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

d、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月5日晚，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出现发热症状，1月10日因“病毒性肺炎”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第二批专家组1月10日以后去同济医院，也去了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专家组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一个地方都要问。当听说哪有医务人员感染，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得到信息根本不是。医护人员的感染，专家组也没看到——谁知道他们在哪？这么大的院区，专家组怎么去找呢？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有医院和卫健委的人，医院有的是院长，有的是医务处主任。他的意思也许是：“人传人”传染很关键，专家组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大家看央视，不信“暴露组学”有科学成分。

有专家组成员说：第一批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方面的调查发现，第二批专家组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都不掌握。没办法，就负责临床救治了。第一批专家已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因为第一批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第二批专家组和第一批专家组交接，重点是看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指导治疗。作为专家组当然怀疑，但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

“暴露组学”树立是2月10日湖北省委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B、盐亭有何类似暴露组学的党史联系

钟南山院士知道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有人说他在广东就已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那么盐亭有何类似暴露组学的党史联系，不像专家发文著书写建党开端出现遗失？

a、其实受党教育的党员和群众，都知道保守党的秘密和要谨慎谈敏感问题。1950-1951年解放初，我们老家下半沟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那时我们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热烈，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乡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镇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他听说传言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时问过此事引出过额外的话题。其次唐开元住的何家湾，还有一户贫农叫何礼成（何吉光）。我们小时看到何礼成穷得房子没用泥抹涂墙壁，用竹片一枷了事，连风都挡不住。因读高小、初高中假期，我们要跟大人一起在合作社、生产队里干活，休息时也听到何礼成讲何拔儒先生在天垣场戏楼上讲学的故事；这是一串串。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小平同志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张国焘把“重庆组织”势力的“残余”，与盐亭龙潭“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联系在一起。因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参加过龙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经历过各种风暴。何拔儒是在传播中华上古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时，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1925年修建起纪念盘古的天垣场。并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拓片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如此的开放课堂，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使得《盘古王表》一类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原因就是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更巧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西陵镇龙凤人，2017年10月1日从成都

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我们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小平同志。就在这次聚会上，黄靖的大舅赵老师告诉我们说：“何拔儒教过1907年至1908年在四川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求学的朱德”——这是我们第一听说，感到很惊奇。赵老师1950年代初就在盐亭县文教局工作，他的父亲也是解放前的老教师，也许有他消息的来源。

b、小时候我们听到赞扬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苦难中辉煌的故事很多。但到1962年我们读高中时没有多想：为啥大人们后来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1963年我们想利用假期收集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希望今后能写出《龙潭激浪》的盐亭革命史该多好。于是向杨崇汇班长汇报了这类想法，他热情支持。杨崇汇以后能当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高级职务，也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家乡革命传统的熏陶有关。

c、《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曾与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段雯主任一起在市社科联开会时，向段雯主任汇报过盐亭本土1934-1935年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西山坪事件”，后被国民党砍头，又被解放后定为“叛徒”问题。如《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说：何登甲“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这是我们向刘文传先生反映过的事——我们1980年代还在盐亭县科协时，因工作与盐亭县农学会联系，一次偶尔与盐亭县农业局办任朝洪主任谈起1934年盐亭“西山坪事件”，任朝洪称何登甲是他的姑父说：何登甲被国民党砍头后，全家灭口很凄惨——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出走流浪，生死未知。他希望组织为盐亭本土1934-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就义的共产党人，又被今天定为“叛徒”解开疑团。

但据刘文传先生转达段雯主任的话说：“翻案证据缺乏”。其实党史办自己写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简称《盐亭党史》）和《中共绵阳市志》（简称《绵阳党史》）两书自身就是揭秘的“证据”——从两书的《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和记叙中，把有关1921-1936年间盐亭籍在革命中牺牲定为的“烈士”，和在盐亭本土的中共地下党县、区负责人被定为“叛徒”的人各列一张表，以此对照此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控制指挥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中共四川省委、县委的出轨行为，和被张国焘等定为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09-1984，四川达州宣汉人）两次被捕的诡异，是揭题“盐亭学”、“重庆学”和“上海学”最为诡谲的证据材料。

从《白鹿原》一书写作者母亲的朋友“白灵”

---一位优秀、忠诚的女共产党，在党内斗争中被活埋。而白灵的哥哥，却对解放县城时帮他参加革命的“黑娃”---白家曾经的长工，后来参加共产党，指挥解放县城的真正革命者，诬陷杀过共产党而在解放后被误杀---《白鹿原》虽然是小说，但和《三体》科幻小说一样，是文学反映“暴露组学”。与此不同，段雯主任说的“翻案证据缺乏”的逻辑，是如今写在党史书报和官网的，是把汪克明和张秀熟等活下来的在 1936 年前大革命时期敌人监狱的不正常表现说成“传奇”：逻辑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身份，宣传正能量的，就不一定被屠杀；在解放后也有好工作。但与他们共事的如王右木、杨闇公和袁诗尧等烈士，就没有这样“幸运”。

d、而余国政的“幸运”，是活下来能自己说清楚自己---我们认识余国政，是 1981 年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不久我们偶然遇到了余国政（1907-1996）。因为 1980 年代的盐亭县科协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两家隔墙开窗同用一个电话。余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我们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 70 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 1983 年至 1984 年那一两年，余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县委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我们问他是什事？

他说他叫余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他与刘远驰认识，路过就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余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第二任的县委书记。1950 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 20 多年刑，1979 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我们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 1933 年 5 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余国政对 1935 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干部，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听余国政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我们 1963

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所以看见余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再路过时，我们都要请他到科协的办公室坐。但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不愿意说。后来我们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 1950 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 20 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余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他绕开我们的话题，说出的话，却使我们大为惊讶。

余国政说：1950 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 20 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就已经躲过了盐亭的“肃反”枪毙期。因为 1935 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余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被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 10 多个。1980 年代我们作为盐亭县人大代表，看到群众有反映，虽然不是当事人，觉得不应该把悬念留给盐亭的子子孙孙，需要和只能向组织汇报。由此，我们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盐亭玉龙区塔泥坝和宗峰寺两地 300 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解放初已有结论，要改也难”。所以我们只有等待找有向老革命同志请教的机会。

e、1992 年 10 月我们调离盐亭，到绵阳日报社工作。1998 年 6 月“首届海峡两岸螺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 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4 年上龙潭中学。1938 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 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东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作。作过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王明金 1868-1928），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1911 年与张澜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1920 年张澜介绍王济钦加入过“重庆组织”。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 至 1960 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浮夸

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之一。王剑清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王剑清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快得到了纠正。

鉴于王剑清是 1938 年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地方，是梓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之地，她最清楚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也是最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而且我们也被应邀和采访参加海峡两岸螺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能亲自向她请教“中共盐亭县历史”中的难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由此我们根据从童年到 80 年代在盐亭工作，亲身所见所闻盐亭党史中的难题是：1950 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为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登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党员和干部划为的“叛徒”案。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历史》等稿本材料中，对解放后制造的被国民党反动派 1935 年屠杀的盐亭本土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那 300 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

例如，余国政是改革开放后才没有归类为“叛徒”，只是因为他活下来，能自己为自己不是“叛徒”辩护，政策才得到落实。历史的真实是不可改的，余国政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们无法判断。这次王剑清的回答证实是：1998 年王剑清老人回忆起 1935 年前那段革命老区历史，盐亭本土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本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像早曾想过。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 1934 年 10 月“西山坪事件”演变的 1935 年 3 月大屠杀的真相，认定汪克明指挥正确。但对被敌人包围的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会员数百人，被定“叛徒”；因主管部门没有公开宣称，难于提出。

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盐亭本土的广大群众与上面的认识有差距。但王剑清毕竟是老革命，她听我们的反映后，处理的方法是：把当时的盐亭县党

史办刘泰焰主任亲自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主任给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谈追认盐亭为革命老区等问题。当时来参加海峡两岸螺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还有退休的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但王剑清同志没有直接找杨超书记谈；而是教刘泰焰主任出面，请杨超书记帮助解决“西山坪事件”遗留问题。但刘泰焰主任后来说，杨超书记也没办法。不得其果。王剑清同志会后回到北京，也在当年 10 月不幸去世。这里多说一点：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办后来出版的党史书，把编出的党史人物解放后坐牢或被镇压的事是不记载的，如盐亭党史书把余国政写成 1936 年后就回家“在万安村教书”；刘仰高也如此。

f、“暴露组学”中有“暴露组学”，也许这也是两批顶层专家首察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失灵因素的调查难之谜。2011 年第一次看到《晚霞报》上报道“重庆组织”的消息后，我们回忆起解放初何拔儒向抬他进盐亭县城的天垣乡贫农协会干部，透露过他参加“重庆组织”的传闻，就很想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事情的真相。绵阳市螺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龙先生，同何拔儒和任望南都是盐亭九龙镇人，我们向他讲过想到盐亭九龙乡寻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何拔儒挖掘螺祖传说的故事，同时顺便想证实何拔儒参加过“重庆组织”没有？2014 年 8 月初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一同到盐亭县原九龙乡，寻访到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问到 1920 年的“重庆组织”的事情，何连光先生明确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他的大伯父何拔儒参加过重庆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而且何连光先生提到任望南每次从外地回到九龙，都要来看他大伯父何拔儒，任望南和何拔儒的关系非常密切。想到绵阳日报社原办公室主任任启乔同志，也是同何拔儒和任望南是九龙镇人，他向我们说过，他知道解放初镇压反革命中，何拔儒的孙子或儿子中，有被枪决的。我们也向何连光先生征求有否此事，何连光先生连连说没有。我们此时才感到写“盐亭县党史”，比写“盐亭县志”难。特别是写解放前的部分。对解放前“县志”的历史，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对于写“县志”的人都类似是“中性”的。但对于“党史”解放前部分，由于主要是夺权斗争，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是旧势力追捕的对象，活动是对社会大众保密的。除当事人外，解放后社会大众，认可的正面，是革命中牺牲。而解放前旧势力威吓大众，也要拿此公开宣传。

所以 1935 年被国民党砍头 300 多共产党人的传说，在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周围流传很广、很久。而解放后，共产党已掌握了政权，社会大众去摆谈过去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牺牲的故事，也认为是正面宣传共产党的历史，和来之不易的苦难辉煌。但

解放后却因张国焘 1932-1936 年在四川分裂党、分裂红军，上层的斗争影响到下层盐亭革命老区龙潭 1929-1935 年间，建立的“工农前卫团”1200 余人的地下党游击队革命武装等人员，来承担牺牲和瓦解。甚至解放后对还活下来人和解放前已去世的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进行追究。又不公开案情，和允许当事人或他们的后代及亲属辩护，再由法庭法律认定。所以到今天写“盐亭县党史”的人，就很难处于“中性”，而不记。

但这类事情，解放后是该镇压还是不镇压，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也不愿意讲----说出也不“光彩”，也防再遭打击。其次何开文县委书记等领导叫我们不要管，说写“党史”不是我们的专职或任务。21 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我们只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

四、简评悉奇的物理学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

1) “柯召-魏时珍猜想”证明意义后传

A、《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出书传奇

柯召和魏时珍等川大数学家在 1963 年前，并没有对外公开说研究西方数学的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学的灵魂猜想，为“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的证明。1963 年赵正旭老师告诉我们的，也只说柯照教授等老师指导他们学的是如拓扑学、微分流形、抽象代数、多复变函数、泛函分析等知识。也许川大数学系师生中有人研究“庞加猜想外定理”，本身是学校组织的一件很保密的事。赵正旭老师只是在他毕业分配安置不好，我们偶然相遇，情绪一时低落时，在我们追问“川大学的这些高深数学有什么用”下，他才透露了一点信息让我们试试看。

因此我们也只是按照赵正旭老师说的浩繁学习的办法，在课外寻求多读高深的数学和物理等书。记得大学一年级我们学的《高等数学(基础部分)》，是清华大学数学教研组编的教材，书后有德国罗德著的 1-3 卷本的《高等数学》，就认为了不起。哪知一天我们偶然看到电气化专业的“张公威”同学，在看 1962 年出版的苏联斯米尔诺夫编的第 1-5 卷共 11 册的《高等数学教程》书，才知天外有天。但直到 2005 年 4 月是我们退休年龄到点时候，都是帮赵正旭老师保密的----这之前，我们已经先后公开出版过《中国气功思维学》、《三旋理论初探》和《解读<时间简史>》等三本书，其中只讲到“三旋理论”，而没有讲到它与“柯召-魏时珍猜想”证明有联系。

但就在 2005 年 4 月打破了这种平静----一位从东北抚顺市坐飞机来四川绵阳市的客人，到绵阳日

报社找到正在做报上夜班的我们，说要与我们合作进行一项“科研”。幸好我们做的版面快完了，就让他稍等一下。做完报我们把他领到最近的绵阳军区招待所安排好，他就急忙告诉我们，想到一个打破相对论超光速的办法----吊钟的摆杆长，如果超过 30 万千米，摆锤摆动只要超过一秒钟，它的圆周切向速度就是实数“超光速”。我们听后本想说“不行”，但想到他是千里迢迢来的客人，就问他产生此法的来龙去脉。他告诉，他叫孔少峰，现是抚顺市东洲区政协副主席、抚顺市人大代表。原来孔少峰是一位朝鲜族人，却又是孔子的后裔；祖辈是从山东迁居朝鲜，加入朝鲜民族，抗美援朝时他家又从朝鲜迁居抚顺，1955 年他出生在抚顺市。1977 年恢复高考，他以文科的好成绩，考上了沈阳财经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抚顺市东洲区建委工作。

但结婚后家境的拮据更让他苦闷，恰好遇上改革开放机关干部可以下海的政策，1984 年他从建委停薪留职下海开办建筑公司。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几年下来他的事业发展到了省外北京和丹东。但孔少峰从小喜欢科学，《十万个为什么》成了他少年时代形影不离的课外读物。从课外读物中他了解到光速对原子弹的限制，一心想研究超光速的秘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这位善于思考的少年过早卷入了社会，使他失去了夯实数理化基础知识的机会。公务员下海收回他也愿意----干办公室工作，有利于业余学科学。但孔少峰回到公务员队伍，被组织上先后提升他当了局长、副区长，仍管经济工作。这个活不但忙，而且怕与他原来的公司有牵挂。干了几年副区长后，他向组织反映希望换个岗位，就这样他就到了政协。

就在 2005 年 4 月初他出差海南岛，返回在海口飞机场候机室等候上机时，在书架上偶然看到我们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被吸引住了。因为下海回归后，孔少峰不忘买科技书刊，他每年要花上千元订购《中国科学》、《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杂志；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推动力丛书》，出一本他买一本。十多年不间断订购的大量科技书刊，大多数他虽然看不太懂，但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些国家正规出版机构发行的书刊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著，绝大多数都跟作者的工作、国家的建设和群众的需要相关，或是对西方科学创新的理论作局部的数学、物理描述创新，科技翻译书籍也是跟在西方科学创新的后面搞综述、简介。当然孔少峰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但他看了《解读<时间简史>》，却有一点感到不同，就是该书对西方科学的理论创新，不但有详细的综述以及数学、物理描述的简介，而且还有在这些科学理论的创新之前和之后，做过的大量数学、物理描述的全局综述和局部详细的介绍，有一种扑面而

来的中国新气息。一个合作写《求衡论》书的念头油然而起。他回到抚顺市，通过政协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到绵阳日报社，寻访我们。了解到4月底我们将要退休，他就飞来了。

孔少峰主席对我们说：证明有实数“超光速”，这与爱因斯坦认为相反。但在 $A=B$ 的“求衡论”规律中，用“相互作用的目的和过程就是求衡”作认识---两个事物原来只为了平衡；又因为还有第三个事物作怪---破缺与弯曲，它们又不能平衡---平衡了又不平衡了，所以发展了，变化了。他提议说：据此知道宇宙演变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求平衡的规律，我们来合作写《求衡论》这部书好吗？

我们被孔少峰主席热爱科学，追求创新所感动，也赞同他说“相互作用的目的和过程就是求衡”。然而我们心里明白：哲学指导科学，但不能代替科学---后者需要实验和计算的验证。在大学我们虽然学的是冶金机械专业，并五年有四年处在“文革”中，但那四年趁不上课，我们则找书、借书自学完机电系两个专业规定的所有专业基础课程。如自学的《材料力学》不但本科用教材，还有更深的教材---孔少峰主席说的吊钟的摆杆长度超过30万千米，材料的拉伸应力强度能行吗---如果称为“孔少峰难题”，这个难题是不成立的---宏观的应力强度的实验和计算，吊钟摆杆的长度和粗细都不能做到30万千米。

所以“孔少峰难题”与1963年我们遇到过的“赵正旭难题”有本质的不同---该难题与庞加莱猜想有关。但我们不想打击孔少峰主席的积极性，而且他追求的是“平衡了又不平衡了，所以发展了，变化了”的“求衡论精神”---他讲解的实数“超光速”的吊钟摆杆超长30万千米的建模，如果升级为类似宇宙弦材料拉伸不断的应力强度的量子极小模型，也可以联系含有“不变量和极小模型”的双有理几何关系，而有“量子极小模型猜测”和再延伸到“量子层猜想”---虽然“量子极小模型猜测”和“量子层猜想”，数学界还没有解决，但如果联系“孔少峰难题”拉伸不断的有无限极小应力强度，而升级称为“孔少峰猜想”，那么与“求衡论”结合，将意味深长---即新的“孔少峰猜想”与“柯召-魏时珍猜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不能给孔少峰主席讲自己也才知道不久、不多的“量子极小模型猜测”和“量子层猜想”类似意思；也许即使讲明，他也听不明白。

想到这次合作也许能提高我们学习的强度和深度，就很爽快答应愿意以我们为主和他写《求衡论》这部书，而且要达到能公开出版的要求。但想到由我们完成的《求衡论》一书后发生争执，所以是不拿我们双方各自的意见作标准，而是以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认可可能出书为标准。孔少峰主席也同

意，于是我们签订了不悔此约的议定书。

B、“求衡论”与“庞加莱猜想应用”联姻

a、1963年我们遇到“赵正旭难题”的激励，42年来不懈地学习与自学，在公开出版了有关“三旋理论”的书之后，我们深知“赵正旭难题、柯召-魏时珍猜想”，与庞加莱猜想应用有关，也预感到“求衡论”不会与庞加莱猜想应用无关，但我们并不想在《求衡论》一书中公开暴露“赵正旭难题、柯召-魏时珍猜想”的概念---2005年5月1日我们从绵阳日报社退休后，就全力以赴投入到《求衡论》一书的写作准备中。这首先主要是去吃透“三旋理论”和“柯召-魏时珍猜”的“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证明，与“孔少峰猜想”到“求衡论”等两方向联系的学术底蕴的关系---因为2005年4月在原绵阳军区招待所与孔少峰主席交谈之前，我们本是各自独立的各管各的两码事。

b、柯召和魏时珍等川大数学家在1963年前，并没有对外公开说研究西方数学的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学的灵魂猜想为“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的证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是很偶然的。2007年出版《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因为“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求解这道难题，也跟庞加莱猜想有关：我们43年后拿出的答案类似“羊过河”的寓言故事---河上有座独木桥，一只白羊和一只黑羊分别从桥两头同时走上桥，走到桥中间要过河，而又互不相让，如何办？

把这个图案化为一维的弦线，引进到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在球的内外表面之间搭成一维的“桥”，变换为“羊过河”问题，这是一个解答1维和0维结合的三旋宽窄数学，是跟弦论、圈论、旋子论、扭子论、时空非互易论、平行宇宙论、宇宙轮回论等联系的弦膜圈说，可解答时空连续与间断的统一---这里像《羊过河》寓言中的独木桥的弦图，假设变形为“魔杖”的弦线，可类比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的“持球跑进”，和特霍夫特的全息信息守恒的疑难解答。即“魔杖”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两只羊在桥中间碰头的“转点”，有类圈体宽窄三旋式的自旋能化解矛盾。

“羊过河”的寓言，说的是白羊和黑羊打起来，都掉到河里了。但如果改成“人过河”，走到桥中间的两个人，不用打架，也不用互让，只需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旋转半圈，或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相互半转身，脚交叉，就过去了---“羊”和“人”都属于动物，但在进化级别上，“羊”处于下端，“人”处于顶层，所以“求衡论”的智慧也不在一个级别。2020年3月15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王善勇教授的《人生不需要提速》的文章说：

“就科研而言，学术训练更加重要。你受到的训练有多强，你的能力就有多强。能力有多强，你在学术上就能达到怎样的高度。所谓，0 到 1 的突破，其实是需要过程的积累的。没有能力做基础，只是一句口号而已。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从 0 到 1 的突破呢？我们能做的只有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终身学习。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人生不需要提速……初心无非是你的最初理想，情怀。但理想，情怀这个东西更加是靠不住的。最硬核的东西仍然是你的实力”。

c、出版《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后，回想漫长的 40 年到现在使我们明白：“理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代数的“四则运算”和几何拓扑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四则运算”涉及自然数、实数、虚数、复数、群论的加、减、乘、除和开方等运算方法和规则，可联系对应自然界的物质，时间，空间、真空，能量守恒、宇称守恒、对称守恒与破缺，量子起伏，不确定性原理，霍金辐射，退相干，波粒二象性，宇宙大爆炸，暗物质、暗能量，卡西米尔效应，有生于无、阴阳五行、三生万物，平行宇宙、多世界、宇宙轮回等概念语言。

“环面与球面不同伦”可联系对应直线运动，圆周运动，韦尔张量效应，里奇张量效应，规范场、量子纤维丛，电磁场传播，引力传输，广义相对论，量子隐形传输，量子纠缠，不相容原理，自旋避错码、自旋冗余码，比特以及量子比特、众特、囚特、多特，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计算公式，哈热瑞为夸克和轻子内质量的“奇迹般”相消机制疑难等概念语言的学习与钻研，为理解“求衡论”打开窗口。

2) 中医药、西医药科学理念之辩

A、为啥要评悉奇希望科学接受宗教和信仰

现代社会牵动全世界的主要是“夺权斗争”的革命或动乱----这是一种下层和顶层人群之间的战争。如 1911 年的武昌起义发生的辛亥革命、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至今还有影响。2020 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则是属于“夺命斗争”的“人传人”----这是一种新冠肺炎病毒，主要针对大量下层人群的“夺命”感染，而需要顶层人群的组织指挥救助。有人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魔鬼”，每一个人的内心也都有“良知”；而历史最终是垂青“良知”的，以大善坚定前行，特别是中国人已经历过抗击这种大的疫情，内心的未来愿景会更逐步澄明凝定成为一种真正切合的长期稳定性的心智。

而《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的文章说的：“我希望科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这与人类同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技；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技发展和创新有区别。世卫组织发布最新一期新冠肺炎每日疫情报告，截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3 月

27 日全球确诊新冠肺炎 509164 例，死亡 23335 例。目前全球已有 180 个国家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病例。而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方案”的一大特点，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确诊病例超过九成，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效用让意大利等疫情严重国家需求大增。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加快药物研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疗手段，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如采取恢复期血浆、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治疗方式，提升重症、危重症救治水平降低死亡率；这里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加强同世卫组织沟通交流，不是“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

B、科技中西医结合、并用、参与就到位吗

中医在 2020 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突出表现，我们提出中国古代有“科学”，就叫住“中医”；与西医药的区别，就类似中医药是“暴露组学”，西医药是“基因组学”；中医既定的理念、理、法、方、药来指导今天处方用药，用中医的观点去看待疾病，认为中医就不能用现代的东西才是中医，是“反相反量反中医”----因为中国的语文历史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古代文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无纸、纸贵）；和民间老百姓的交流，双方一起一般却用“白话文”。20 世纪初后“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现代中国人一般写文章以及和老百姓交流说话，大家都用“白话文”----由于古代中医著作的看待疾病、处方用药指导的理、法、方、药观点语言，是处在时代要求使用“文言文”大背景的重压下，所以与今天现代的东西说话用“白话文”就有很大差距----西医药的理、法、方、药观点语言说话的“白话文”，就类似“基因组学”。中医药今天的理、法、方、药观点语言说话仍“白话文”，就类似“暴露组学”。

a、2020 年 3 月 14 日中央指导组专家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抗疫中医讲座，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介绍当代中医的传承与改良，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中医时说：“我们现在的中医，就是坚守自己的基本哲学，坚守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引进现代的技术”----其实这里不只是“同时引进现代的技术”。更应要像“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中医药坚守的基本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古代“文言文”，要翻译为现代科技使用的“白话文”。

b、张伯礼院士还说：“现代文化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可以去学习别人的，但是别丢了自己的，

这是关键。现在的中医医生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中医医生，他们现在都是本科毕业，要学习很多中医的知识，也要学习很多西医的知识，还要学习很多现代科学的知识。所以有的人说，你们现在的中医一代不如一代，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很多的国医大师，都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抗疫治病比古人也并不逊色”---其实这种三分法：中医的知识、西医的知识、现代科学的知识，是“自取其辱”---类似说中医的知识自己，是“羊过河”的寓言中的白羊和黑羊的代表，同时走到独木桥中间，相互不让，只能打起来都掉到河里---中医药只是“羊”级别吗？不是。

若说西医的知识、现代科学的知识，类似走到独木桥中间的两个人，不用打架，也不用互让，只需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旋转半圈，或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相互半转身，脚交叉，就过去了---这类似《环球科学》2020年第二期的“最美科学阅读”，介绍巴特力的《量子空间》一书说：“两个极为成功却互不相容的物理学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如今，21世纪的科学家希望能用‘量子引力理论’将两者和谐统一。在通往这一理论的各种途径中，‘弦论’是一条车水马龙的道路，‘圈量子引力理论’是一条人迹罕至的曲折小径”---这里类似说西医的知识、现代科学的知识是“人”级别吗？是的。

更重要的是应知道：中医药坚守的基本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类似古代的“文言文”，翻译为现代科技使用的“白话文”，就是超弦这条车水马龙的道路，及圈量子引力弦论这条人迹罕至的曲折小径。如已出版《中国气功思维学》、《三旋理论初探》、《解读<时间简史>》和《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和将出版《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等书做了很多探索；而且还在互联网公开论坛发表很多和继续在补充。

c、张伯礼院士说得好：“中医文字记载的历史有3000多年，它核心的哲学理念基本是稳定的，是正确的”。为啥？其实这正是中医药说“白话文”暴露组学的理、法、方、药观点语言，类似超弦、圈量子引力理论等阐述。即“天人合一、整体观、辩证论治、理法、方药、治未病等等.....”，是可以翻译为类似超弦、圈量子引力理论等“白话文”语言文字。《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将可以作证。

张伯礼院士说的“用中医的观点去看待疾病，现在（CT）这些东西拿来，是为我所用。谁为主？这是关键”---其实这不是“关键”，既然中医和西医都成为了科学，一家人不说两家人的话---CT只不过是先制造出来，先推广使用。如果中医药能做到类似超弦、圈量子引力理论等“白话文”语言

文字翻译，发明创造的先进医疗仪器也会很多。这类似张伯礼院士说的“中医不能自己给自己限制，好像用了核磁就不是中医了。方舱里边全是喝中药，锻炼太极，八段锦、按摩、贴敷、压耳豆.....这些全是中医。中西结合舱里边有心电图机、有心电监护、有氧疗、仪器设备，所有的这些西医的东西我都有，心里更有底气”---这是一家人不说两家人的话，才更有底气。

3) 中医清理垃圾，西医清理虫子是分家话

A、中医仅把垃圾清理出去就了事吗

a、2020年2月24日晚央视白岩松连线采访张伯礼院士谈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前面我们没有说完的话题，是张伯礼院士说：“中医清理的是垃圾，西医清理的是垃圾吸引的虫子”---这话似乎有不全面的地方。在《白岩松连线张伯礼：中医突击，火线救人》的文章报道中，张伯礼院士对中西医的差异说：“中医治疗，往往不仅仅是针对病毒，而针对的是人体的抵抗力，提高人体的正气，让人体自己调动内源性保护物质，跟病毒做斗争。中医学认为，病毒虽然可怕，但它与人整体的力量相比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你的组织液适合病毒产生，它才会感染你发病。中医治病的理论很简单，不管什么病，不管你病毒怎么变，都是用同一种方法，那就是调整整体的平衡，恢复整体的管理，只要整体的管理恢复了，百病皆消。所谓新冠肺炎也好，其他的疫病也好，都是病毒和人体抵抗力之间的博弈。人体抵抗力赢了，病毒就不能侵害人体。反之，它就侵害人体了”。

b、张伯礼院士谈西医的不同时说：“西医见病毒就要杀，产生了瘟疫之后，先要分离出病毒，然后再去研究对应的药物，来杀死病毒，等药物真的研究出来了，一般瘟疫也就过去了。想想看，非典过去17年了，非典特效药有了吗？凭什么17年干不成的事，现在就能马上干成？而且病毒可能会变异，于是陷入到不断的研究中。事实证明：西医控制不了瘟疫，尤其控制不了新发的瘟疫，因为越来越多的瘟疫病毒有抗药性，而且变化多端，研究新药根本来不及。以没有对应的有效治疗药物，只是盲目地采用激素、抗生素和呼吸机，即使被治愈也留下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

c、张伯礼院士得出的结论是：“屋里有垃圾，垃圾招了好多虫子，有人（西医）不断去研究杀虫剂，虫子杀死了，新一代虫子又来了，对杀虫剂耐受了，于是又去研究新的杀虫剂，这样循环往复.....中医则不杀虫子，它把垃圾清理出去，让屋里干净，屋里就没虫子，虫子垃圾送到外边去，病毒很难适应外边的环境，冻死了”---其实中医药把“垃圾清理出去”，送到外边去，也要“杀死”病毒“虫子”，而不是认为“病毒很难适应外边的环境会冻死”；

这和西医药要求一样。

B、垃圾带病毒清出户外不清零在中国更是犯法

2020年1月2日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被判刑12年。该案的案号为(2015)松刑初字第15号,审判长为杜岩。李宁院士是动物分子遗传育种学专家,发现和克隆了多个影响动物重要生产性状的基因,发展和应用了一批动物分子育种工程技术。他在动物功能基因组、克隆分子机理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好的原创性成果;获得过国家级二等奖3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和省部级二等奖2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成就一等奖等先进个人奖。

但即使如李宁在2008年7月至2012年2月,对相关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利用科研经费购买的实验所需的猪、牛,指使张磊“对课题研究过程中淘汰的实验受体猪、牛和牛奶”,对外出售。所得款项,交给报账员欧某甲、谢某甲账外单独保管,不要上交。欧某甲、谢某甲遂将该款存入个人银行卡中。经司法会计鉴定,截留猪、牛、牛奶销售款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0179201.86元,最终也被法院判刑。

4) 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开辟了科学的新纪元

A、“夺权斗争”与“夺命斗争”认识科学

1917年十月革命的“夺权斗争”,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夺命斗争”,又开辟了科学的新纪元---东西方两个极为成功却似乎互不相容的生物/生理医学理论---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如今希望能用“量子簸场”超弦理论,将两者各自指导今天看待疾病、处方用药的既定的理、法、方、药等,能和谐统一。

真空量子起伏无处不在---这是一种“量子簸场”,就像大河常流着的水面,并不平静---微观、病毒、量子簸场,到“人传人”的新冠肺炎病毒对大量人群的“夺命”感染,是类似“量子簸场”;中医药阐述“天人合一、整体观、辩证论治、理法、方药、治未病等等.....”宏观联系,也涉及类似的“量子簸场”。20世纪80年代盐亭县医院和县科协的科技人员,在大量调研1981年盐亭地区发生的大洪灾后的疫情讨论中,首次提出科学--医学“簸场”概念。

这是受到农村簸箕簸米的启发---当时盐亭农村山区里会簸粮的农妇,一般都会用簸箕使其上下跳动和旋转,让簸箕里的米群成有规则运动的形态,而能扬去簸箕里的糠秕、尘土等杂物。但不会簸的人,米和糠秕是散乱的,团不起来。当然这类簸场振动不仅存在于宏观的物体现象,也存在于人体内外体的微观物质。如把人体周围出现的微轻粒子场,看成象簸箕里上下跳动和旋转着的米群,由此类比一种量子意义上的簸场。到21世纪初完成的《三旋理论初探》一书有关“生命复杂性的统一医学”一

节中,已正式提出了“量子簸场”的阐述。

B、量子簸场是车水马龙,是曲折小径

中医药和西医药的理、法、方、药等和谐统一,是一条车水马龙的道路,也是一条人迹罕至的曲折小径。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夺命”感染,量子簸场可以先用众所周知的“电磁力和电磁波”类比,这里意义还是一种量子簸场,在理解作为生命的“配方”,包括体外的治疗、隔离、封城和人体内的免疫力的抵抗这两个方面---所谓簸场,是泛指存在振动频率的现象。而众所周知的生物钟节律,化学振荡就,也是一种量子簸场。但主要是电磁力这种量子簸场,在地球上促使了生命的发生,也维持了生命的存在和延续。

生物体摄取营养以维持生存,实际是摄入物最终转变成符合生命基础的簸场电磁力;正是这种量子簸场力支持了生物细胞的正常活动。而任何器官因任何原因不能释放出固有的生命簸场电磁波时,都会破坏这种平衡。疾病就是身体任何部位不能或不易接收或发射自身相关簸场电磁波时的一种状态。由此产生了一种中医药和西医药理、法、方、药等和谐统一的医学观,即疾病的症结,就如正常的簸场被破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等,两类也都还是像在簸场中,加减一些指示剂或凝聚剂,以调控引导簸场的运动。而自然疗法也是给簸场一种直接暗示的量子信息力,以调控恢复簸场的正常频谱运动。因此量子簸场不但是一切自然疗法的统一机理,而且也能说明一切疾病的症结。

譬如电磁力作为量子簸场决定生命的兴衰,在疾病过程中,药物治疗实际上是具体的药物分子固有的电磁簸场活动所释放的电磁力,以大能量抑制了异型波或纠正了异型波而达到目的。目前量子化学正是用量子力学的方法研究和解决化学中的量子簸场问题,为化学家、医药家用微观理论来认识化学世界、生命世界提供思维方法、概念和手段,比如原子轨道、分子轨道、重迭、杂化、对称性、电子云分布、能级、全息理论、弦论、圈量子引力理论等名词和观念,已经深入到化学、生物/生理医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与此同时非线性组合、电子相关理论、组态相关理论和大量电子体系统计行为的研究,也有助于量子簸场宏观现象的解释。用量子簸场对生命现象这类奇特的大分子结构、电子转移、药理机制及遗传机制进行考查,已经引起一些全息生物学家的关心和兴趣。当然容易入手的办法,仍是以目前流行的某些不太精确的计算方法或程序为依据来开展工作;但其危险很大。

因为生物分子的结构十分复杂,这样做常常会得到不太可信的诊断。从量子簸场的分析来看,例如炎症可能是机体细胞受干扰后发生了本体电磁簸场辐射的差异,它的能量小,整体本质不易受到根

本干扰,因而当人们寻找到一种能纠正它的电磁场时,便能改正这种差异从而获得治愈。如抗菌素分子运动中释放出或转换的电磁力低能X射线等物质交换手段和信息交换手段,一方面与机体自身的固有电磁场发生谐波共振而强壮生命体;另一方面又对细菌的功能态产生不良影响,从而获得抑菌或灭菌的治疗效果。人体细胞活动所引起的电磁场活动,形成人体固有的量子场,即在人体周围存在一个固有的振荡频谱,机体除了摄入食物、空气和水以转化为支持细胞发射这种力信息的能量外,外围量子场的干扰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这两者的协同作用下,婴儿长为成人并走向衰老,这种存在和变异是严格的,任何异常均会导致生命过程的畸变。而能影响这种量子场变化和存在的不外乎两种手段,一种是用药物、饮食、呼吸、高压氧等具体物质携带的能量,一种是用声波或电磁波等信息交换携带的能量。如中国著名发明家周林研制的冻疮治疗机,正是一种独特的模拟人体量子场固有振荡频谱的发生器。它能与人体产生较好的匹配作用,不仅能激发人体内的基本质点谐振,在病变外产生“内生热效应”和生化反应,而且能消除微循环障碍,调节和平衡植物神经系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组织的修复再生能力。而人体量子场的固有振荡频谱的测定,除利用基里安照相这种高压照相术,直接摄取人体特定部位的云纹图影片,再进行分析外;其次也可以从动物毛皮花纹图案与某种振荡频率对应联系的研究,转而利用人体的皮纹、指纹等纹线云图提供的线索,分析捕捉每个人的固有频率。

5) 科学开辟新纪元与瑟奇美国量子物理学

A、霍根专访瑟奇看美国量子物理学落伍

《科学美国人》杂志刊登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科学写作中心主任约翰·霍根,对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的专访,不是宣传美国量子物理学的先进一面,而是“吹哨”。因为在这次专访中,瑟奇猛烈抨击多元宇宙、弦理论和量子计算机等国际科技主流,呼吁物理学领域需要多元化---瑟奇对除白种人之外的有色人种,从事物理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外,还希望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

其实,约翰·霍根教授作为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科学写作中心主任,与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有同样的“反潮流”情结,也许才去作专访。例如,约翰·霍根问:“我个人一直批评理论物理学家,这是否有失公允?”克里斯·瑟奇的回答中有这样的话:“理论粒子物理绝对是一门死学科,理论物理学的其他领域在应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几十年来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新发展”---可见他不认为霍根批评理论物理学有失公允。

B、简评瑟奇个人“暴露组学”点滴

a、霍根问:你为什么选择物理学专业?瑟奇答:物理学是我小时候经历无神论阶段最完美的宗教信仰。无神论很可能是我在那个年龄段阅读了所有流行的物理学书籍所激发的,比如《时间简史》。这些书总是那么教条,就像我小时候上的天主教主日学校一样。

简评:说霍金的《时间简史》像天主教一样,落伍自持有标杆。

b、霍根问:你选择物理学有遗憾吗?瑟奇答:物理学定律之间完美的环环相扣的联系,向我表明了宇宙是多么完美和非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学习物理,我不再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物理是如此完美和和谐,它必须来自于某些东西。

简评:学习物理定律的完美后,反不再是无神论者,谁之错?

c、霍根问:你怎么看待弦理论和大统一理论?瑟奇答:这是浪费时间。除非它是可以测试的,但很可能永远无法被测试,因此这就不再是科学了。我认为那些研究弦理论的人忘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事科学,或者他们应该被送回中学,重温什么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区别科学与其他探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模式(如宗教、哲学)在于,新理论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如果实验结果不能证实,我们将其丢弃。新理论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如果实验结果不能证实,我们将其丢弃。

d、瑟奇说:“弦理论这不是科学。也许外来文明认为不对称和无序是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强烈反对弦理论家的美学方法。我认为整个弦理论界都应该深吸一口气,想一想他们人生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越来越远离基础物理,这可能意味着我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的资格”

简评综合:《环球科学》2020年第二期“最美科学阅读”介绍《量子空间》一书说:“‘弦论’是一条车水马龙的道路”,真是“人与人不同花有两样红”。19世纪末玻尔兹曼的不是为单个原子结构建模的“原子论”,支持者寥寥无几;反对者们当年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见过一个真实的原子吗?”,但玻尔兹曼即使自杀,最终取胜。

e、瑟奇说:在我看来,人择原理是荒谬的。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它们回答完全不同的问题。科学可以解释事物在宇宙中是如何运作的,也可以预测它们在未来将如何运作,但科学无法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宇宙是现在的样子,是如何形成的。这些是宗教和信仰的领域。而且,很早之前人们就感觉到,超越我们所能感知的宇宙之外的更伟大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这超越了文化和社会,存在于所有宗教和

灵性的形式中。

简评：瑟奇是“图穷匕首见”——真相本意显露：“希望科学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深刻的联系存在于所有宗教和灵性的形式中”。

f、瑟奇说：用人择原理来解释为什么物理定律是这样的，完全站不住脚。人择原理暗示着物理定律不同的其他宇宙的存在。但是这些其他宇宙的存在无法得到验证。你如何测试其他宇宙的存在？宇宙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一切。因此，另一个宇宙将与我们的宇宙分离，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之互动。如果我们能探测到其他宇宙，那就意味着我们能观测到它，但这就产生了矛盾。

g、瑟奇说：多元宇宙的存在和人择原理，都是用科学术语包装起来的宗教观点。比起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它们没有更多的合法性。

简评综合：多元宇宙和人择原理有争论，也有被误解、误用，但并不是包装起来的宗教观点。惠勒是量子力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提出过“参与性人择原理”。不应该想也不想就直接否定参与性人择原理和其他颠覆版弱人择原理的合理性。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还提出有“宇宙自然选择”学说，简单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所处的宇宙中有黑洞存在：宇宙通过黑洞完成自我复制。

h、霍根问：史蒂文斯学院的萨比娜·霍森菲尔德在她《迷失数学》一书中称，对数学“美”的痴迷“把物理学引入歧途”，你怎么看？瑟奇答：我非常怀疑任何基于美的物理“定律”。也许外来文明认为不对称和无序是美的，他们会强烈反对弦理论家的美学方法。

j、霍根问：如果由税收或学生学费支持，物理学研究是否具有一定的实践潜力？瑟奇答：如今，不仅仅是美国，全球都面临着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怀疑，弦理论家是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即使物理学界的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简评综合：在文前的“导读”中说他猛烈抨击弦理论一点不假。

k、霍根问：你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什么样的？瑟奇答：我的乌托邦是一个比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公平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成功机会，不论财富、性别或种族。从我们在这个国家实行的无情的赢家通吃的资本主义，跟不上经济变化的、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学教育的可怕成本。这些因素都忽略了我们社会和经济体系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给像我这样的白人男子，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优势和特权。

简评：从霍根的话中——“从我们在这个国家实行的无情的赢家通吃的资本主义，跟不上经济变化的、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明白他也许算个“左派”，而知“反相反量”中美国也有“左派”。

五、从分区分级抗击新冠肺炎看科学的复杂性

1) 新冠肺炎医药仪器使用的复杂性与区域性

A、张爱春医生质疑核酸检测不可靠性后传

发生在武汉的新冠疫情,已成全球蔓延新冠疫情的“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疫情的关注度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治疗经验依赖性都有增加。但诊断一个疾病,从来都是需要医生综合分析,特别是对于广大基层医院,单纯依靠影像学或病原学证据发现新冠病毒肺炎,十分困难。

“科学网”、上海“观察者”网、《长江日报》等媒体,都曾在2020年2月19日前后报道过武昌医院张爱春主任医生,反映的核酸检测“假阴性”问题,她是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不完全可靠性。但事情过去快一个月,科学在新冠肺炎治疗医药、仪器使用的复杂性与分区分级上,已感觉出来。以武汉为例,因为前期患者较多,单凭核酸检测容易漏诊,CT筛查就更具优势,可尽早发现患者、尽早隔离。而在湖北以外的地区,如青海、甘肃、宁夏等患者较少的地区,门诊常规进行胸部CT检查是否妥当,需要商榷和进一步研究。

因为别的医院有医生认为,核酸检测敏感性低,但没有辐射,特异性好,若能普及,可能更为妥当。张笑春主任医生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改变说法:“直言并非否定核酸检测结果,而是认为其作为检测最终手段,在当初受到产量、采样方式的限制,在武汉无法达到切断传染源的防控效果”。有专家进一步表示认为:张笑春主任医生“这个建议只适合灾区,不适合普通、散发病例筛查。普通的散病筛查要做到鉴别诊断,而CT不能做到鉴别诊断”。

B、CT能否代替核酸检测诊断新型肺炎

a、目前,2019nCoV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质量参差不齐,检测结果可能出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情况。此外,目前等待核酸检测人数大大超过检测能力,仓促上阵得出的检测结果可靠性不高。而相比核酸检查的种种受限,CT检查具有及时、准确、快捷、阳性率高、肺部病变范围与临床症状密切相关等优势。但CT能否代替核酸检测诊断新型肺炎?

《中国科学报》采访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主任沈瀚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顾兵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检验师里进教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韩东升教授、南京诺唯赞创始人唐波教授等,他们表示目前试剂盒质量的确参差不齐,但不能绝对将核酸检测“一棒子打死”;特别是CT不能区分哪种病毒感染。

顾兵教授说:CT可以作为新冠病毒肺炎的诊断主要依据,但是不能忽视核酸检测作用。因为CT是不能区分患者到底是哪种病毒感染,而核酸检测则批量地可以甄别出到底是哪种病毒感染的,病原

学证据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影像学与实验室检查并重，才更有利于诊断，更利疫情的防控。里进教授也说：两种诊断方式，都有各自的价值，相辅相成，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

b、胸部 CT 的病毒性肺炎检出率高的理由，是目前湖北地区放射影像科的片子有 90%~95%为胸部 CT，胸部 CT 片子中 50%~60%左右显示为病毒性肺炎特征。顾兵教授说：仅仅这个数据就得出“CT 可以代替核酸检测”的结论是不成立的，这个数据并未见到严谨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与研究支撑，可能只是影像科人员经验统计而已。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疫情已遍布全国，湖北省之外地区，所有病人的 CT 检测还是 50%—60%为病毒性肺炎吗？这个结论还成立么？在临床中，也有很多其他病毒或细菌感染导致“大白肺”的。

c、在一线检验标本过程中，试剂盒的质量到底怎么样？里进教授说：目前由于疫情紧张，很多厂家的试剂一研发出来就投入市场，没有做足够的性能验证实验，的确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没有一个行业标准去评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的质量，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比对不同试剂盒，才能找到自己相对满意的一款，尽量地避免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那么实验室对什么样的试剂盒才相对满意呢？里进教授说：检测时间短、阳性检出率较高、假阴性低的产品就相对满意，因为这样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对患者进行诊断，为后续的治疗和隔离提供有力依据。

d、那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筛选出相对满意的试剂盒呢？唐波教授说：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判断一个试剂盒质量是否可靠，首先要看生产企业的技术传承和能力，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其次，针对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试剂盒来说，病毒检测包括病毒的采样、提取（或裂解）、逆转录、扩增等过程。从该过程来看，试剂盒对各个步骤是否有质量控制的方案？能不能起到质量控制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新冠病毒是 RNA 病毒，由于 RNA 的制备困难，很多公司的阳性参考品就用构建的质粒 DNA 或者 PCR 扩增产物来替代，但是 DNA 不参与提取和逆转录的过程控制，所以不能起到严格意义上的阳性对照。目前已见报道有公司申报注册的试剂中，阳性对照品为包含 Orflab 基因、N 基因、内标基因扩增序列的假病毒，可以模拟样本中病毒核酸的原始状态，能够准确监控提取、逆转录、荧光定量检测全流程。里进教授说：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用金标准（测序技术）作为比对实验，将同一批样本用不同试剂盒检测，检测结果与基因测序结果进行比较。可能 1-2 周的时间，就能筛选出相对满意的试剂盒。

e、沈瀚教授说：建议实验室刚开始进行检测时，采用双试剂同步检测、相互验证方案，这样更有把

握，同时也便于积累检测经验。韩东升教授说：医疗机构还可以利用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人的回顾性核酸标本及非新冠人群（如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正常人等）的呼吸道标本，同时使用拟采用的多种试剂盒检测，也能评价出各试剂盒的优劣。顾兵教授说：建议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验证计划，将会有助于比较不同厂家的试剂，选择高质量的产品。对核酸检测结果的假阳性/假阴性是不是不能全归为试剂盒的质量？里进教授说：是——核酸检测的假阳性/假阴性除了与试剂盒质量有关，还与标本及时正确采集息息相关。如果标本采集错误、标本存放时间过长（病毒核酸降解）等都会造成假阴性。另外，有研究显示少数患者的感染部位仅限下呼吸道，而不在鼻咽部，所以咽拭子反复检测都是阴性，而 CT 显示症状不断加重的情况是存在的。对于这种特殊患者，建议取下呼吸道的肺泡灌洗液用来做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韩东升教授说：阳性率低并不一定出现在试剂盒质量问题上，标本质量问题（如采样时机、采样部位、采样量、储存及运输介质等）、人员操作（如核酸提取、加样量、体系配制等）也是影响检测质量的重要原因。要做好检测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每一步都是关键。

f、对如何保证同一实验室对不同标本的核酸检测在“同一标尺”上？顾兵教授说：就是室内质控。室内质控需要由检验人员完成，建议所有公司的产品必须配备检测相关的质控品，以利于实验室监控新冠病毒的检测质量。韩东升教授说：室内质控分为阳性质控和阴性质控。目前，定点检测医院可以利用阳性病人标本灭活后，或者利用提取的核酸标本制备批量的内部质控品，有的实验室已经有制备了。而阴性质控可以使用试剂空白和非新冠病毒感染病人的样本等。唐波教授说：质控品是试剂盒质量控制的关键，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各个环节在核酸检测中都能起到质控的作用，对于新冠病毒来说，质粒 DNA 或 PCR 扩增产物的质控效果，只能在 PCR 扩增阶段起作用，所以假病毒颗粒的作用非常重要。

g、那怎么去保证同一患者在不同实验室检测结果相同？里进教授说：我们临床每天都要检测几百个样本，需要完善的工作还有很多，例如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室间质评工作，这个目前还没有开展，但这个非常重要。顾兵教授说：室间质评是临床检验中心的工作，呼吁临床检验中心积极推进本项工作。韩东升教授说：做室间质评需要第三方组织开展，目前还没有进行，但应该尽快组织起来。对如何才能更好地诊断新冠病毒肺炎？顾兵教授说：实验室进行核酸检验检测的结果，要主动与临床医生沟通，临床医生会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核酸检测等结果进行判断。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

结果, 要寻找原因, 并不断改进。沈瀚教授说: 需要加强与临床沟通, 实验室结果要结合病史(是否到过武汉、是否接触过武汉发热患者等)、影响学表现, 综合分析。里进教授说: 现在我们发出的任何一个诊断报告都会备注, 阴性结果请结合临床症状以及影像学结果综合判断。

C、CT 影像和核酸检测 究竟哪个更靠谱?

以上教授说的是正话, 也是“废话”——大家都说自己的工作没有“失察”——“实验室进行核酸检测的结果要主动与临床医生沟通, 或反之”——隔行如隔山, 干实验室的与临床医生不在一起, 不是写论文, 不是领导指示, 沟通谈何容易?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正在出现积极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患者确诊速度的加快。在核酸检测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 常规的医学诊断技术通过早期筛查, 可以发现大量疑似患者, 比如对患者肺部的 CT 扫描。诊断结果表明, 很大一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肺部 CT 图像显示出明显的磨玻璃样阴影, 严重的患者则发展为白肺。因此, 肺部 CT 的应用对于尽早发现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但针对新冠肺炎患者鉴别诊断多次出现的假阴性问题,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教授表示, 任何病毒的检测手段不是 100% 准确, 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也不例外, 假阴性再所难免。检出率结果受患者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 实验室的检测条件, 取样的方式方法等影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核酸检测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检测结果阳性, 诊断为新冠肺炎。诊断结果阴性, 现行诊疗方案也要求需要在定点医院进行治疗和隔离。《科技日报》记者张佳星报道, 核酸检测假阴性的出现, 也让针对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作出微调。

疫情发生后, 国家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不断更新。在发布试行第五版的诊疗方案在病例诊断上, 已将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进行了区别对待。湖北以外其他省份仍然分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两类。但是湖北省增加“临床诊断”分类。“疑似病例”标准修改为: 无论有没有流行病学史, 只要符合“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及“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 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这 2 条临床表现, 便可考虑为疑似病例。这相当于疑似病例标准放宽。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为临床诊断病例。

核酸检测假阴性导致的漏诊问题引起专家的重视,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徐顺清教授说: “新冠病毒侵害的部位主要是肺部, 所以用核酸检测存在一定的假阴性, 也就是有一部分病人没有检测出来, 就是漏诊, 这样可能造成一些传染源没有真正的被识别出来, 有扩大的风险”。徐顺清教授认为, 这个问题发现以后, 试行第五版的诊

疗方案把 CT 检测等临床症状作为依据, 现在病情的判断不仅仅是核酸检测阳性的出现, 还有临床的标准, 连续三天没有发热, CT 影像学有改善等三个方面, 要结合起来。

D、改进 CT 影像有辐射的 AI 快筛查

2020 年 3 月 13 日《中国科学报》报道, 现在 AI 筛查肺部 CT 又快又准——这是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程明明教授团队, 联合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新冠肺炎 CT 影像 AI 筛查系统, 已在包括湖北在内的全国 40 家医院应用部署, 辅助医生开展新冠肺炎快速诊断、程度评估、病程动态监测等工作。该系统已持续运行 50 余天, 累计检测筛查 8.1 万个病例, 协助医生确诊新冠肺炎 6000 余例, 系统敏感度(正确确诊率)达 98.3%, 特异度(正确排除率)为 81.7%。

早在 1 月中旬, 南开大学与北京推想科技的联合项目团队, 第一时间将此前积累的基于肺炎、肺结核 CT 影像智能识别技术, 部署应用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医院, 辅助医生快速诊断新冠肺炎, 并在运行过程中, 持续收集新发数据, 不断优化新冠肺炎智能识别与定位性能。

该系统主要具有两大功能: 新冠肺炎的快速筛查及预警提示、数字化精准辅助诊断与病程监控。程明明教授说: 该系统处理一个病人的几十张高清晰度 CT 数据, 仅需数十秒; 若简单增加服务器数量, 还可以将速度提升至数秒以内。这就为大量病例数据的快速筛查提供了支撑。在发现疑似病例后, 该系统会自动对可疑区域进行分割, 并统计各个肺部解剖结构中肺炎区域占比的定量数据, 为医生进一步诊断提供重要参考。此外, 除了对当前日期的肺炎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预测以外, 该系统也可以自动检测病人几天前 CT 影像中的疑似肺炎区域。这种自动关联的能力, 为动态、精确、量化的监控病程, 提供了支撑。“这些智能服务, 一方面可大幅降低临床医师及影像医师的工作负荷; 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大量数据学习和减少疲劳诊断, 提升医生判断的准确率, 也为医生提供筛查和动态病程监测的功能”。

程明明教授还说, CT 影像 AI 筛查技术的临床应用, 还能有效缓解检测资源相对稀缺、医师经验不足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诊断压力, 有效帮助医生进行患者病程转归前后对比, 更加准确和快速地完成患者的日常诊断评估。系统投入应用后, 后续团队还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检测性能, 提升定位精度, 更好地协助医生做出快速、准确的诊断。

E、使用人工肺延长新冠重症者抢救时间

“叶克膜”、“人工肺”(ECMO), 是一种医疗急救技术设备。ECMO 就是一台体外的“心肺”,

简单原理是把病人的血在体外加上氧，排出二氧化碳，经气体交换装置氧合后再用驱动泵将血灌回体内，从而使心脏及肺脏得到充分休息，对于肺功能的支持可以有效改善低氧血症，避免了长期高氧吸入所致的氧中毒以及机械通气所致的气道损伤；对于心功能可以增加和维持心排量，改善全身循环灌注，保证了循环稳定，从而为心肺功能的恢复赢得时间。有报道说用 ECMO 成功救治重型新冠病毒肺炎，但这并不意味着 ECMO 是治愈病毒性肺炎的终极武器。为啥？因为所有这些最前沿、最高端的救命设备，治疗的目的是为了跑赢病毒的复制，让人体免疫系统重新获得优势。即先把命保住，给自己修复赢得时间，创造条件。这个时候不仅需要有力的医疗，更到了拼人体免疫力的时候。

“第一财经”网记者报道，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首例用 ECMO 救治重症肺炎患者成功以来，目前已有 6 家医院使用 ECMO 技术将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实际上 ECMO 真正被大众普遍熟知，却是因为其最终没能挽回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生命。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影响它作为目前针对严重心肺功能衰竭最核心的支持手段，被视为是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终极武器”。九泰药械总经理助理林海鹰说：在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抢救中，体外膜肺氧合（ECMO）承担着最后的“救命稻草”的角色。在人没有生命体征后，连接上 ECMO 设备，有望延长抢救时间。在包括急性心肌梗塞等严重心源性休克、严重急性呼吸衰竭、重度感染性休克等抢救场景中，ECMO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F、快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纸办法

《中国科学报》报道，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教授说：“我们既有核酸检测方法，也有抗体检测方法。我们研制成功了可用于快速检测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试纸，检测敏感度可达 10 个拷贝，其中在试纸上的反应时间只需三分钟，而且可肉眼观测到结果，不必使用专门的仪器设备，大大简化了操作程序和操作难度，缩短了检测时间。这个试纸理论上是谁都可以操作，但在临床上，对于检测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来说，谁都能操作是不可行的。我们建议在医生或专业人员指导下操作。在需要筛查大量人群时，这个试剂优势非常明显，为由于仪器设备的限制、技术技能的限制影响检测的情况，提供了另外一种选项和技术支撑”。可见我国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除了核酸检测，也有不少在做抗原检测试剂和抗体检测方法。

G、新冠肺炎病人用上插管治疗与零漏诊方法

a、浙大一院感染病科主任盛吉芳教授介绍的这个病例是，一位 60 多岁的重症女患者，从外地转院到杭州。来的路上情况已经很差，氧饱和度大幅下

降，出现呼吸衰竭。盛吉芳教授说：“我在远程会诊时，就建议，这位患者需要插管，才能转运，不然这一路上，她肯定顶不牢，会有危险”。会诊是下午 3 点多进行的，晚上 10 点，患者抵达浙大一院之江院区。“我们这里通过气道管理，呼吸机支持，然后抗病毒控制炎症，减少肺里的渗出，营养支持，这样一系列支持转危为安一周后，就脱机、拔管，锻炼，从 ICU 转至普通病房，又待了几天后，完全达到出院标准。”盛吉芳教授解释说：“这个诊疗经验，它的产生是基于日常对新冠肺炎的治疗经验，同时借鉴了非典、H7N9 的经验，是对既往经验的传承，同时提炼了新经验，再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出来的，它是我们现在治疗新冠肺炎病人的一个初步经验，随着对疾病认识的加深，这个方法会不断更改”。它治愈新冠肺炎患者经验的标准是：体温正常 3 天以上，肺部病灶完全吸收，不吸氧的情况下，氧饱和度 95% 以上，核酸检测连续两次及以上阴性。

b、对假阴性的被“揪”出，与诊疗经验中核酸阳性是新冠肺炎确诊的金标准的矛盾，盛吉芳教授还说：“曾有一位女患者，5 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但她有明确的武汉流行病学史，我们又觉得她不是普通的炎症，和常规肺炎不一样，和新冠肺炎很像，所以决定不能放过”。最终这位女患者被确诊，治愈后出院。盛吉芳教授做的解释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检测采样有关，痰标本的阳性率最高，鼻拭子次之，咽拭子最低。我们会根据流行病学史、影像学等，反过来采样”。迄今为止，已有三四位这样的病人，被浙大一院“揪”出。浙大一院书记梁廷波教授说：“核酸检测加肺部影像学是我们目前零漏诊的一个杀手锏。对类似以上的病人，我们会隔离治疗，进一步明确，这样可以保护更多的人。一旦漏诊，危害会很大。所以，我们每位专家的神经每天都是紧绷的”。

H、打赢疫情防控之战外的技术应用

a、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将科技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一张电子“健康码”迅速流行起来——通过支付宝、微信等 APP 获取的小小“健康码”，解决了跨区域流动需多次填报个人信息的麻烦。“‘凭码出行’是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的有力措施”——捷顺科技负责人说，用好“健康码”，全方面掌握了员工健康情况，还可以当作员工复工出入证明使用。

b、2020 年 3 月 12 日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透露：新冠病毒在患者体内引发的剧烈炎症反应，干细胞可以有效降低，减少肺损伤，改善肺功能，对肺部进行保护和修复。干细胞治疗安全有效，能够使重症、危重症患者呼吸困难迅速得到缓解，或者停止加重；在临床表现，呼吸功能，影像检查等方

面均实现好转。我国在前期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应急科研攻关项目支持的王福生院士团队等入驻武汉，对危重型患者的临床研究与救治，已经治疗了64位危重病患者。

2) 新冠肺炎复杂性与区域性的医药仪器研制测试

A、试验创“黑加白”筛选“老药新用”模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说，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试验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项，有的药物表现出令人鼓舞的临床效果。针对疫苗研发，从企业到科研院所，再到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科研人员全面开启研发的“黑加白”攻关模式——这使“老药新用”的药物研发团队，捕捉到提高治愈率的亮光。差不多同时，国家科技应急攻关项目——科研攻关组汇聚全国科技力量，层层筛选，从几万个药物到几千，到几百、几十，再到几个……磷酸氯喹等部分具有潜在抗新冠病毒作用的药物被筛选出。其次，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也在武汉启动。临床数据显示清肺排毒汤，对治疗新冠肺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因此科技攻关的一批药物和救治技术，已在疾病救治当中扩大应用——磷酸氯喹、托珠单抗，中医药当中的有关方剂和注射液等一批推荐的药物以及康复者血浆、血液净化治疗等一些治疗方法，也纳入到诊疗方案；并在推动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先进技术，用于危重症患者治疗研究。

通过临床实践制定分型分层的治疗策略，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其中就包括阻断轻型、普通型向重症转化的治疗方案，也包括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方案。但这些医药和救治技术的效果，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效，最终的测试完成其实是很复杂漫长的。

B、新冠病毒还有被感染的男女差别

最近有报道，女性的无症状发病和长期潜伏期无疑将对新冠病毒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被感染的女性会因无症状而与他人接触，哪怕是在主动或被动隔离结束后，她们仍可能“逃过”诊断，并造成之后的病毒传播。最近报道的一例潜伏期长、传播率高的特殊病例，也是女性。综上所述有医生认为，最终感染新冠肺炎的男女人数应是差不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潜伏期长的女性患者被诊断出来，并且所以女性患者比例逐渐增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研究表明，被感染的男性病症要比女性严重得多，这些现象可能归因于女性天生具有较强的抗病毒免疫力。根据此研究的结果，研究团队呼吁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尽快对女性采取差异化的防控措施。例如，在筛查过程中，应该对接触史明确的女性直接进行核酸检测，无论是否有症状，受医学观察的女性隔离期也应超过14天。

C、疫苗能否消灭新冠病毒的复杂性

疫苗成功问世是否能像消灭天花一样消灭新冠病毒？从传染病传播的三个要素的角度来分析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回答是仅靠疫苗还不够，还需要提高自身免疫力。因为传染源：目前有论文证明，新冠病毒最初来源于蝙蝠体内，经过某种尚且未知的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随着在人群中的传播，感染了病毒的患者成了新的传染源，也需要及时接受隔离治疗，避免传染给更多的人。从控制传染源这个角度来说，疫苗的作用是不大的，我们无法给野生动物注射疫苗，也没法限制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最好的方法是从我们自己做起，不买、食用野味、减少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减少被病毒感染的机会。再看传播途径：目前分析新冠病毒可能经飞沫传播、密切接触传播、触摸污染物体表面后触摸嘴巴、鼻子或眼睛传播。从此方面来看，养成良好的习惯，做好个人防护至关重要，戴口罩、戴手套、勤通风、勤消毒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自己，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现实生活中很多传染病的控制，都是通过为易感人群接种相应疫苗来实现的，那么如果未来新冠病毒疫苗上市了，是否就可以彻底消灭该病毒了呢？有人认为，想法是可行的，但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一方面，相比于天花病毒这一类基因组稳定的DNA病毒而言，新冠病毒由于是RNA病毒，更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这很有可能会让病毒本身的性质发生改变，也造成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即使成功消灭了人群间的新冠病毒，请不要忘记病毒依然附着于其天然宿主——蝙蝠身上。如果人类自己还不能吸取教训，不改变食用野味的恶习，或者不加保护地向野生动物栖居地开拓疆土，类似的潘多拉魔盒还会被打开。总之疫苗的研发，需要时间以及科学家们的努力，不同种类的疫苗也因其原理、效果、安全性、制备工艺等方面的不同而各有利弊。

D、为啥治新冠病毒药临床试验患者招募难

据报道，2020年2月5日瑞德西韦在武汉启动临床试验，不过很快就有临床试验患者招募难的消息传出。3周后吉利德公司宣布启动全球瑞德西韦临床试验。3月12日河南科技大学李宾教授在解读全球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方案细节时表示，全球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做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设计或可降低试验难度，避免患者招募难。

如入组方案不设盲；因受试者可能中途退出。中国瑞德西韦临床试验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方法，而全球试验采用随机开放对照研究方法，即试验不设盲。李宾教授说：如今瑞德西韦在民间已经有了“人民的希望”“特效药”之类的传言，因此临床研究中双盲虽然可以保证随机，但是也会降低患者参与临床试验的意愿。李宾表示，病毒感染通常是自限性疾病，一般需要有安慰剂组来对照的，但是

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之下，如果使用安慰剂，操作中会出现非常大的困难。用标准治疗药物替代安慰剂，会使试验结果更稳健，也能降低入组难度。

李宾教授还说：中国瑞德西韦临床试验针对轻症患者的评价指标是看“恢复时间”，而全球临床试验是看“从首次给药或试验开始的那天到第14天出院病人的比例”。“在计算过程中，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恢复时间的计算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病人始终没有恢复，由轻症发展成重症，甚至最后死亡了，那恢复时间就成了无穷大，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不好处理了”。李宾教授认为，统计出院病人的占比，要比统计恢复时间更为合理、直观地对药效做出评价，可以降低试验结果的统计难度。

E、新冠疫苗招募受试者难和安全是关键

a、上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姜世勃教授说：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和标准来研发疫苗和药物，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关键。

我国新冠疫苗研发进展，目前总体上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对于国外招募受试者的难现象，我国借助优势，已有（疫苗）研发进展比较快的单位，向国家药监局滚动递交临床试验申请材料，并且已经开展临床试验方案论证、招募志愿者等相关工作；待国家药监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批后，开始临床试验---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科研团队已开始招募受试者，临床试验不会慢于国外。为了解决药物、疗法项目招募受试者难的问题，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在许多国家，组织名为“团结试验项目”的研究，对一些未经测试的疗法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可靠数据，以显示哪些疗法最为有效，目前阿根廷、巴林、加拿大、法国、伊朗、挪威、南非、西班牙、瑞士、泰国等国加入其中。

b、警惕潜在有害反应，在申报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之前，研究人员应该使用不同的病毒毒株，在不同的新冠肺炎动物模型，检测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很多疫苗只是对与疫苗研究相同的病毒株有效，而突变株或其他冠状病毒就没效甚至有害。例如，有些在小鼠模型上没有发现的有害免疫反应而在雪貂和猴子模型上出现了。一个作为疫苗的病毒蛋白可能含有能引发高效免疫反应的片段，而另一些片段可能诱发有害的免疫反应。姜世勃教授说：“这些研究需要时间，在开展人体试验之前必须完成”。新冠肺炎致死率低，但传播率很高。这使得很难跟踪其传播源。所以，在流行地区的大多数人将需要接种疫苗。相比之下，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非常高，但传染性较低。所以只是对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才有针对性地接种疫苗。

因此，各国政府迫切希望获得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姜世勃强调，几十年前，针对另一种冠状病

毒---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开发的疫苗，增加了猫患这种病毒引起的疾病风险。在对其他病毒的动物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此姜世勃教授认为，监管机构必须继续要求疫苗研发人员在动物研究中检查潜在的有害反应。他们还必须仔细评估健康的志愿者，是否有抵抗其他冠状病毒的抗体，这些抗体有可能导致在研疫苗引起有害免疫反应。资助者不要盲目投资，而应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那些比较靠谱的安全有效疫苗的研发。

c、姜世勃教授说：人体试验要“三思而行”。美国诺伍德的生物技术公司向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运送了一种基于 mRNA 的实验性疫苗，用于临床试验---基于 mRNA 的疫苗的研发平台研发的其他疫苗证明对人是安全的，但不能保证使用该平台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一定是安全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认为，推迟疫苗研发的风险，远远高于健康志愿者患病的风险。但姜世勃教授担心的是，如果降低标准，会有更多的疫苗项目会匆忙开展。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列表中，列举了超过 100 种新冠肺炎疗法。对此他指出，其中大多数涉及一种已被批准用于治疗另一种疾病的药物，而不是专门针对人类冠状病毒的，绝大部分应该还没有在新冠肺炎动物模型中进行测试，尽管中国监管机构通常会要求这样做---“虽然这些‘老药’为治疗其适应症做过临床试验，但在它们进入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之前，需要评估该药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潜在的协同毒性。同时还应考虑另一个因素---新发与再现的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可能造成未来暴发，而新冠肺炎病毒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异。如新加坡专家发现已有新冠病毒在 OFR8 区域发生 382 碱基缺失突变，这让现在研发成功的疫苗和药物可能很快面临失效。因此，研究人员和监管机构都应该权衡现在研发的疫苗和药物，可否适用于新发与再现的冠状病毒感染”。

六、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看科学的现在与未来

1) 中西医类比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的分工遗憾

A、李文亮医生之死西医治疗、抢救无责任

2020年3月19日央视新闻播发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的《关于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其中详细公布了李文亮医生的发病、治疗、抢救等情况：“组织抢救的医生说，李文亮医生是我们的同事，又很年轻，我们不希望他走，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愿放弃，当时没有想其他任何因素，就是想救活他，所以抢救了很长时间。据为李文亮医生会诊的院外专家讲，从李文亮医生病案看，医院治疗比较规范，能够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和措施。医院建议采取和实际采取的重要医疗措施，均征求了李文亮医生或其家属意见”。

B、李文亮医生没有中药介入所以死亡了的说

法

2020年2月24日晚央视《新闻1+1》栏目，白岩松连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在讲述到李文亮的同事获救事迹的视频中，张伯礼院士说：“三名患者是李文亮医生的同事，患者病情都比较重。之前他们医院的领导都觉得没多大希望，只是尽量抢救。北京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诊三名患者，与我们共同研究配方。患者喝了中药汤剂以后，情况好转。到现在已经用药将近十天，病人的状况大为好转。其中两个已经能完全复原了，从死亡边缘拽回来了。而李文亮医生一直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没有中药介入，所以死亡了。中医抗疫是在抗击历史上500多次的瘟疫（有确切记载的300多次瘟疫）中成长起来的，它是能救命的”。

C、李文亮医生治疗中死了中医有责任吗？

中西医结合如何结合？2020年2月18日在召开的广东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谈到：“我个人很重视中药在实验室对新冠病毒的作用情况，正在关注中药是不是能杀病毒，能不能阻止病毒进入细胞，以及减少炎症风暴”——一旦实验室有一些证据的话，他认为这些中药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特别是一些早中期的病人。

张伯礼院士的回答是：“钟院士可别再听不见了——中西医争论有的是糊涂，也有是因为利益”。对目前新冠肺炎的疫苗、特效药还没有出来，张伯礼院士说：“没有药物的疫病，首关注的是人命，让更少得人死亡，让更多的人获得拯救，就是要发扬中医和西医各自优势，优势互补，这是最终目的”。他也说过：“对新冠肺炎轻症的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把它拿下来。对于重症，还是以西医为主，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生命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支持才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而中医在这时候是配合的；虽然是配角，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可或缺……像生脉饮、参脉注射液、独参汤，一两天后血氧饱和度波动了，再过两三天基本达标，这类例子许多。还有像细胞因子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用血必净也能强力地阻拦、延缓病情的发展，重症以西医为主，但中医也是可以力挽狂澜的。凸短长，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强项。西医有西医的科学性，中医有中医的科学性。如果以科学作为帽子，挑剔对方的问题，难以分出个胜负”。

有评论说：“希望有更多中医在新冠肺炎中的积极作用能被报道出来，让国人对中医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偏见——中医只能‘治未病’，中医是‘慢郎中’到正见——中医不慢，它能救命，它能大大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那么这次围绕抗疫的中西医结合，按照诊疗方案(试六版)，就是治患病的‘人’

与治病人的‘病’结合”。

D、从盐亭县中医院到绵阳市中医眼科医院传奇

a、以上评论说得很“轻巧”——“中医不慢，它能救命”。但说李文亮医生治疗中死了中医有责任，张伯礼院士说得很清楚：“发扬中医和西医各自优势，对新冠轻症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拿下。但是到了重症，还是以西医为主，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支持才挽救病人的生命；虽说支持，但是不可或缺”。这里张伯礼院士说的是目前中西医结合的现实情况——中医还有掌握“呼吸支持、循环支持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等医疗方法。说穿了这不是“中医和西医各自优势”的责任，是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中医药院校和从业者，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不是以科学帽子挑剔。因为如果中医力挽狂澜，是可以像西医抢救规范实际一样，能够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和使用插管、呼吸支持、循环支持、开刀等医疗措施。

b、但如果中医不行，中医从业者和中医药院校是有责任的——因为曾经的绵阳市中医眼科医院，就能像西医一样进行开刀等手术治疗。当时的中医眼科医院院长马诚伟主任医师，还是艰难攀登自学成才，达到中医进行开刀等手术医疗与西医平行效果一样的水平。

我们认识马诚伟院长，是1983年9月20日参加内蒙古集宁市召开的“首届全国生物全息律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工作单位盐亭县科协。由于这是盐亭县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参加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消息传到盐亭县医院，马诚伟医生就特地来拜访。我们才知道他传奇的人生——1962年他在盐亭中学高中毕业，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没有升入大学，只得回家务农。农闲找到现重庆九龙坡区第一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杨岸森教授的父亲杨思明——盐亭黄甸镇农村农民教中医内科；杨思明也是自学成才。后马诚伟又到成都自费拜师学手术，到1974年他当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时，附近农村也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家庭病床达到10来张。1981年国家出台有政策，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者可正式纳入国家全民编制。老绵阳专区19个县各县初选考出的200多赤脚医生、集体所有制医生，再到专区集中统一考试。盐亭县只有两人及格被录取，第一名就是马诚伟。录取后他被收到盐亭县医院眼科门诊，当正式中医眼科医生。1990年又被有关省市医务领导看重，挑选调到绵阳市中医院创办中医眼科医院。不管是中医、西医，都要靠个人的实力。马诚伟医生擅长眼科疑难病诊治及手术，从事眼科专业50载，亲自主刀白内障、青光眼、泪囊炎等眼科手术五万余例。

中国人，大多偏向文科，喜欢诗、词、书法、演唱。如果我们对马诚伟医生的自学，没有切身感受的话，与他一起被1981年绵阳专区集中统一考试

录取的盐亭两名中，那第二名叫文国刚的医生，是我们初中的同班同学，还是同乡。1961年初中毕业后我们都没能升高中。他就到天垣乡卫生院跟老中医陈壁光医生学中医，我们到天垣乡小代课。1962年我们考上高中，到1965年考上大学直到1968年“文革”中回家，他来找我们借高中第三册的有机化学书，之前我们很少见面交流。这次才知道他坚持自学。他和马诚伟医生一同被录取，我们知道后也不觉得偶然。文国刚是集体所有制医生，录取后调到玉龙区医院当医生，以后又当区医院的院长。不久又调到盐亭县中医院当院长，成为副主任医生。但文国刚与马诚伟不同，比较传统---只搞中医内科。退休后到70多岁，还被绵阳市游仙区中医院请去坐诊。

c、全球抗击蔓延的新冠疫情开辟了科学新纪元，中医药被提升到了“暴露组学”与西医药类似“基因组学”同等评级的高度。其实“暴露组学”中是包含有“基因组学”内容的；我们说中医的“宏大”，挑选内容没有说到中医的“外科”，被误认为似乎中医传统上，中国人就没有“完整初心”的理想---“对新冠轻症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拿下。但是到了重症，还是以西医为主”；“三名患者是李文亮医生的同事，患者病情都比较重。之前他们医院的领导都觉得没多大希望，只是尽量抢救。北京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诊三名患者，共同研究配方。患者喝了中药汤剂以后，情况好转。其中两个已经能完全复原了，从死亡边缘拽回来了。而李文亮医生一直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没有中药介入，所以死亡了”。

但西医有李兰娟院士团队说：2020年2月2日李兰娟团队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负责并指导ICU重症患者救治。有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外科医生，出现了“细胞因子风暴”现象，运用“人工肝”治疗后，他的细胞因子很快降下来，呼吸困难也得到改善，经过3次干细胞治疗，同时给予肠道微生态调节剂治疗，在住院治疗14天后，患者检测病毒核酸转阴性，肺部病灶明显吸收，住院治疗24天后好转出院。目前中医名家心情矛盾---“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强项”，只是一种“现实”、“现状”，并不是科学新纪元未来的“现实”、“现状”---未来“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也会是统一的。

其实中医药从来没有“完整初心”的理想，说法是错的---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三国时期名医华佗的传说---华佗精通内、外、妇、儿科，被后世尊为中医外科鼻祖。即使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曹操头痛病久治不愈，华佗诊治后发现曹操的头部有类似于现在肿瘤的东西，需要开颅治疗”等故事不真---来自《三国志》里的“华佗治病”，只是

一个典故，寓意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一味凭老经验办事，当然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华佗自小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是个中性说法吗？

不信华佗也有人说：“如果三国时代我国医术这么发达，那我们现在的医术应该是领先全球啊；那他的医疗设备也应该是非常先进才行，当时的技术，能制造那么先进的治疗设备吗？其次他如何学会的开颅术？他无师自通、自学成才，那他肯定经历了无数实践才能这么厉害。也就是说，在他开颅术成功之前，必须经历很多次失败，很多人死在了他的手里，才能成功。另外，那个年代的病人真的那么大胆，在那种整体的医疗水平下，社会能接受被开颅吗？现在的医术，开颅也需要一个团队才行，那个年代，华佗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团队？”

但信的也有人说：“中医外科是基于中医经络解剖基础，历代中医对经络的重视都是无以复加的，开汤药的中医不过是大方脉科而已；中医的没落，对华佗开颅手术能力的怀疑，不过是中医没落的一个表现而已，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华，中医自己都没有继承下来”。

但不管信与不信，现在类似“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的条件都具备，只是一个类似生态统一的问题。李文亮医生治疗中死了，西医有责任，中医也有责任，即说中医还没有“完整的初心”。

2) 科学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分工合作与未来统一

A、中西医合作类比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争执

2020年2月10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第20场新闻发布会，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讲：“新冠肺炎实际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目前在我们医院的治愈率还是很高的，金银潭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的患者累计超过1500余例。绝大部分患者，经治疗均可顺利出院”---自限性疾病是指人感染该疾病后依靠自身免疫力可以自愈。自限性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停止，只需要对症治疗或不治疗，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和修复能力就能逐渐恢复。

很多疾病属于自限性疾病，例如轻微感冒、痲疹、咽颊炎、玫瑰疹和水痘等。以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为例，治疗这种疾病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不能缩短病程，无论是否服用药物，患者都在一周左右康复。有人说，目前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也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患者发烧需要退烧，呼吸有困难需要吸氧等，最后还得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恢复健康。但对于症状很轻或处于康复期的患者，就可以考虑把稀缺的医疗资源让给更需要的患者。

中西医合作类比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同行也有争执---2020年2月19日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

教授,就新冠肺炎进展热点问题,他说:“此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但为什么很多病人未能如期自愈?我一直反对过分强调‘自限性’来误导病人。所谓‘自限性疾病’,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治也会痊愈。绝大多数疾病的自然转归有如下3个方向:1、自愈;2、没有好转,也没有加重;3、持续加重,直至死亡。可以说,80%的疾病,都有自愈的可能,包括癌症。对新冠肺炎,及早治疗,明显能提升向好的比例,不要强调‘自己会好’。目前中央指导组提出重症轻症并重、实现应治尽治,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就是为了通过更充足有效的治疗,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

B、新冠肺炎细胞因子风暴与中医

a、2020年2月16日“南方网”发表《中医能预测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细胞因子风暴吗》,报道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肿瘤科主任、深圳市天佑医学研究院专家申维玺教授谈细胞因子风暴在2003年SARS的救治中,因受到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之后的医学研究证明细胞因子风暴在SARS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讲细胞因子是人体在各种致病因素的诱导作用下,产生的一类具有信使分子(激发和传递信息)功能的多肽类分子,这里的致病因素包括病毒、细菌、以及其它可使人体处于应激状态的各种因素。

细胞因子具有以下重要特性:其一,细胞因子在体内发挥作用是以细胞因子网络的形式存在和表现的,细胞因子之间在这个网络中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有些细胞因子的作用是相互协同的,有些则是相互抵抗或拮抗的,双方形成相对的平衡状态,从而维持着适当的免疫功能和内环境稳定。其二,疾病在人体内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和级连诱导决定着疾病的病情动态变化过程,是决定疾病的病情传变和病程转归的主导力量。

b、那细胞因子风暴是什么?申维玺教授说:细胞因子风暴是指一些疾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以严重的细胞因子网络紊乱和失衡状态为特征的病理性功能状态,是机体对于病原因素的过度和超敏的反应。细胞因子风暴一般只出现于急性病中,特别是严重的感染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过程中。在急性病中,由于致病因素的损害作用,炎性细胞因子群的活性呈现为绝对的显著升高状态,从而出现明显的炎症反应和多脏器损害,即:细胞因子风暴。而在慢性病中,由于抗炎性细胞因子群的活性得以充分的调动和发挥,炎性细胞因子群的活性只能呈现为相对的轻度升高状态,一般不会出现细胞因子风暴,如肺结核阴虚证就是由于炎性细胞因子活性轻度升高的病理过程。

细胞因子风暴一旦出现,就会使身体出现多器官的损伤和一系列病理过程,如高热、肺炎、休克和呼吸衰竭等,救治不及时或不恰当,常会造成病人死亡。新冠肺炎疾病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和相关病理过程同样是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风暴引发的,因此采取多方措施、及时防治和阻断细胞因子风暴是挽救危重病人生命的关键。

c、中医是功能医学,有“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的经验和理论,其含义就是人体疾病中的内在量子簇场改变,会通过外在量子簇场的临床症状表现出来,中医论治时根据这些外在量子簇场的临床表现,可以推断出体内量子簇场存在的异常功能状态,这也是纯粹的西医量子簇场能明白和理解的地方。量子簇场中医的理论是对人类疾病过程中机体整体的功能和代谢的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总结;量子簇场中医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络紊乱为基本特征和本质的基本病理过程,不同的量子簇场证,代表了不同的细胞因子网络的异常量子簇场变化规律和模式,因此,量子簇场中医能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独特的技巧和方法,根据收集到病人的临床量子簇场表现,就可以确定和诊断出患者体的量子簇场细胞因子风暴,是由哪些量子簇场细胞因子占优势和主导地位引起的。

中医如何诊断和治疗量子簇场细胞因子风暴?一般来说,一些新冠肺炎患者有明显的乏力等症状,根据这一组症状可以推断,患者体内细胞因子网络的功能量子簇场异常变化特征,是转化生长因子b(TGF-b)等细胞因子活性升高占优势地位的细胞因子网络紊乱和失衡状态,后期的CT检查可以发现肺纤维化可以辅助证明这种诊断。中医治疗应该选用降低这类量子簇场细胞因子活性的补气等药物组方治疗,不仅会缓解症状,还可以阻断或减轻肺部纤维化的形成。

d、治疗细胞因子风暴,虽然目前中西医都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但是合理使用西医和中医治疗也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西医治疗量子簇场细胞因子风暴,一般常规使用激素作为主要治疗。如果考虑使用炎性细胞因子抗体这类药物,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在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和免疫细胞治疗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都有较好疗效。

中医治疗量子簇场细胞因子风暴,有疗效的,也是可以推荐使用的。中医通过使用复方中药,调节量子簇场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使量子簇场细胞因子网络的失衡状态恢复或接近恢复正常的状态,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效果。量子簇场细胞因子风暴的治疗效果,一般取决于一是科学合理地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药物,二是看这类疾病有没有特效的病因学治疗手段。如果细菌性疾病引起的量子簇场细胞因子风暴,效果一般会好些,因为细菌感染性疾病有

特效的抗生素病因学治疗药物；而对于病毒感染性疾病，由于没有抗病毒的特效药物，病毒性疾病引起的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效果会更差一些。

e、目前新冠病毒肺炎，在无有效治疗药物和手段的前提下，中医药大显身手为什么？因现在的中西医结合，着眼于现代医学的弱势领域及中医药学的优势领域进行实施，比如抗病毒、耐药菌感染、慢性病及复杂病领域。钟南山院士说：“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是人传人，所以凡是出现冠状病毒的感染，要高度的警惕对人的传染性，所以防控的级别完全可以改变---对病毒要长期研究很初步，可以这么说，2003年的SARS冠状病毒，到现在也没有特效药。治疗病毒的、针对性的、靶向的药，并不是说很多，但我们现在在探讨”。

新冠病毒像流感一样会长期存在吗？钟南山院士说：“我想这还需要时间的考虑。因为现在冠状病毒，就是SARS在17年里是有零星地出现的，但没形成气候。所以新冠肺炎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常态、长期存在，没有形成这么一个暴发的形势，也可能。关键就是控制它到最少。它会不会成为常态就像流感这样？我不是完全认为会像流感，流感就是每年都有，我认为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C、细胞因子风暴到炎症风暴的新冠肺炎尸检

a、炎症风暴是指血液生化检查出现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大幅度升高。2020年2月26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刘良教授完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在线发表于《法医学杂志》。3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相比诊疗方案第六版，此次增加了病理相关内容：根据目前有限的尸检和穿刺组织病理观察结果，肺脏呈不同程度的突变；脾脏明显缩小；心肌细胞可见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等多器官病变。刘良教授尸检的患者，尸检能否“颠覆”新冠治疗方案？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钟定荣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宋元林教授说：尽管解剖报告结果对临床有一定借鉴作用，但解剖不能代替临床，目前治疗的基本思路仍无变化。

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病理改变如果只是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新冠病毒是病毒，也具有病毒损伤共性的改变，但不同病毒毒性不一样，且在不同患者上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有的症状很轻，有的则需要上人工肺，还有的不幸死亡。为啥？这就需要大量的尸检工作，才能发现总结出规律性的结论，从而制定个性化的重症病人治疗策略。因为没有组织病理，目前还不好判断与炎症风暴的关系。刘良教授尸检的患者是个案，另外死亡尸体解剖，是病程的最后阶段，如果有的

话也是炎症风暴后的病理量子簸场变化。

b、宋元林教授说：“病情发展后，患者陆续会用到无创呼吸机、插管以及人工肺。对于‘炎症风暴’目前治疗上只能用一些小剂量激素、后期用于免疫调节的胸腺肽等。根据我们的经验，插管会带来很多后续的问题，所以尽量不要让病情发展到插管的地步，早期就积极地干预、支持。如果病情发展到需要插管，后续呼吸道管理、呼吸机调节、机械通气、细菌感染等对肺的作用等都要考虑到，情况就不是单纯的病毒肺炎的改变了”。钟定荣教授说：“通过尸检发现，临床上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还是有必要的，这个使用应该在患者治疗的‘最艰难’阶段，以打破患者体内的一种恶性循环。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每个患者的‘最艰难’阶段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临床观察，也需要更多的尸检工作。这种最艰难的阶段很有可能就是‘炎症风暴’。当然炎症风暴是临床医生的推测，很可能是机体对病毒或病毒毒素的过度反应，必须用临床手段加以干预，方能救命”。

c、对于死者肺部出现大量痰栓，痰栓是由呼吸机使用所产生，痰栓最终致人缺氧；而基于病理解剖结果急救改用吸痰机”，导致今天武汉的死亡人数减半是否可靠？钟定荣教授说：“不可靠。目前治疗的关键在于治疗肺水肿和急性肺泡损伤，稀释痰并有效排出粘液性物质，抑制肌纤维母细胞增生所致的肺部实变……要得出规律性的结论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尸检工作，至少四五十例，最好能达到10%的死亡病例，并且最好是尸检与治疗是同步进行的，即一旦患者出现死亡，征得家属同意或国家特殊授权并告知家属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尸检。尸检尽量选择不同进展期、不同治疗策略、不同影像学表现的患者，这样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指导临床制定治疗策略”。

宋元林教授说：“患者早期干咳，插管后在疾病进展阶段，加上机械通气本身，可能刺激了呼吸道杯状细胞或粘膜下腺体的分泌，出现了痰栓。新冠肺炎现在还没有特效药物，基本思路还是对症和支持治疗的思路。一是抗病毒，二是支持治疗。解剖报告会让大家关注到气道内的变化。对患者的管理需要个体化和精细化。主诊的医生可利用基本知识指导临床治疗，需要根据现实情况，通过细致观察，对病人发生的变化作灵活判断。比如，在呼吸机参数的调整上，医生要去判断有没有气道阻塞，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慢肺阻，出现二氧化碳上升，要判断气道阻塞是什么原因如果存在气道压力增加，尤其是峰压增高，同时吸出物粘稠，或考虑使用化痰药物，扩张支气管，改善气道湿化，注意出入量平衡，加强引流等，同时，循环系统、凝血等方面的变化，也要仔细地、一点一点去做评估和治疗……

如果存在气道压力增加,尤其是峰压增高,同时吸出物粘稠,或考虑使用化痰药物,扩张支气管,改善气道湿化,注意出入量平衡,加强引流等,同时,循环系统、凝血等方面的变化,也要仔细地、一点一点去做评估和治疗”。

3) 中西医统一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未来

A、新冠肺炎危机面前人类更是命运共同体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正式把新冠病毒命名为 COVID-19,这是不允许把任何病毒跟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人,甚至不允许跟任何一种动物挂起来,防止污名化。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世界权威的公共卫生机构,它的原则是正确的,全世界都应该遵守。因为新冠病毒不是中国的,是全世界的事情。很多问题需要全世界来共同解决。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长,但共同来解决也是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愿望。这已显示出中西医统一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未来,一定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共同抗击疫情---疫情无国界;危机面前,人类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非常正确的。

中西医结合的分工合作,影响面大,科学开辟的新纪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冠疫情带来了伤痛,也催生了无穷的勇气和信心。事实上现在已经证明,中西医结合中国的努力可以战胜它,也希望在跟世界分享经验,同时也想把这种信心和勇气分享给全世界。但中西医分工合作,“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强项;中医和西医各自优势,对新冠轻症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拿下,到了重症还是以西医为主”,是永远的吗?这个经验也跟世界分享吗---未来可能还有其他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一起应对是中西医分工合作,中医和西医各自发挥优势,也还是老样子吗?肯定不是的。

B、抗击新冠肺炎古今区别最大的不同

a、从全球抗击蔓延的新冠肺炎,看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区别最大的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抗击新冠肺炎。中医抗疫是在抗击我国历史上500多次的瘟疫,在有确切记载的300多次瘟疫中成长起来的,它是能救命的。而我们用“暴露组学”类比中医药学,用“基因组学”类比西医药学,这只是描述科学在目前的现状。即使中央指导组专家张伯礼院士2020年3月18日在武汉与美国同行连线交流时说,本次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医药的参与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截至目前,在全国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了92.58%,其中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参与比例分别为91.86%和89.4%”。有人说:“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虐,如同17年前的SARS是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壮的再次

复排和出演”---这也不完全是事实。

b、抗击新冠肺炎影响面之大,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区别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国内间共同支援抗击---全国支援武汉并湖北救治病人和积极抗疫。2020年1月发生在武汉并湖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医疗支援队伍中,开始西医大约占九成,中医大约占一成(3200人)。在战疫进入2月份后,西医和中医在治愈率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具有绝对统计意义的中医优势突显出来,为高端进一步优化救治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医全面参与,中医为主,西医支持。

c、第二是国际间共同支援抗击---到2020年3月18日我国首次本土无新增病例;3月19日我国本土再次无新增病例和无新增疑似病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随着新冠肺炎全球确诊病例持续快速增加,世卫组织欧洲、西太平洋、非洲区域办公室多名负责人,呼吁全球团结一致抗击新冠肺炎。世卫组织认为,确保国际合作、卫生投资以及社区参与是有效应对疫情的关键。

目前,我国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物资、人员援助,并支持友好国家在中国市场采购医疗物资;对外分享中方诊疗和防控经验。

d、新冠肺炎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早在2020年2月19日广州市新闻办召开的疫情防控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就说:“传染病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跑不掉。没有进行强力干预的话,新冠肺炎不可能消失,所有国家都要行动起来”。

4) 为未来统一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梳理中西医

A、用目前西医药知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3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钟南山、乔杰等专家,出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组织的线上“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国际分享交流会”,李兰娟教授介绍新冠肺炎其中尸体解剖的相关结果,她说:“从解剖结果看,新冠肺炎患者肺脏呈不同程度的实变,主要引起深部气道和肺泡损伤、炎性病变、灰白色病灶等。肉眼观察可见肺部呈斑片状,同时可见灰白色病灶及暗红色出血,失去肺固有的海绵感。患者的肺部切面中,也可见大量粘稠的分泌物从肺泡内溢出,并可见纤维条索。从组织形态学研究发现,患者可见肺组织出血、灶性坏死、机化和出血性梗死。肺泡腔内浆液和纤维蛋白性渗出物,肺泡腔透明膜形成,炎细胞渗出”。

李兰娟院士说,针对目前患者的症状,她的团队主要采取了“四抗二平衡”的诊疗方案---“四抗

二平衡”是浙大一院在抗击 H7N9 疫情中总结出的经验，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再次得到验证。“四抗”包括：抗病毒、抗休克、抗低氧血症和 MODS（多细胞功能衰竭）、抗易感；“二平衡”包括：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维持微生态平衡。具体来说，抗病毒主要是及时消除病原体；抗休克主要在于维持全身脏器的有效灌注；抗低氧血症和 MODS 是要维持生命体征；抗易感是要控制继发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目的是要维持患者的内环境稳定；维持微生态平衡，是要减少患者量子场体内的细菌移位。

李兰娟院士介绍：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要关注药物毒副作用及患者的不良反应，及时干预处理。而她推荐的诊疗方案抗病毒药物，包括磷酸氯喹、阿比多尔、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α -干扰素、利巴韦林。其他治疗措施还包括康复者血浆治疗、心理干预治疗、免疫治疗、造血干细胞治疗等。总之，有人说西医的科学性，不外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检测设备、检测数据、统计方法、药物试验、病理学科、系统理论、学术论文等。二是依据解剖学、生物学、细胞学、血液学、神经学、病毒学等学术理论。三是运用试验验证的各种化学药品。四是直接的手术方法。

B、用目前中医药知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李兰娟院士说：“新冠肺炎分初期、中期、重症期和恢复期。初期以寒湿郁肺和外寒内热两型为主，中期以寒热错杂为先，重症期为疫毒内闭多见，恢复期重在肺脾气虚。利用中医根据病患分型分期辩证诊治，有利于提高疗效——利用中医根据病患分型分期辩证诊治，有利于提高疗效”。2020年3月18日在广州疫情防控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说：“本世纪已出现三次冠状病毒疫情，分别是2003年SARS、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这一次的新冠疫情。SARS病死率10%，MERS接近30%，新冠病死率世界范围内差别大，均值1-2%”。

有人说在这次湖北并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救治中，西医以抗病毒为指导思想的消炎降温方法，被中医“去湿、化痰、鲜肺、通气”为指导思想的避瘟策略一定超越。

而且说中医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如包括分形阴阳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相生相克变化相互克，运动变化），藏象五系统学说（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五运六气学说，气血精津液神学说（气：信息—能量—物质学三元-多元说），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及养生学说，分形经络说等，其中以藏象学说为核心，信息--能量--物质学说为基础，全面系统地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用于指导临床诊疗活动。二是有一系列流传

千年的经典学术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金匱要略》等。三是有丰富处方资源的一系列的经方、验方、秘方、民方等。四是有一套完整治病操作方法的内服药；外用方；灸治（针灸、艾灸、蜂灸）；推拿按摸、正骨疗伤等。

七、病毒实验室与核武器管理平级的世界和谐

1) 世界警惕走火入魔的美国疯狂科学分级宗教信仰

A、美国一律所就冠状病毒疫情起诉中国

美国不但有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希望科学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而且还有“美国一律所就冠状病毒疫情起诉中国并索赔数十亿的诉讼文书”。据“网易”网2020年3月17日的该文报道：“3月1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律所就新冠疫情事件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对我国提起集体诉讼。本次诉讼的原告：佛罗里达的四个居民和博卡拉顿的一家棒球训练中心；本次诉讼的被告：涉及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属的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与应急管理部、民政部”。但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迅速封城，给全球赢得一个多月的缓冲时间。美国没有善加利用，最后出现大规模扩散，让普通民众深受其害，现在为了掩盖美国在防疫工作上的疏忽和漏洞，甩锅给中国，实在荒谬无理。

中国外交学院李海东教授3月1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目前新冠病毒源自何处，尚无定论。疫情在国际层面的扩散也不是中国导致的，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人员和资源大范围流动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按照这个起诉书的逻辑，2009年美国暴发的H1N1流感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当年就导致至少18449人死亡，那美国应该赔偿多少呢”——从法律上来讲，这件事情也是行不通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所明确规定，一个国家的法院，无权管辖另一个国家及其政府机关为当事人的案件。当然这样的行为，在美国迎合了美国国内政治正确的诉求，有着较大的市场；至于起诉能否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律所的目的达到了。

B、中国一法规的完善2003年就震惊世界

据“中国网”2003年5月29日发表的《卫生部等6部委：乡村出现严重非典疫情可整村隔离》一文报道，2003年为做好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根据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精神，卫生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印发各地。

印发此指导意见的通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6 部委就加强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乡村出现严重非典疫情可隔离整个村庄；不能把非典或疑似病人送回原籍或推向社会；农民非典患者治疗住院及住院期间伙食均免费；乡村医生及计划生育人员有责任上报非典疫情；各地市需指定一所非典定点医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在境外多国多点暴发、迅速蔓延，也许与没早有我国 6 部委类似的文件有关。

2) 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管理在抗新冠肺炎中升级

A、科学分区倡议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同等管控

a、依据来自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生物恐怖袭击成为人类目前最大的威胁，应加强重视”---比尔·盖茨对中国友好，2020 年 1 月 27 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 500 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承诺投入最高 1 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2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比尔·盖茨回信，衷心感谢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他和夫人领导的基金会慷慨解囊。

2020 年 2 月 28 日比尔·盖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近期全球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文章警告：“**新冠病毒可能发展成‘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呼吁富裕国家要帮助中低收入国家；**面对任何危机，解决眼前的问题以及防止问题再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仅需要拯救生命，也要从整体上改善应对疫情爆发的方式。前者更加紧迫，而后者从长远来看至关重要”。

早在 2017 年 4 月 20 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比尔·盖茨在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研究院演讲中说：“恐怖分子可能会重现类似天花造成的严重破坏---生物恐怖袭击可能致 3000 万人失去生命，其威力甚至超过核武器。当今生物研究的进步也会让恐怖分子能更容易地重现天花的噩梦，创造出高致死的病原体进行大范围生物恐怖袭击，且当下我们找不到免疫的方法。而通过空气迅速传播的病原体，有可能在短短一年内就夺去超过 3000 万人的生命，此外当今发达的全球化旅游也会加剧流行病的危害程度”。比尔·盖茨还说：“然而，过于天真的人类并没能足够重视问题的严重性，在此方面一直缺乏有效防范和准备。安全部门并没有随基因工程方面的突破而升级对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所以对于手无寸铁的人类来说，疫情将更为凶险。使用核武器攻击后可以停火，但是生物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疾病将不断自行传播下去。我们需要以反恐的态度为可能出现的自然流行病做好准备。准备好应对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同核威慑和避免气候灾难一样重要。创

新，合作和精心规划可以大大减轻各种威胁所带来的风险”。

这是类似科学分区分级就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同等管控的倡议---比尔·盖茨与投资界巨擘巴菲特在 2017 年股东大会上说的“计算机病毒”，有本质的不同---巴菲特说的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网络攻击”---作为全球投资界风向标的巴菲特说的是“夺权斗争”---登上社会的集团中的少数精英，把“权钱权命相连”，看成“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所以对“电脑病毒”攻击忧心忡忡。比尔·盖茨说的是“夺命斗争”，才说“核武器和病毒”都是人类的杀手，“要想解决好地球两大危害必须把和平放在首位，有了和平才能解除威胁地球的安全，同样也解除了人类生存的安全”。

B、科学分区分级隔离病毒生物实验研究新意

a、从统一的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的“量子簸场”理论看，人、动物、植物，到治疗新冠肺炎所有的药物、诊断的所有工具，以及病毒与细菌风暴等等，都是大自然“量子簸场”的造物。即使病毒与细菌是微小的生命体，只有依附于人体寄生时，才可对人的生命量子簸场存在产生破坏。而且当人的身体产生抗体后，及通过医疗等“量子簸场”手段，对病毒、细菌抑制灭杀，人类的生命又能获得完好延续---这里含有病毒、细菌量子簸场可以伤害人类，但是无法毁灭人类。

可以毁灭人类生存的，是宇宙“量子簸场”自然运动变化。但如果人类对大自然的过份索取及破坏，及造成的环境污染，使人类失去适应的生存环境，结果也会导致人类走向毁灭---这里就需要把实际从事病毒、细菌生物实验研究的科学家，与其他专项的科学家分隔升级管理起来，看成是另一个特殊的科学家人群---不是说他们是有意造成的环境污染，而是因为无意或接近他们的人无意造成的问题，也会造成的环境污染---这类今天的“天网工程”的摄像头，对公安、法院的破案、判断，不是靠嫌疑人的“赌咒发誓”和同类人群的说辞来决定的，“天网工程”的留影和基因化验之类也是重要证据一样。

b、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都同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列，其中生化武器又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两种。有人说，一旦发现生化武器被投放，国家立马会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医疗、管制系统全面运作，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生化武器很快就能得到控制，不仅不会在内部瓦解一个国家，还有可能让一国更加团结，得不偿失。以人类目前的医疗水平，遏制生化武器并不难，而一旦被发现使用生化武器，就算是超级大国都无法承受相应代价。当然从核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化学武器这三种对比来看，如果仅仅是看物理破坏效果，核武器的“危害”

无疑要比生化武器更强——核爆瞬间产生的光热辐射、冲击波等物理破坏因素，没有任何一种常规武器能相提并论。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杀伤性质，偏向于“软杀伤”，即要针对平民、士兵等有生力量的杀伤性上。生物武器是以各种病毒、真菌、细菌、衣原体等微生物，或者是某些生物产物，如各种毒素等作为战斗部的一种特殊武器，包括基因武器；而化学武器是以各种有毒化学制剂，如以各种毒气为的特殊武器。它们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和传染性，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性疫苗、抗体等，那么死亡人数以及波及范围可能会成几何级上升。

其次生化武器相对核武器在经济上，需要成本不大——制造生化武器只需要用一两个毒株，外加实验动物即可。烈性病毒的惊人的生存能力（炭疽），无与伦比的传播复制手段（天花，鼠疫），都方便得多。而且有很多国家谋求拥核的路上，但被五大国制裁，也举步维艰。反观生化武器却隐蔽得多，使用手段也方便——只需要将病菌或病毒，传播于人群密集场所，即可做得有效的大规模传播。在现代社会下，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播至全国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人群死亡。而且生化武器导致的生物灾难，导致瘟疫的传播，影响范围和时间难以控制。以及无差别杀伤敌人，不少糜烂性毒气会导致中毒者极为痛苦，而且有些还会导致中毒者后代畸形。

核武器也会导致长时间的辐射，遭到辐射的人也可能因此基因突变，后代畸形而且辐射极难消除会持续很久，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一座城市至今彻底封死。其次核武器需要有效的运载平台，比如说轰炸机，潜艇，洲际导弹等，这就增加了使用成本与难度。还有一点是由于核威慑的存在，使得传统的战争威胁，即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无法进行，核武器就很难真正投入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以恐怖袭击为主要的非传统威胁。

c、在目前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是生物实验研究中，有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的一项基本的工作。但由于“以苏解马”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类工作变得复制和有难言之隐，使疫苗研制中的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手段，怕说成是无意有意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手段，所以有这种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都不自觉地类似承认自己是“罪犯”、“罪犯群体”——奇怪 2020 年都不约而同否认自己过去的工作，或会做这项工作，更有群体集体为此辩护不存在有可能发生差错的问题——反之，可见目前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生物实验研究所、室，有实验条件和训

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不自觉地类似承认自己是“罪犯”、“罪犯群体”，表明是愿意接受升级管理的。

其实类似“反相反量”现象，旗手并不是来自下面而是科学院和著名大学，如王令隽教授是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又到美国深造。北京大学雷奕安教授用“量子纠缠不能通讯定理”，论证“要么世界无法认知，要么非局域量子纠缠概念有问题”。又如被指“推广发明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的中科院行政后勤人员高银相，在“三鹿事件”发生后被组织的专家，集体声称该转让信息无法达到生产“三聚氰胺”的高温等条件，可排除涉嫌用于制造“三聚氰胺饲料”。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出类似说不清失误的问题，实现比尔·盖茨希望的把和平放在首位，解除威胁地球的安全，解除人类生存的安全。各国可以把有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从事的类似疫苗研制中的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手段，重新认识考量科学分区分级隔离病毒生物实验研究。感谢他们所在地的人民和每年人代会，有责任审查他们工作报告中应审查的部分，为大众安全为计。

3)袁隆平不做意识形态偏离科学正道学霸传奇

A、袁隆平走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科学的成功

复旦大学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曾常驻巴黎 20 余年的郑若麟教授说：“划分今天世界两大阵营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全球化”。但实现这个过程并不平坦。未来科学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统一，科学家之间发生争论，本来是正常现象，而且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也是科学必经之路。所以意识形态偏离科学正道，即使做了它的学霸，也未必今后会一定成功。可证明的就是袁隆平院士不做此学霸成功的传奇——科商的定义，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而不是“学霸”论天下。

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院士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他 1950 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 年毕业。他在大学 4 年 8 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65，（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67，（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而 1953 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

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

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米丘林学说”是新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卢晓东博士说：“1949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

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B、霍金成功见证反相反量与时俱进之形

a、“四人邦”倒台前，我们在重庆看到重庆大学1976年2月出版的《新物理探讨》杂志，武汉的李育德老师批判霍金，无话可说。“四人邦”倒台后，霍金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著作在我国先后大量发行，因不是“四人邦”倒台前宣传的“以苏解马”那一套，很容易分辨科学主流的“正”与“误”——主流还有反潮流者？请看在美国王令隽教授，如今说的：“在40年前的黑洞研究高潮中，霍金成了一个成功的弄潮儿和这一产业中的最大受益者；他的成名，就是所谓的‘霍金辐射’。霍金的这一‘发现’，其实并不是发现，这里除了重弹海森堡测不准关系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物质的老调，还有称得上是霍金的原创‘发现’吗？可就是这样简单的将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拼盘炒作炼制出来的‘霍金辐射’，为霍金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名利”。

从李育德老师到王令隽教授见证霍金的成功是，1980年霍金被聘为剑桥大学的Lucasian讲座教授（牛顿、狄拉克都曾担任），因而名声大噪。王令隽教授说得好，既然霍金没有承认海森堡测不准关系类似的不确定性原理是错的，也没有承认卡西米尔效应的实验证实是错的，那么霍金承认他的黑

洞理论是一生铸成的“大错”何来之有？而霍金运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卡西米尔效应创新推论出量子黑洞辐射，何为不是新发现？王令隽教授在其文集的第9节“中国学术界应该从霍金现象中吸取什么教训”中说：“许多知识分子几乎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东西便是当然正确的，这种心理使得曾经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相对论和大爆炸理论立即成了学术时髦”。王令隽怀念文革溢于言表，只是没有说文革中霍金是否遭到批判？

b、2004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一书，文小刚教授1989年首次提出“拓扑序”概念，揭示拓扑序和量子纠缠的深层联系，到1999年之后才成为现在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主流。其实文小刚教授的《量子多体理论》一书，如果把“量子”改设为“人”，也可类似编出《文明多体理论——从非洲起源到五大古文明起源的统一》一书。因为文小刚教授谈的“量子的多体”，实际说是“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的量子序和拓扑序的统一，类似说到底是“有生于无”。

4) 走向统一的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在升级

A、弦理论与量子网络人工智能渐行渐近

a、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猛烈抨击弦理论，但弦理论已升级与量子网络人工智能渐行渐近。例如金灿荣教授说的石墨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核能源等五个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方向，都可发现弦理论应用的踪影。

科学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统一，类似“合伙人管理时代”，并且这种升级走向统一的弦理论也类似“全员持股合伙人模式”。有人说：“不是要不要用合伙人管理模式，而是时代已经选择了合伙人管理模式！把核心员工变为合伙人后，奇迹出现——华为能从4万元发展为1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500强。华为任正非总裁在90年代就开始实行全员持股合伙人模式，开始与客户在全国建立合资公司”——以华为、阿里、碧桂园、旭辉地产、海尔、韩都衣舍，爱尔眼科为代表的著名企业，纷纷导入“利益共享”为核心的合伙人制度，越来越多中小型企业纷纷导入合伙人管理模式，培养核心人才，与公司形成利益、事业、命运共同体。

b、从暴露组学推动基因组学升级研制抗击新冠病毒疫苗，看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一书说的不同弦理论，其实弦世界开弦和闭弦的振动、碰撞、相互湮灭创生、轨道连续，也就像谈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一样。从2020年2月21日瑞士一个科研团队发表的论文可获悉，该研究团队在试验中，也能利用合成基因组学平台快速重建了新冠病毒——这是在已知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基础

上, 通过反向遗传学手段在酵母菌中快速构建出活的新冠病毒。

该技术能高效合成新冠病毒, 尤其在新暴发病毒尚未被成功分离出之前, 可以帮助科学家尽快向卫生部门和实验室提供传染性病毒毒株, 且该替代方案更为高效、安全。但众所周知, 此前根据已知病毒基因组进行病毒重建被说成是“谣言”---要避免说“新冠病毒能人工合成的”, 所以该实验也说成与“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无关---情理也通: 瑞士研究实验室构建的新冠病毒是在疫情暴发后, 根据已公布的病毒基因组序列, 才进行的病毒重建研究。除新冠病毒外, 瑞士还报道能利用该技术合成构建“鼠肝炎病毒”这种冠状病毒等。

c、今天的互联网, 其实也与弦理论相通---虽然互联网从不安全的通信, 链接到云端数据缺乏保护, 漏洞无处不在。但如果量子弦物理学家获得成功, 这些弱点很快就会消失---弦量子物理学家是建立量子网络, 在这里信息的创建、存储和移动, 都以一种反映量子世界奇异行为的方式进行。尽管完全实现量子网络仍是一个遥远的愿景, 但最近在传输、存储和操纵量子信息方面取得的突破, 已是一种简单的原理验证迫在眉睫: 从让光子改变颜色的钻石和晶体缺陷, 到充当“幽灵”网络节点的无人机, 正在利用各种奇异材料和技术进行探索。

奥地利的欧洲量子互联网联盟成员---因斯布鲁克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所的专家说, 使用标准光纤连接至少 3 个相距 50 至 100 公里的小型量子设备这样的网络, 可能在未来 5 年内建成。量子信息使用的是量子位, 可以同时处于 0 和 1 的叠加位置。在光子的偏振态中, 或者在电子和原子核的自旋态中, 量子位可以进行编码。中国于 2016 年发射了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该专家团队说: “卫星对于量子网络来说是一个昂贵的选择; 最好选择相对便宜的是无人机”。

2019 年 5 月南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使用了一架 35 公斤重的无人机, 将纠缠光子发送到距离地面 200 米的两个量子节点。但由于量子态不能像经典信息那样简单地复制和反刍, 量子节点将需要复杂的量子逻辑门, 以确保在与环境相互作用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仍保持纠缠。

该专家团队说: “尽管如此, 建立一个量子网络的基本要素已经就位, 这个网络至少可以连接 3 个城市, 或许最终可以连接整个世界。更复杂的网络正在召唤人们, 如果成功了就能做一些很酷的事情”。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科学评论》发表南京大学祝世宁、谢臻达、龚彦晓团队的研究成果, 获悉历时两年多研发的无人机量子分发系统, 他们已首次实现了基于无人机移动平台的量子纠缠分发。

B、卷入疫情风暴的亚洲第一病毒研究所

a、据 2020 年 2 月 19 日《每日经济新闻》网发表记者黄名扬, 编辑孙志成、肖勇、杜波等的报道, 发端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 地处疫情中心的被称为“亚洲第一病毒研究所”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也遭遇假新闻的侵扰。但鲜为人知的是, 武汉病毒研究所很长时间里主要是和动物农业相关病毒打交道, 直到 2003 年 SARS 来袭。2003 年初 SARS 正在中国肆虐, 当时最先获得 SARS 病原冠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 是加拿大基因组科学中心; 最先提出快速鉴定 SARS 病原方案的, 是德国热带病研究所。其实中国很早就获得临床样本, 但迟迟不能下结论。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 SARS 病毒检测应该在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 P4 实验室进行, 但尴尬的是, 中国没有。专家们甚至只能去北京天桥公园旁的食品药品检定所做实验。

2004 年 10 月 9 日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 两国政府签订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 正式启动合作建设武汉 P4 实验室工作, 历经 10 年终于建成。即 17 年前非典期间, 由法国帮助建立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早诞生在 1956 年, 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之一。2015 年 1 月 31 日武汉 P4 实验室正式竣工。三年后的 2018 年 1 月 4 日实验室通过国家卫健委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现场评估, 成为我国乃至亚洲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 P4 实验室。

P4 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 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科研人员研究的一般都是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 如 SARS、埃博拉、H7N9 等, 因此又被称为“魔鬼实验室”。此前全球只有少数发达国家, 拥有这类装置---武汉 P4 实验室被称为病毒研究“航空母舰”、病毒学研究“国家队”; 其拥有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 并创建有我国唯一的“中国病毒标本馆”。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表示: 武汉 P4 实验室的正式运行, 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 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

b、目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都是人类重要病毒, 包括免疫缺陷病毒 HIV、丙型肝炎病毒 HCV、流感病毒以及动物源新发病毒(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毒 SARS-CoV、禽流感病毒等)基因变异、致病性、抗病毒药物治疗等。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也在这段时间发生变化, 其中就是卷入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 P4 实验室副主任“蝙蝠女侠”石正丽。

石正丽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 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

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1987年从武汉大学遗传学本科毕业，1990年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往法国求学。2000年她在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取得病毒学专业博士学位。石正丽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新型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多年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9年石正丽研究员“双喜临门”：一件是在1月份，她牵头完成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另一件是她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在国际微生物学科中处于领导地位，当选院士的科学家中有多位诺贝尔奖、拉斯克奖和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主。

c、“草根网”谭云鹏专栏2020年2月12日发表罗列的资料：“2015年11月9日武汉病毒研究所葛兴义、石正丽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关于如何合成SARS-CoV毒株的论文；2018年4月5日中央电视台24小时栏目详细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对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科研成果；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带领的团队在bioRxiv发表文章指出，与此前在云南中菊头蝠上检测到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相比较，新冠病毒在整个基因组中与其有96.2%的一致性，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一致性，以及2020年1月30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冯子健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论文，指出有证据表明新型肺炎病毒的‘人传人’在去年12月中旬就已经发生了”等四条，问“无论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还是国家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在研究造成这次肺炎疫情的新冠状病毒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且

有第一手资料。在有如此确切科研成果的同时，武汉病毒所和国家疾控中心有危机预警吗？为何随后爆发了蔓延全国的肺炎疫情？”。

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疑问----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病毒研究室”、“生物研究室”都能做这些工作，也做过类似工作，并都爆发了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只能说明比尔·盖茨的“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同等管控的倡议”是及时的----“核武器和病毒”被比尔·盖茨说成是人类杀手的“夺命斗争”；对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研制，各国都来走“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之路，都应一视同仁，共同管控。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观察者网2020年2月20日，翻译、编辑/科工力量程小康；
- 2 王德奎，三旋理论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5月；
- 3 孔少峰、王德奎，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
- 4 王德奎，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 5 陈超，量子引力研究简史，环球科学，2012年第7期；
- 6 [英]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技出版社，许明贤等译，1995年10月；
- 7 文小刚，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 8 叶眺新，中国气功思维学，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

5/24/2020